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25
第1期

ISSN 1671-2811



2025年3月 第1期(总第105期) 第27卷
No.1 (Sum 105) Vol.27 Mar.2025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年3月第1期(总第105期) 第27卷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重点选题与征稿启事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季刊）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主管、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公开发行的政治类社科期刊，也是云南省唯一公开发行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类学术期刊。

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致力于做好对党的创新理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的研究宣传阐释，在全省、全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竭诚欢迎专家学者惠赐稿件。

一、2025年重点选题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3.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4. 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5.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统一战线
6. 全面深化改革与统一战线
7. “两个结合”与统一战线
8. 统一战线与新质生产力
9. 统一战线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
10.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
11. 基层统战工作机制与实践路径
12. 统一战线各领域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研究
13.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
14.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势
15.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政治文明新形态
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廉洁建设
17.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民族大团结
18.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体系建构
19.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治理
2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21. 健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工作机制
22. 新时代网络统战理论与实践
23. 统一战线服务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24. 边疆侨乡文化
25. 华裔新生代研究

二、来稿要求

1. 稿件政治导向正确，主旨鲜明，论证充分，逻辑严密，格式规范，行文简洁流畅准确。
2. 稿件字数以8000~12000字为宜，原则上不超过15000字，格式按照《〈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投稿体例格式规范（试行）》（详见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官方网站）要求调整。
3. 稿件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且不涉及保密及其他与著作权有关的侵权问题，否则一切责任由作者自负，本刊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4. 稿件知网学术不端查重率原则上不超过20%，参考文献不少于20条，投稿后两个月内没有收到稿件修改意见或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5. 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6.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对录用稿件采取优稿优酬，来稿请投学报邮箱：ynsyxbbjb@163.com。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2025年3月20日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 刊

2025 年 3 月 第 1 期(总第 105 期)第 27 卷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岳 宁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杨春禄 谢灿坤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瑛 杨松禄 罗建生 钟瑞华

诸 芳 魏贵华

主 编:何云葵

副 主 编:杨松禄

执 行 编 辑: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 年第 1 期 第 27 卷

1999 年创刊

目 次

● 统战理论与实践

统一战线激发党的政治优势：耦合共生、作用机理与实践进路

..... 李 甜 (05)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基础和基本经验

..... 张 瑾 (15)

● 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

结构功能视阈下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效能研究

——基于 L 市界别工作“五机制”的分析 毛 慧 (25)

协同治理视域下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研究

..... 方 烨, 刘艳云, 王 峰 (35)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滇省夷人图说》音乐符号的文化意蕴和图像表征

..... 朱 敏 (45)

民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互嵌结构

——以一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为例 伍永辉 (5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场域、价值逻辑与践行路径 刘世翔, 李 娜 (63)

[期刊基本参数: 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3*2025-01]

●历史与文化

“因俗而治”与疆域“大一统”

——以清前期边疆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朱 强, 庄弘泰 (72)

西南联大新校舍考 龙美光 (78)

文化抗战中的学府风貌

——读《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 马绍玺 (86)

以文化润疆为核心的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路径探赜 鲁昆洪 (91)

●学习与思考

数字时代产消合一形态探赜 徐 源, 王海东 (100)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智化”赋能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吴 韬, 钟启超 (111)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 年重点选题与征稿启事 (封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滇省夷人图说〉音乐符号的文化意蕴和图像表征》所录图片
..... (封三)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1(Sum 105) Vol.27 Mar.2025

Contents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 The CPC's United Front in Enhancing Its Political Advantages: Symbiotic Interaction,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Li Tian (5)
- The CPC's United Front Work with the Bourgeoisi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ethodological Basis and Cardinal Experience Zhang Jin (15)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 Optimizing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from a Structural-Functional Perspective: An Analysis of the "Five Mechanisms"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City L Mao Hui (25)
- Construct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via CPPCC Consultation: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pproach Fang Ye, Liu Yanyun, Wang Feng (35)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Visual Iconography of Musical Symbols in "Illustrated Description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within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amework Zhu Min (45)
-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embedded Structure of Foster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Ethnic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a National Mode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Wu Yonghui (55)
- Forg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Temporal Contexts, Value Paradigm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Liu Shixiang, Li Na (63)

History and Culture

- "Custom-Geared Governance" and the "Great Territorial Unification": A Survey Centered on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Zhu Qiang, Zhuang Hongtai (72)
- A Study of the New Campus of 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Long Meiguang (78)
- The University's Spirit in the Cultur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Reading "No 3 Dianhua Lane: Letters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Ma Shaoxi (86)
- Exploring Pedagogical Deployment by Means of the CPC Revolutionary Legacy Archives in Colleges with the Core of Cultural Enrichment in Xinjiang Lu Kunhong (91)

Learning and Thinking

- Exploring the Prosumer Integration Paradigm in the Digital Era Xu Yuan, Wang Haidong (100)
- Research on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Wu Tao, Zhong Qichao (111)

- Announcement of Key Research Topics on JYNIS and Call for Papers in 2025 (Cover Page 2)
-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Iconic Representations of Musical Symbols in the Images Recorded in "A Description of the Yi People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ver Page 3)

统一战线激发党的政治优势： 耦合共生、作用机理与实践进路

李 甜

摘 要：党的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助推党的政治优势形成与发展的源泉动力。就关系而言，党的统一战线与党的政治优势耦合共生，二者同构于马克思主义深刻学理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历史演进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导向。基于这种契合关系，党的统一战线在制度建构、组织形态、功能运作等层面形成促进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作用机理。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上，要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构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健全统一战线的制度体系、创新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强化统一战线的话语叙事等实践进路，从而为持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锻造坚强核心、奠定坚实支撑、提供制度保障、积蓄新质动能、营造话语环境。

关键词：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党的领导；大统战工作格局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5) 01-0005-10

一、问题的提出

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巨大政治优势。政治优势作为党的标志性理论话语和实践品格，是党在百年风雨中应对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焕发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的政治优势作出重要论述，他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把广大职工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突出政治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①2013年12月，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②2018年11月，他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我国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全面深化改革不断释放发展动力，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③2024年7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坚持党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的理论创新和机制建设研究”（24ZDA106）。

作者简介：李甜，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 《习近平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维护职工群众权益 为实现中国梦再创新业绩再建新功勋》，《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4日，第1版。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12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06页。

全面领导，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推进的根本保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① 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提供了根本遵循。

梳理文献发现，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党的政治优势的理论内涵。党的政治优势是对党“为什么能”的科学回答之义，是对党“要干什么”的明确昭示，是党矢志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强大动力，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坚实支撑^②。政治优势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突出长处，是一个多维向度的综合政治概念，包括坚持党的领导的优势^③，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的优势^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⑤，具有鲜明政治性、高度可行性、强大有效性的依规治党优势^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势^⑦，由政治初心、政治权威、政治领袖、政治品格、政治情感、意识形态、执政绩效等综合因素作用而形成的政治凝聚力优势^⑧，“军政军民团结”优势^⑨，以及坚定理想信念、科学理论指导、风清气正党内政治生态、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格和伟大人格^⑩等优势。这些政治优势越显著、越突出，说明党越有生机和力量。二是党的政治优势的实践指向。这类研究主要探讨党的政治优势与具体领域的关联作用。通过以大党独有的政治优势实现破解大党独有难题^⑪；通过彰显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履行好服务统领协调的角色定位、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等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⑫；通过在方向引领、制度规范、体制系统、能力现代化、领域覆盖、资源融合等方面强化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⑬。

可见，学界对党的政治优势的研究多从党的自身建设、历史经验总结等视角出发，而以“政治优势”“统一战线”为关键词，探究党的统一战线激发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文献数量不多。在现有研究中，更多散见于探讨统一战线某一方面如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优势^⑭或在统一战线对国家制度嵌入演变中探讨与政治优势间的张力^⑮，而较少从系统整体进行阐释。事实上，党的统一战线与党的政治优势间存在紧密联系，是党的政治优势的重要体现、重要来源、重要制度和重要实

①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24年第18期，第4—11页。

② 于安龙：《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多维向度与辩证逻辑》，《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38—50页。

③ 王立峰：《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与制度优势》，《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1—8页。

④ 刘红凇：《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党的独特优势》，《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1期，第64—72页。

⑤ 孙新：《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红旗文稿》2024年第20期，第19—23页。

⑥ 周叶中、闫纪钢：《论依规治党的政治优势》，《求是学刊》2023年第1期，第1—12页。

⑦ 任学丽：《深刻理解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8期，第58—63页。

⑧ 田旭明：《政治凝聚力：中国共产党的显著优势》，《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3期，第98—107页。

⑨ 王今诚：《延安双拥运动：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形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9期，第73—81页。

⑩ 邓纯东：《政治优势是党的领导成功的关键因素》，《毛泽东研究》2022年第2期，第4—14页。

⑪ 张润枝：《以大党独有优势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人民论坛》2023年第2期，第38—41页。

⑫ 孙琳琼、王立威：《以政治优势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学习论坛》2024年第6期，第5—12页。

⑬ 齐卫平：《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优势论析》，《治理研究》2023年第1期，第95—107、2、159页。

⑭ 钱再见、李青：《建言的力量：人民政协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政治使命与功能优势》，《江海学刊》2021年第3期，第123—130页。

⑮ 束赞：《制度体系与政治优势：统一战线与国家制度关系的演变与张力》，《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67—73页。

践。《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更是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①。鉴于此，聚焦党的统一战线助推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过程与实践，意义重大。

二、党的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耦合共生关系

就关系而言，党的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耦合共生、相融相长，二者同构于马克思主义深刻学理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历史演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导向。

（一）理论基础同源：赓续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学理

党的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均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二者的学理相通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政党建设理论中。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马克思、恩格斯清醒意识到无产阶级要想与已在经济、政治系统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相匹敌，必须建立工农阶级联盟、争取并联合“中间阶级”^②。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国情出发，宣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劳工阶级联合、民众大联合等统一战线思想，此后更在革命实践中活学活用。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③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国化，让共产党人意识到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这恰与中国共产党具有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的政治优势相契合。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④，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纪律严明的革命家组织必须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又是党的政治优势，这与统一战线作为党领导的广泛政治联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始终保持正确方向并不断发展壮大相契合。此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中也多次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⑤。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群众基础先进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基础先进性以及具有严密组织体系和严格组织纪律的组织建设先进性等多方面，而这种先进性亦为党的统一战线提供了价值引领、理论指导和组织保障，充分彰显了党的强大凝聚力、广泛代表性与灵活策略性等政治优势。

（二）历史演进交织：积淀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与党的政治优势相伴而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中国共产党提

①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② 陈明明、杨东光：《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年第4期，第1—1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出建立“联合战线”主张。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联合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革命浪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根据革命形势及时调整统战政策,如八七会议把党的工作方向和统战重点转到发动工农群众上,党的六大正式确立既要反对封建压迫又要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①。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再次对统战政策进行调整,提出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坚决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向全国执政,为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又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统战理论和方针政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党的统一战线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又在表述中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至此,以宪法形式明确爱国统一战线由“三者联盟”发展为“四者联盟”,反映了党对经济社会结构新变化的清醒认知和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适时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统一战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赋予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新内涵,在“四者联盟”基础上增加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作为统一战线联盟的一部分。从历史演进看,党的统一战线基于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转变,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时代中心任务所作出的灵活策略调整,其演进本身就附带政治属性和党的政治智慧。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扩大了群众基础、锤炼出强大领导力、彰显了卓越动员能力,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党的政治优势在党的统一战线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提升。

(三) 现实目标一致: 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无论是党的统一战线,还是党的政治优势,都凝聚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目标中。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期,面临内外两方面压力,从国内看,中国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化增长动力的需求,亟待解决一系列周期性、结构性问题;从国际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经济衰退、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② 巩固和增强党的政治优势已然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之举。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优势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凝聚广泛力量、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处理复杂问题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③ 长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主题,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共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3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267—268页。

③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02页。

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统一战线的成员虽然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行业，但都心怀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共同期盼，积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目标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党的统一战线，不仅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向社会各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团结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各宗教团体、各阶层人士等，积极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同时，还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落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党的政治优势夯实了基础。

三、统一战线激发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作用机理

党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与党的政治优势紧密相连，其通过制度建构、组织形态、功能运作，能够筑牢党的政治优势的体制根基、拓展党的政治优势的辐射半径、赋能党的政治优势的效能跃升。

（一）以统一战线的制度建构，筑牢党的政治优势的体制根基

“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及其形式都是从统一战线发展而来的”^①，统一战线的制度建构，筑牢了党的政治优势形成与发展的体制根基。百年来，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实现了由革命策略到革命战略再到治国方略的转变，并逐渐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安排以及国家一切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统一了全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策略思想，改变了党的一大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为逐步确立民主联合战线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策略奠定了基础。在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必须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在一切斗争，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应当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现斗争，独立的去领导他们的运动”^②。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统一战线由革命策略向革命战略转变。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③，彰显了统一战线作为革命战略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在由革命战略向治国方略转变中，逐渐成为党的政治优势的重要制度。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这是“由非制度化的阶级和政党的统一战线，发展为制度化的阶级和政党的统一战线过程中形成的”^④。此后，统一战线又奠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的政治基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仅肩负了伟大建国责任，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前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对于人民政府来说，毛泽东直言“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⑤。同时，统一战线的制度化也体现在对民族问题本质的不断把握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党处理民族关系的制度安排。可以说，作为我国的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其他诸多中国政治制度，都是从党的统一战线发展而来。而这些政治制度则恰为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① 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8页。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6页。

④ 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第228—229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0页。

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以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等奠定了制度基础,为形成、巩固、强化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政治优势提供了有力支撑。从这个意义来说,党的统一战线的制度建构是党的政治优势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制度泉源。

(二) 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态,拓展党的政治优势的辐射半径

党的统一战线是典型的“同心圆”。长期以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态将党的政治优势“半径”动态扩展,形成了“同心圆”式的政治影响力辐射格局。一方面,统一战线的组织形态借助结构化嵌入,延伸了党的政治优势的辐射纵深。以人民政协为例,从全国政协到地方各级政协,形成了基于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各级组织均受同级中共党委的领导,不同层级的政协组织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时相互配合、协同工作。这种结构分层与组织协同,能够增强政治势能传导制度安排,使党的政策主张和密切联系群众、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党的政治优势,在不同层次、不同组织之间传递和发挥,从而增强党的领导力和凝聚力,延伸党的政治优势的辐射纵深度。另一方面,统一战线的组织形态通过网络化联结,拓宽了党的政治优势的辐射覆盖面。在统一战线“同心圆”中,“固守圆心最根本的就是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①,这也是党的政治优势所在。而统一战线通过网络化联结,能够将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爱国宗教团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台胞联谊会、侨联等众多组织,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如同同心圆围绕圆心一样,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网络。这些统一战线的组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能够包容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界别的人士,从而延长了“同心圆”包容的多样性半径,极大拓宽了党的政治优势的辐射覆盖面,推动党的影响力触及社会各个角落。如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其成员团结面之宽,社会覆盖面之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之大,是其他统一战线组织所不能比拟的”^②,已成为党的政治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织载体;在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专门机构方面,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士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在其作为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方面,是协商民主的创造性成果,丰富了党的民主实践,巩固和发展了党在民主团结、科学决策以及构建党统一领导的监督体系等方面的政治优势。可见,统一战线的组织形态并非僵化的体系,而是正式组织与阶层、群体等不同界别的集合,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动态网络,有助于党的政治优势在更大范围和更多群体中有效传导。

(三) 以统一战线的功能运作,赋能党的政治优势的效能跃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③。党的统一战线,通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协调关系、荟萃智慧的功能运作协同,全方位赋能党的政治优势,使其在政治认同、力量源泉、执政基础和科学决策等方面,实现了系统性效能跃升。在发挥凝聚人心功能层面,构建了党的政治优势效能跃升的共识基础。党的统一战线,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精心做好群众工作,积极在多样化观念中确立主导思想,在多样化诉求中寻求最大共

^①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第27页。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党校等编著:《中国统一战线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7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9页。

识。如抗战时期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等，使人民群众深刻领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政治追求，从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统一战线通过“凝聚人心—政治认同”的转化链条，不仅将多元社会价值整合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扩展了党的执政基础，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在发挥汇聚力量功能层面，打造了党的政治优势效能跃升的动力引擎。“说到底，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①，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群体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极大扩充了党可依靠的力量源泉。这种力量凝聚，展现出党所具有的强大的领导力和凝聚力，是党的政治优势的生动体现，使党能够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关键时刻，迅速调动全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发挥协调关系功能层面，建构了党的政治优势效能跃升的稳定基石。党的统一战线，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发展理念，尊重不同群体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多元差异，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声音，及时掌握所联系群众的思想动态和现实需求，并通过沟通协商、教育引导、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等方式，疏通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团体及社会成员的关系，组织协调多样化群众诉求，力争将各种利益纷争和内部矛盾分歧化解在萌芽状态，这极大维护了社会的团结稳定，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在发挥汇集智慧的功能层面，党的统一战线供给了党的政治优势效能跃升的创新要素。党的统一战线，涵盖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文教医卫等各领域优秀人才，能够使党敏捷响应社会技术变革，为党在不同领域的工作提供宝贵建议，提高了党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妥善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进而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国家和民族不断前进，确保党在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政治优势。

四、党的统一战线助推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实践进路

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上，持续发挥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关乎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为此，党的统一战线需要从领导核心的锻造、工作格局的构建、制度体系的健全、工作方式的创新、话语叙事的强化等维度，探索助力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持续发挥的实践进路。

（一）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为持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锻造坚强核心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重要内容，又是党发挥其他一切政治优势的根本前提。统一战线作为党的领导的重要工作领域，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这是巩固和强化党的政治优势的应有之义。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时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②进入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发展面临新局面，深刻变化的经济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的民族宗教事务、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境外敌对势力、快速发展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等综合因素，对加强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极大改变了党持续发挥政治优势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为此，新时代持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尤其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这个领导核心可以通过党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加以锻造。在理论武装层面，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向各界人士宣传阐释彰显党的政治优势的先进理论，树立党指导思想的政治权威，从而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思想的认同和支持，凝聚起共同的政治理念，同时能够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3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培养和提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政治素养,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塑造主体性资源。在价值导向层面,党通过统一战线积极引导社会成员树立正确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识,为持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筑牢思想根基,从而锻造一个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强化领导权层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①通过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不同社会阶层的力量凝聚起来,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资源整合起来,从而为党发挥联系群众、团结各界、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政治优势奠定基础,使党在各种复杂局面下确保坚强的领导核心地位。

(二) 构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持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奠定坚实支撑

持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需要全党上下齐心协力,与各方力量协同配合,构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则为此奠定了坚实支撑。完善由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提出的关于统战理论的科学论断,“是加强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的必然要求”^②。在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层面,大统战工作格局强调把党委(党组)统战工作主体责任落到实处,明确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统一战线工作第一责任人,要求统战部发挥好综合协调机构作用,人民政协、台办、工商联、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等各统战方面履职尽责。这有力驳斥了“统战工作只是统战部的事”“统战工作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次要从属地位,是务虚的”等错误观点,深化了统战干部队伍和党外代表人士队伍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落实统战工作责任过程中,能够及时倾听和精准解决来自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等群体的利益需求和实际困难,实现将党的政策覆盖到更广泛的群众中,强化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在组织架构系统性建设层面,大统战工作格局从纵向上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机构,有利于打破传统部门分割和工作壁垒,而从横向上则能够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不同部门间的通力合作,实现信息、资源和成果共享,使党有效应对新时代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风险挑战,使党的政治优势在更广泛的领域中持续彰显。在健全统战工作体制机制层面,大统战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完善大统战在领导、协同联动、工作运行、工作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党的政治优势。如建立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既能有效组织各相关单位全面了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需求和动态,提高解决重难点问题的效率和质量,又能为其与党建、群团等工作相结合提供体制机制空间,从而使党的领导在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发挥出强大力量。

(三) 健全统一战线的制度体系,为持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提供制度保障

持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离不了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③。党带领人民建立并不断完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制度、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党政机关任职制度等统一战线自身的工作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宏大制度体系。统一战线制度体系是党的一项伟大政治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608页。

② 石泰峰:《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人民日报》2024年8月5日,第6版。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页。

创造，为党的政治优势发挥提供了可靠制度保障。一方面，党的统一战线的制度体系“既有宏观层面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制度情境所作出的制度选择，又有中观层面经济、利益、观念等要素的制度塑造，还有微观层面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关键践行者的制度推动”^①，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特色和独特政治优势。如通过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和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完善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机制，完善港澳台和侨务工作机制等统一战线制度建设，能够为获得广泛政治支持、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民族团结、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拓展国家发展的国际空间等方面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提供制度效能。另一方面，在挖掘党的统一战线制度体系具体内容时，通过找准与党的政治优势的契合点，为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提供制度建设经验以及夯实制度协同基础。“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我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②，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在统一战线制度体系下，民主党派通过政协提案、专项监督等方式，能够对党员干部是否遵守党纪党规、依法行使权力、具备先进性和纯洁性等问题进行监督。这种民主监督机制，不仅能与党内纪检监察制度相结合，为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实制度支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一党的独特优势不断趋于完善。

（四）创新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为持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积蓄新质动能

因时而变、因势而新是党的政治优势获得持续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变量’，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③新时代面向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变化，传统政治资源动员的统战方式难以及时化解党面临的执政难题，为此，必须创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式，尤其做好网络统战工作，从而为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积蓄新质动能。一是正视网民群体新变化，及时将新生群体纳入统战工作范畴。不仅要准确把握统一战线成员在思想状况、求知途径、社交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而且还要加强对互联网领域不断涌现的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团结引导，尤其注重引导自媒体从业者等网络人士在网络空间正面发声，推动营造清朗且正能量的网络空间，从而有力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话语权方面的政治优势。二是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夯实党的群众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④统战工作作为特殊的群众工作，也应体现网络化工作特点，如通过建立常态化网络联系机制、搭建专门网络交流平台、主动设置网络议题等方式，促进党的群众基础在网络空间有力延伸与拓展，从而将新兴网络群体纳入统战视野并加以团结凝聚。三是构筑网上网下同心圆，助力党的事业全面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借助线上线下两种渠道，为整合各类统战资源创造有利条件。如在乡村振兴中，依托信息技术赋能和“两微一端”、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新载体，打破地域、行业以及组织形式等传统界限并进行网络平台宣介，从而将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资源与乡村的土地、劳动力、特色产业等资源精准对接，进一步促进

① 王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制度的历史脉络及变迁逻辑：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民族学论丛》2024年第3期，第75—84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592页。

③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精神学习问答》，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8页。

④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了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强大效能。

(五) 强化统一战线的话语叙事, 为持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营造话语环境

积极健康的话语环境是增进党的政治优势话语认同以及提高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党的政治优势话语,面临来自西方话语霸权挑战、话语误解、国际舆论场域被故意抹黑等话语困境。通过强化党的统一战线话语叙事,有助于党的政治优势话语摆脱话语困境。在构建话语叙事体系层面,既要坚持历史维度叙事,从“以团结赢得斗争、以团结安邦定国、以团结富国利民、以团结强国复兴”的历史主题演进中^①总结党的政治优势形成与发展的统一战线机理;又要从理论维度叙事,自觉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话语自信;还要从实践维度叙事,将党的统一战线在各个领域的实践经验与实践成果转化为生动的叙事内容,从而为党的政治优势话语提供素材支持。在创新话语叙事方式层面,要自觉强化“受众本位”,增强话语叙事表达能力,坚持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政治叙事与生活叙事、集体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更好传递党的统一战线的鲜活故事,增强广大受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政治优势的理解与认同。如针对国际舆论场上西方政客和媒体恶意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等负面舆论攻势,党的统一战线在做好正面发声并进行斗争性叙事的同时,还应将中国共产党关于“有事好商量”“要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等一系列通俗易懂的统战特色话语及其蕴含的烟火气里的话语故事向外传递,让国际受众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担当。在拓展话语叙事渠道层面,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官方渠道与民间渠道协同等,有效提升党的政治优势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如在国际交往中,借助统一战线中海外华人社团、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等民间力量,既能在应对西方国家无端指责时及时向国际社会阐明事实真相并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又能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还能够通过“牵线搭桥”推动国际合作,争取更多国际伙伴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话语支持。

五、结语

回望历史,党的统一战线始终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凝聚工农大众、民族资产阶级等广泛力量,打破敌人封锁围剿,使党在艰难困苦中发展壮大,党的政治优势也在广泛的群众支持与力量汇聚中初步彰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团结各界人士投身国家建设,助力国家工业化进程与社会秩序稳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进一步拓展,为经济腾飞、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等注入活力,使党的政治优势在高效资源整合、科学决策机制以及强大社会凝聚力下不断得以强化。立足当下,党的统一战线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安排,又是实现党长期执政的重要组织形态,还是助推党的事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功能载体。展望未来,持续探索党的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间的耦合机理与协同机制,必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起更磅礴的力量,也势必会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 念兴昌

^① 林华山、龚静阳:《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第6期,第126—144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基础和基本经验

张 瑾

摘 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具体而非公式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动态而非静态地把握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发展变化，立体而非平面地划分阶级结构，分众而非划一地制定针对各阶级阶层的政策策略，为最大限度地凝聚抗日的革命合力，推动大团结大联合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在实践中遵循做好统战工作的内在规律，将原则性和策略性有机结合，辩证把握了“和”与“争”、“多”与“一”、“进”与“退”的关系，深刻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保持独立性、坚持人民性、发扬民主性的内在机理，共同构成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耦合共生的内在依据和基本条件，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对科学分析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做好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具有现实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统一战线；资产阶级；阶级分析；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5) 01-0015-10

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重要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为指导，先后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统一战线，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有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也有因统一战线的破裂而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严重武装斗争的过程；其间，党经历了许多的伟大斗争，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分析总结这一历史过程，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准确把握民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客观分析不同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复杂变化，对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蕴含的深刻历史经验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坚持广泛性，以阶级分析为方法基础推动大团结大联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阶级分析法，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指明了革命的敌友关系，阐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阶级构成，

基金项目：长安大学2023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革命文物融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教学研究路径初探”（300103131031）

作者简介：张瑾，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为最大限度凝聚共同奋斗的力量,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提供了方法指导,其思想认识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渐走向成熟。

(一) 具体而非公式化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

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①,俄国革命的经验也不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大地,以解决中国问题的高度自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复杂性、特殊性,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政策策略,而不能罔顾中国特殊国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机械地运用对俄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和认识,比如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以后,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及相应政策策略的认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就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在策略上应当排除同资产阶级的联合,“显然,这是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过程中斗争策略的抄袭”^②。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恰当分析,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共五大接受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认为蒋介石及其部下三月以后反对国民革命的行动,不是个人的而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基于此,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叛的资产阶级组成的反革命联盟。中共六大同样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阻碍革命胜利的敌人,提出要整个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对我们过去的阶级关系分析进行了总结,认为“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③,公式化就是教条地照搬俄国的公式,定型化就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比如对蒋介石的分析,“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④。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欧美资产阶级的区别。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资产阶级的不同特点,也决定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和任务不同。毛泽东指出,旧俄帝国是侵略别人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而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因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革命性,所以“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⑤。但因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保存了另外一种性质,也就是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也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同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存在不同,“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⑥。

(二) 动态而非静态地把握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发展变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深刻论述了革命—反革命营垒的复杂变化,认为侵略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② 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71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7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4页。

不同的派别和集团，各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使得在不同阶段和时期，革命和反革命阵线会发生变化，这要求我们必须采用发展的眼光，审慎地研究和分析各阶级的变化，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方法处理中国各阶级间复杂的关系，如果固守对阶级态度的刻板认识，无视政治时局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以及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发展变化，只会给中国革命带来损失。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对几个典型人物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进行了分析，认为蒋介石的思想在大革命时期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四一二以后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①。1945年，在总结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时，周恩来再次强调敌人营垒的复杂变化问题，并分析了在认识和对待敌人问题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右倾错误常常把敌人当作朋友，最明显的就是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日益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了，但陈独秀“还主张继续和蒋介石合作，就没有认识这个转变关头的变动”^②，而“左”倾错误常常把朋友当作敌人，把朋友拒之门外，使革命力量处于孤立状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多篇文献中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给国内阶级关系带来的变化。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的关门主义观点，强调在殖民地化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参加过1924—1927年的革命，随后被革命的火焰吓坏，站到蒋介石集团方面去了，抛弃了无产阶级这个同盟者，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充当反革命的助手，但当前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正在走向殖民地，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存亡问题，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在抗日条件下和工人农民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

（三）立体而非平面地划分阶级结构

“毛泽东同志说，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是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综合阶级和阶层分析，对阶级内部的差异性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为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寻求革命合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方面，不仅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两部分的区分，也认识到大资产阶级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也存在矛盾和分裂，依据所属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分为欧美派和亲日派，依据对抗日态度的不同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

中共四大就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部分：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并对不同部分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态度进行分析。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区分，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其经济地位不同对待革命的态度也不同。瞿秋白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分化》《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等文章中提出了“官僚买办阶级”“与外国资本家对抗的商人阶级”等不同阶级类型，认为官僚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化身，与外国资本家对抗的商人阶级是因为中国工厂手工业和工业的片面发展而产生的，他们组织生产销售国货，与外货相对抗。此外，瞿秋白分析了买办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产生和革命性差异，认为因中国是“国际的殖民地”，各国帝国主义互争，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6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9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4页。

所以“中国的买办阶级里可以有英国买办日本买办美国买办的派别”^①，不同派别的革命性与其在华利益密切相关，因为英国在华利益最占优势，英国买办的反革命最明显；日本在华利益是局部的，主要在东三省，当日本的利益受到英国威胁的时候，日本买办的安福系可以附和国民革命中的反英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不同部分的认识更加深刻明晰，其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②，并具体分析了不同部分的特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有两面性的阶级，具有“一身而二任焉”的特点。因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锋芒主要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并且因日本妄图独占中国，也使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矛盾，被不同帝国主义国家豢养的大资产阶级也出现分化，在抗日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其中亲日派已经或者准备投降，而欧美派还留在抗日营垒中，但他们有动摇性和反共主张。

（四）分众而非划一地制定针对各阶级阶层状况的政策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无论是具体地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还是立体剖析各阶级构成和动态分析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都最终落脚于正确分析敌友关系，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政策策略的制定和实施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当政治时局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党的政策策略、工作方法等也要相应改变。

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敌我关系带来的新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③，在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阐明资产阶级不同部分政治态度和阶级特性的基础上，分别制定了针对不同部分的政策，提出要利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抗战。

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势力的一部分，是必须争取的力量，强调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极重要的任务。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则要利用其内部矛盾，坚决打倒亲日派，对抗日派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以争取最大多数，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他强调因抗日派尚在主张团结抗日，还愿团结抗日，因而要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忽视对抗日派的争取政策，忽视他们和降日派的区别，这种意见是错误的。而对他们“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④的一面，则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与之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⑤，强调在中国孤立大资产阶级只孤立其反共方面，俄国对资产阶级则是采取绝对孤立政策。基于此，在抗日过程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采用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的一面，打其反共反民主的一面，在“打”和“拉”的关系上，打是实现拉的手段。

二、坚持策略性，遵循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在规律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与同盟者的关系，特别是与资产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8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56页。

阶级的关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系统总结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将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制定了一套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为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革命和让步的关系提供了遵循。

（一）“和”与“争”：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奋斗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经验总结，也是面向未来，开创新的历史伟业的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阐明了团结奋斗对克敌制胜的重大意义，并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早在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就论述了民众大联合对改造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作用，认为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通过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指明了团结全民族力量对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指出“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②。

在阐明最大限度汇聚革命合力的重要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革命经验，特别是两次国共合作经验的总结，深刻认识到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必须以斗争求团结，必须同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或者投降叛变的倾向作斗争，而不是以退让求团结。毛泽东认为，斗争是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③，强调必须纠正那种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的观点，无论是发展进步势力，还是争取中间势力，都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如果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就不能发展进步势力，对中间派的动摇态度，要“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④，同时要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这是争取中间派的条件之一。

基于华北对敌斗争经验的总结，刘少奇也阐明了统一战线中斗争和团结的关系。1943年3月，刘少奇在总结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时指出，华北党的领导机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曾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在处理同大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曾“用单纯让步的办法和在行动上严格限制自己的办法，去企图求得大资产阶级诚心善意的合作”^⑤，甚至在国民党采用各种办法限制我们，向新四军部队实行无理摩擦和进攻时，也不敢采取自卫的斗争方针，而只是一味地让步，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大资产阶级的真心合作，反而助长了大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嚣张气焰，丧失了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大好时机，脱离了广大的中间阶层，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和危险的境地。他强调在同大资产阶级的合作中，“我们决不能只用让步的办法，必须进行适当的斗争”^⑥。

（二）“多”与“一”：正确处理多样性和一致性的关系

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有共同政治基础和奋斗目标，是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条件。同时，统一战线是多种社会政治力量的联盟，“如果中国只有一个阶级，一个党派，那就再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54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7页。

⑤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72页。

⑥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73页。

不要什么统一战线。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拿两个以上的阶级与党派之存在作前提的”^①，这就意味着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多样性，只有一致性或者只有多样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存亡更加突出地摆在各阶级面前的时候，不同阶级和政治集团在共同抗日的一致目标下团结起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如王稼祥所说，统一战线是对立的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同抗日是统一”^②。为了将一切抗日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建立坚固的统一战线，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这一共同纲领既是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也是一种约束，将加入统一战线中的团体和个人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构成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使得统一战线内部必然存在多种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在一定时期以矛盾对立甚至是摩擦冲突表现出来，掩盖或者忽视统一战线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对立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使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变为次要的和服从的东西，但这些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④。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中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有着深刻而明晰的认识，在多篇文章中进行了分析和阐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指出，在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警醒下和民族革命战斗的鼓舞下，不仅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国民党军官政客也加入到反日反蒋中来，使得当前的情形大不相同，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扩展了，强调“虽然这些人民因阶级利益之不一致，其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与程度也各有差异，但是，现在若果他们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⑤。瓦窑堡会议在分析目前政治形势特点和革命反革命战线变化的基础上，制定了党的策略路线，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同时，也认识到不同阶级阶层和团体等“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和立场”^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动机和立场不同，在革命斗争中，会有动摇叛变或者奋斗到底等不同表现。

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多样性，中国共产党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主张以朋友式的态度进行协商解决。邓小平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阵营在国内是团结四个朋友，但“朋友的团结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四个阶级的联合，而阶级与阶级之间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如劳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朋友之间要做工作，遇事用协商方法以求合理解决”^⑦。

（三）“进”与“退”：正确处理革命和让步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诚意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甚至作出一定的让步，但坚持有原则的、有限度的让步，而不是一味无原则地退让。

为了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作出四项保证，明确表示若国民党能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⑧等。毛泽东指出：“这些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41页。

② 《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

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1页。

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第536页。

⑦ 《邓小平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⑧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①，因为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国内两个政权的敌对状态，从而团结一致，共同抗敌。1948年1月，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进和退的关系，指出退一步的目的是准备前进，退一步的政策是主动采取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跟蒋介石合作，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这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相比是退了一步，但退一步并不是承认蒋介石不应该打倒，土地不应该分，“而是因为日本打进中国来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错误”^②。

同时，统一战线中的让步是有原则、有限度的让步，而不是无原则、无限度的，不能超出许可范围。毛泽东指出：“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保持”^③，就是让步的限度，且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强调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④，要坚决反对投降主义。1942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指出，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讲的就是统一战线原则，以及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强调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⑤。

三、坚持原则性，确保统战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决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方面，坚定原则性，为统战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掌握领导权：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通过汲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在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经历的曲折，进一步阐述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及其实现途径等内容。

周恩来系统总结了我们党在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曾发生的“左”、右倾错误，认为“右倾观点是不要领导权”^⑥，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曾在领导权问题上犯过错误，认为革命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自然是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也在领导权问题上翻了很多跟头，“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

毛泽东通过总结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农民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和沉痛经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跟着谁走，“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⑦，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事关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还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革命会取得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资产阶级在某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7页。

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3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8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

历史环境下,能够参加革命斗争,但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中则会动摇变节,这决定了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彻底性,才能使革命不至于流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如何才能取得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领导权并不是天然地属于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不是天然的司令官,其他力量特别是国民党集团,也在用尽一切力量来争取领导权,正是“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①,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在国民党转向抗日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由关门主义转向投降主义方面了,鉴于国民党对红军的限制和削弱政策,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以及共产党内存在的在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等,毛泽东指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②。刘少奇同样认为,资产阶级参加民族统一战线是好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了危险,这个危险是由资产阶级获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产生,在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逐渐成为主要危险,而在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最容易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的“总的问题当然是革命领导权的问题”^③,原因是对阶级力量和革命性的估计不正确,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放弃和忽视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是要葬送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革命的,必须防止右倾机会主义。

(二) 保持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的基本的原则”^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⑤,对于国内阶级间和政治集团间依然存在的矛盾,要适当地进行调整,“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⑥,阶级斗争要服从抗日的民族斗争,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要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

同时,在统一战线中,不能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毛泽东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⑦,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强调要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而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这样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的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中的所谓“一切经过”只是片面的服从,这样的口号是在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样的口号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⑨。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和加强自己的独立性,刘少奇提出了四点主张,包括任何时候和任何问题上,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要根据自己的观点分析每一个重大事变和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和办法,并根据自己的主张行动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坚决地独立起来,才能去影响别人,推动别人跟随自己的主张行动,“而不至于去接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2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7页。

④ 《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9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页。

受别人的影响，在别人的主张下动摇自己，甚至作别人的尾巴”^①。

在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②。毛泽东指出，对于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③，要采取和他们商量的态度，而不能把同盟者置之不理，采取独断专行的态度。

（三）坚持人民性：坚决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心就是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充分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通过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为克敌制胜提供了重要法宝。

国民党统治集团主要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将保全其所代表的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独裁统治，实行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使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出现深刻的裂痕，“造成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⑤，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⑥，并在解放区内建立了联合政府，将全体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基于民族资产阶级能够联合抗日，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比较苛刻地提出对工人的劳动保护要求，使资方难以获得应有的利益，也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劳资关系和劳动政策上，主张一方面为调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必须保护工人利益、改善工人生活，另一方面为形成共同抗战的局面，必须照顾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党派的利益，不能对资方提出过高的要求，要纠正“左”的劳动政策，兼顾劳资双方的合法利益，保护民族工商业正当发展，使民族资本家有利可图，以团结其参加抗日斗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多次指出要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强调土地革命时期尤其是土地革命后期，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为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林伯渠结合陕甘宁边区在保卫边区和促进抗战方面的实践探索，指出为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来投资，奖励工商业者扩展边区经济，边区政府在劳动政策等方面作出调整，废止了苏维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取消了对资本家和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⑦。

（四）发扬民主性：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进行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作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保证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7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4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

⑦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胜利的中心一环”^①，强调人民的动员离不开民主自由，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也是不行的，要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

国民党集团实行一党专政，制造反共摩擦事件，镇压民主运动，压制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残害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基于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赞同抗日，想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这一认识，为团结各抗日阶级，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并积极领导和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采取团结和争取的方针，为争取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揭露国民党集团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的统治实质进行了不懈努力。

毛泽东指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②。《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关于选举政策的规定指出，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第二章关于选举资格的规定同样明确，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不分阶级等的差别。

“三三制”政权既然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有不同阶级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有不同的政见、不同的立场，就必然产生政权的优势问题，也就必然有政治上的争论，党如何才能掌握对政权的领导，邓小平指出，“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③，要真正地发扬民主精神，开展民主政治斗争，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可以通过意见的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

四、余论

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面向未来，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实践中汲取历史智慧，启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坚持求同存异，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必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正确处理和协调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群体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页。

结构功能视阈下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效能研究

——基于 L 市界别工作“五机制”的分析

毛 慧

摘 要：提升政协协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基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需求，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深入分析 L 市政协界别工作“五机制”做法和经验，发现人民政协协商效能的发挥，受到政治、制度、文化、技术等诸因素影响。实践中，通过在提升环境适应能力、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强化组织力量建设、重视培育协商文化等方面发力，使政协协商效能发挥取得了切实成效。进一步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效能，应着重在突出政治引领作用，实现集中领导与分散实践的统一；健全制度规范体系，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优化内部结构关系，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构建社会价值体系，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结合。

关键词：人民政协；协商效能；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5) 01-0025-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强调在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过程中，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突出人民政协协商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服务人民机制建设”。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具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而政治协商作为人民政协的首要职能，对于发挥人民政协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结构功能视域下人民政协协商的价值功能

（一）政协协商具有凝聚共识功能，有利于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涌现出许多新兴阶层和利益群体。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这些阶层和群体又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亟须通过不同的渠道和形式表达。从人民政协的组织性质来看，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广泛设置界别，可以充分吸纳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为他们表达诉求、协商议政提供了重要平台。目前，“全国政协共设

基金项目：2022 年度杭州市社科规划“人民政协理论”专项立项重点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视阈下政协协商与其他协商的衔接配合研究”（2022zxll5）。

作者简介：毛慧，中共临海市委党校教育科副科长、讲师，浙江省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民政协理论。

界别34个”^①。在人民政协协商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界别、各团体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确保各主体之间平等协商,充分沟通交流,最大程度达成共识,有助于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保障正当诉求得以实现。人民政协协商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均衡各方利益,增进理解互信,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

(二) 政协协商具备建言资政功能,有利于促进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

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重要职能,也是人民政协发挥建言资政功能的重要渠道。为了提高建言资政的质量,人民政协围绕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依托各类协商主体,建立多元的协商平台,形成不同的协商民主形式,有利于最大程度地汇集民意民智。此外,人民政协内部聚集大量专业人士,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建言献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确保党和政府各项决策更加民主、科学。人民政协建言资政的过程既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也是促进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的过程。

(三) 政协协商具有示范引领功能,有利于推动民主政治有序发展

从人民政协的特色优势看,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人民政协协商借助多元化的协商平台,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围绕社会经济发展重要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广泛协商,并将协商结果及时告知相关部门,切实提高协商实效性。人民政协协商内容较广、形式多样、程序规范,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其他协商形式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政协协商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到协商活动中,培养了理性精神,形成了民主意识,提高了民主参与能力,有利于从整体上推动民主政治有序发展。

(四) 政协协商具有社会治理功能,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协商具备社会治理功能,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作用突出。一方面,人民政协协商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部分依托于人民政协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建立起共建共商的合作治理机制,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此外,以政协协商为重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社会各群体提供了表达意见建议、民主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改善了社会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协商为国家治理提供了资源支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多元主体通力合作、协同共治,借助人民政协协商平台建立有效沟通渠道,使国家、政党、社会之间合作不断深入。人民政协拥有数量众多的政协委员,界别优势明显,组织体系完备,可为国家治理提供组织和人员支撑。借助完备的组织体系,政协协商建立起从国家到县(市、区)级别的多层级协商平台,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提供参政议政渠道,形成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进而提高全社会的公共治理能力。

二、结构功能视域下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效能的影响因素

从理论层面分析,人民政协协商能产生良好的治理效能。但在实践过程中,人民政协协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梳理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影响人民政协协商效能的因素主要包括权力、制度、文化、技术等方面。

(一) 政治因素:政社互动的关系结构

行政体系、制度环境、利益关系等因素都能深刻影响人民政协协商的效能。各种因素之间相

^① 人民政协网:《“两会”问答^③ | 全国政协现有一个界别?》,2024年3月1日,<https://www.rmzxb.com.cn/c/2024-03-01/3499409.shtml>,2024年8月23日。

互作用,形成政社互动的关系结构,决定着政协协商的包容性、公平性和精准度。从行政体系角度看,我国(广义)政府是一种“条块”相结合的组织结构。“条”指的是纵向角度中央到地方职能属性相同的部门,“块”指的是横向角度由不同职能部门所组成的本级机构或同级相关机构。这种结构具有灵活性,能够很好适应我国国情,既能调动不同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又能使各级职能属性相同的部门发挥作用,实现中央的预期管理效果。但由于两种关系相互作用,这种组织结构容易引发条和块之间沟通协调不畅的问题,产生“条块分割”现象,影响治理效能。基层人民政协也会受“条块分割”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存在地位作用虚化、资源和人员配置不到位、协商权利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导致协商合力形成不充分,协商实效不足,制约协商效能提升。从制度环境角度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地方政府面临日益复杂的治理问题。维稳压力驱动以及中央政策倡导迫使地方政府改变原有的治理方式,探索建立更为公正、平等、包容的协商治理机制,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协调维护中,政府与社会间的分歧难以单纯依靠行政力量解决,要求政府采取更柔和的手段,广泛吸纳协商意见,积极推动制度建设,提升政协协商效能。

(二) 制度因素:政协协商的流程机制

政协协商的流程机制是提升政协协商效能的关键因素。系统、科学、操作性强的协商流程和运行机制能确保协商活动顺利开展,能增强议题的精准性、主体的平等性、过程的公开性及成果的实效性。基层政协最大的优势在于直面群众、深入基层,就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形成政协提案并向相关部门反映。人民群众的问题通过政协提案的形式反映,有利于引起有关部门关注,但问题最终能否得到解决取决于后期的监督反馈机制。人民政协协商经过多年制度化发展,已经形成“调研—选题—调研—协商—移交—反馈”环节贯通的全链条协商流程。但在实践过程中,基层政协对于反馈机制的建设较为滞后,提案落实常缺乏完整有效的跟踪评价机制,导致人民群众依靠政协协商解决问题的信心受到影响,进而降低群众通过该渠道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弱化人民政协协商效能。

(三) 文化因素:参与对象的民主能力

参与对象的民主能力,包括公民精神、政治效能感、沟通协调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公平公正意识等,其决定着政协协商的最终成效。政协协商的主体和对象涉及政协委员、各党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人民群众等,涉及面广、构成复杂,履职能力参差不齐。作为政协协商的主要参与者,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直接关乎政协协商效能。一些基层政协委员虽长期拥有委员身份,但鲜少提交提案,或提案质量不高,反映出其履职积极性不强,调查研究能力和问题分析能力有待提升。此外,县级政协委员虽有不少各界精英人士,但是存在老龄化现象。在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中,年龄偏大的同志和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较多,年轻干部人数较少,工作人员编制相对不足,政协工作队伍建设面临挑战。一些年龄偏大的政协委员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发展和新技术环境,如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等,也没有充分储备履职需要的知识,履职能力受制约,不利于人民政协协商效能的提升。

(四) 技术因素:数字技术的嵌入使用

当前,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成熟为其与政协协商结合使用提供了契机,数字技术成为影响政协协商效能的又一关键因素。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需要聚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建议,并借助技术手段进行科学系统分析,形成协商成果,而数字技术的嵌入和使用则能帮助政协协商更好地收集民意、表达民意、分析民意。传统政协协商由于受到协商条件、协商形式、协商平台等方面的限制,协商议题的范围、协商主体的广泛性与积极性、

协商成果的质量等都需要进一步提升。随着数字技术的嵌入和使用,网络议政逐渐兴起,多样化的数字协商平台不断出现,成为大众参与政协协商的重要渠道。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体现平等、包容的协商关系,促进协商主体的多元化、协商内容的多样化,丰富政协协商的形式,降低政协协商的成本,提升政协协商效率。但对于基层政协来说,数字技术的嵌入和使用存在一些短板。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流于形式。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本意在于提高政协协商效能,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层层加码和形式主义等情况,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并未真正实现。基层政协在技术、人力等方面存在较大短板,数字技术在基层政协的嵌入和使用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实效性不强的情况。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效能不高。一些地方基层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人员,年龄构成偏大,数字技术技能不足,难以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协商活动,难以很好地履行自身职能。此外,一些基层政协在进行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单纯注重外部环境的塑造,忽略政协委员能力素质提升和政协机关内部建设,造成政协委员与政协工作人员数字技术技能与数字化发展要求不匹配,难以切实发挥数字技术在政协协商领域的作用。

三、结构功能视域下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效能的实践样例分析

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由具备不同功能的子系统组成的,系统有效运行依赖于各子系统相互协调与总系统的动态平衡。社会系统的维持和存续要满足四个功能性条件,即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潜护功能,并构成了“AGIL模型”^①。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系统要素的功能发挥问题与人民政协协商效能提升问题存在理论契合性。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效能发挥要靠系统整体行动来实现,涉及政治、制度、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要素,党委政府、政协机关、政协委员、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都在此系统中各自发挥不同功能。

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政协协商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受到政治、制度、文化、技术等诸因素制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政协协商价值和效能的发挥。L市积极探索提升政协协商效能的工作模式,以界别工作为突破口,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创新实行“一界一委室、一季一协商、一村一委员、一年一考评、一月一联系”界别工作“五机制”。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笔者以L市界别工作“五机制”为例进行分析,借以探索基层政协提高政协协商效能的实现机制。

(一) 提升环境适应能力,实现治理效能转换

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下,“适应”功能主要指社会系统从外部环境获得足够的资源或能力,以及这些资源或能力在该系统中的配置^②,强调社会系统面对外部环境改变所作出的调整以确保其正常运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通过与多个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向社会传播“协商民主”理念,形成协商治理合力,将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

1. 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机制。社会系统必须要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当改变才能确保其持续正常运行。具体而言,人民政协是一种政治系统,需要适应环境变化,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新时代以来,为了提升政协协商效能,L市政协根据基层工作实际,创新实行“一界一委室、一季一协商、一村一委员、一年一考评”的

^① 王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的功能实现机制——对社会组织党建的个案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第119—126页。

^② 刘润忠:《试析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52—56页。

“四机制”，创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新模式，切实推动协商活动深入开展。界别工作“四机制”取得显著成效，被省政协评为年度创新案例，吸引省政协、台州政协领导多次莅临考察，多地县市区政协到L市进行专题调研。2024年以来，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L市政协在巩固界别工作“四机制”的基础上，增设“一月一联系”机制，形成迭代升级的界别工作“五机制”，助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2. 立足界别优势，强化资源引入。界别是人民政协产生、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王沪宁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强调，“要广泛联系和动员各界群众，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宣传政策、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坚定信心的工作，汇聚正能量、提振精气神”。人民政协的界别，联系代表社会中不同的党派、群体、阶层等，是人民政协为政治吸纳整合而设置的基本组织单位，具有鲜明的组织制度优势，为政协协商带来丰富的资源。从制度角度看，以政协界别为依托，搭建协商平台进行协商活动，为社会各界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使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最大限度汇集民意民智。此外，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也能帮助政协协商更好发展，提高适应能力。从组织角度看，不同界别的政协委员范围涵盖了各民主党派、社会阶层和团体，显示出巨大的包容性，汇聚了各类力量和资源。政协委员都具有一定的能力和人脉，能根据协商内容提供相应的资源支持，使协商议题顺利解决，使协商成果得以落实。充分发挥政协界别优势，吸纳更多社会力量，为政协协商发展注入社会资源，必将不断强化政协组织的适应功能。

L市政协结合工作实际，突出界别特点，发挥界别优势，强化界别联系纽带作用，探索实施界别工作“五机制”。“五机制”是围绕界别来开展的，其中“一村一委员”以界别为特色安排联系村、“一界一委室”以界别为单位组建工作室、“一季一协商”以界别为主体开展协商建言，最大限度发挥界别优势和集体力量，提升政协协商实效性。如“一村一委员”机制，根据委员自身特点、特长，以及行政村经济、文化、自然资源等实际情况，将委员特色与行政村所需进行精准对接，安排每名政协委员联系一个村，深入基层听民声、政策宣讲聚民心、助力发展献良策、环境整治促落实、服务民生办实事，取得了积极成效。在联村过程中，政协委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带去了全新的想法、可行的项目、充足的资金，吸引更多资源涌入，切实帮助解决行政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彰显政协委员履职担当。在参与联系村的台风抗灾活动中，城建交通组委员主动出资向受灾企业、学校捐赠50台大型高压清洗机；为了帮助联系村实现更好发展，财经组委员主动联系上海、杭州等多家乡村规划设计公司进行现场踏勘，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

（二）完善制度规范体系，保障协商目标达成

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下，“目标达成”功能主要指社会系统所具有的有助于确立其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而激发和调动该系统中之能力与能量的功能^①。换言之，人民政协协商要实现目标，必须对系统内各类参与主体行为进行协调规范，并调动内部资源实现所设定的协商目标。“目标达成”功能强调不同层级的目标达成情况。对于政协协商而言，协商内容是否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及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开展、协商流程是否规范符合程序、协商成果是否落实到位等因素制约着协商目标的最终达成。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健全规范体系，为协商目标的达成提供制度保障。

1. 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人民政协协商本质上是对不同利益诉求进行整合以寻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一方面，参与政协协商的多元主体都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协商目标也各有差异。而在开展协商活动的过程中，人民政协可将其丰富的文化价值理念与完善的制度设计融入其中，这对于协

^① 刘润忠：《试析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理论》，第52—56页。

调多元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完善政协协商制度体系建设是确保协商活动正常开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保障协商活动达到既定目标的关键举措。健全政协协商制度设计可适当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丰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规范和提高多元主体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意识和能力,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价值诉求,助推协商目标顺利达成。

为了确保“四机制”落实到位,L市先后出台《关于实行“四机制”实施方案》《关于在政协委员工作室(界别组)设立党小组的通知》等,建立委员工作室工作规则、党小组工作职责、规范提升界别活动制度、委员联村工作职责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形成“3+X”的制度保障体系,推动政协协商工作向制度化方向发展。L市的主要做法和经验,一是重视工作保障机制建设,为协商活动开展和协商目标达成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市财政安排两万专项活动经费拨付于每个委员工作室,用于保障协商活动持续开展。二是每个界别工作室配备一名素质较高的相关领域工作人员为联络员,由市政协办公室统筹管理,负责活动联络、信息传达、台账管理等,推进工作室活动规范高效运行。三是强化激励监督,推行“一年一考评”机制。每年年底专题听取“五机制”工作情况,开展工作交流和先进评比,把落实“五机制”情况纳入委员日常履职的考评之中,作为委员下一届留任的重要依据。建立委员履职三色反馈制度(即红色为优秀、粉色为较好、黄色为较差),并向所在单位反馈,以激发委员履职积极性。

2. 推进政协协商规范化建设。对协商内容、形式、程序进行规范,一定程度上能防止协商过于随意、流于形式,提升政协协商效能。L市政协界别工作“五机制”聚焦界别协商,通过推行“一界一委室、一季一协商、一村一委员、一年一考评、一月一联系”机制,积极推进政协协商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政协协商实效性。实行“一界一委室”机制,要求每个界别设立一个委员工作室,并先后制定《界别组委员工作室规则》《界别组委员工作室年度工作考评办法》等,明确工作室工作职责要求以及相关协商流程。推行界别工作室标准化建设,要求有固定场地、有统一标识、有专门联络员、有活动安排、有工作台账。建立市政协副主席联系专委会、专委会联系委员工作室制度,为界别委员工作室理论学习、工作交流、协商建言等提供指导。实行“一季一协商”机制,各界别依托委员工作室一个季度开展一次协商活动。经过前期调研精选议题,邀请相关人士参与其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协商活动,将重要的意见建议提交市政协主席会议协商讨论,形成主席会议建议案,报送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规范协商活动流程,确保协商成果及时得到处理和反馈。

(三) 强化组织力量建设,整合多元主体关系

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下,“整合”功能主要指社会系统的连贯性或一体化的维持问题,包括控制手段的建立、保持子系统的协调、防止系统发生严重混乱等^①。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任何系统都是由多个子系统组成,为了确保整个系统高效运行,必须保持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协调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形成相互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人民政协巨大的包容性,要求其充分整合广泛构成其内部成员的社会各方面力量,这就意味着整合功能是人民政协协商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人民政协协商中的整合,包括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共与各界别及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人民政协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除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外,人民政协内部的多元主体所代表的各方面人士允许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号召力及公正无私、博大包容的胸怀气度和卓越的领导艺术,政协协商就难以整合其内部复杂多样的成分,充分协调各方面力量,发挥其最大效能。L市政协通过强化党对政协的领导和各方面组织力量建设,提升政协整合能力,从而提升协商效能助推协商目标高效完成。

^① 刘润忠:《试析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理论》,第52—56页。

1. 坚持党建引领,协调内部关系。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原则。L市政协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在政协内部建立党组织,发挥党“政治上统领、思想上引领、行动上带领”^①的作用,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利益整合、价值整合。一是在政协内部,党组织运用政策制度等方式规范人民政协协商,协调内部关系结构。二是党组织将内部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传达到同级党委政府或上级党组织,成为各民主党派、各界别、各社会团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三是通过党委政府工作与政协协商之间的有效衔接机制,人民政协促成党委政府与社会上各团体、各界别的沟通协作。

人民政协承担凝聚社会共识的重大使命,但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阶层、群体,代表各自联系的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组织管理相对松散,价值利益整合难度较大。如何发挥人民政协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协委员中的党员管理,提高组织凝聚力是当前政协工作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L市政协坚持贯彻落实“支部建在界别上,委员聚集在党旗下”^②的工作要求,以界别工作“五机制”为重要抓手,以委员工作室为重要平台,通过在委员工作室成立党小组,进一步完善政协系统党组织建设,形成“市政协机关党组、机关党总支、机关各支部、界别党小组”的组织架构,实现政协系统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在组织建设方面,设立14个界别党小组,所有党员委员都编入所在界别的党小组,定期开展理论学习、党性教育等活动,引导委员在履职过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思想政治引领作用,确保政协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制度建设方面,先后出台《市政协机关党组工作规则》《市政协党支部党建责任制和工作制度》《界别党小组工作职责》等工作制度,明确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政协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建立“三联结对”制度,探索形成党组成员、党员常委及委员与民主党派、社会各界别、各人民团体人士联系结对、走访联谊等制度,听取他们的愿望诉求,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

2. 加强队伍建设,夯实组织力量。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是政协协商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对于强化政协协商整合作用、提升政协协商效能具有重要作用。政协委员都是各自界别的代表,其政治参与能力在一定程度决定着能否充分代表和反映本界别的利益诉求。因此,加强政协队伍专业化建设、优化政协协商的整合能力是提升政协协商效能的关键所在。

针对政协基础工作薄弱、人员力量薄弱的问题,L市政协专门印发《关于建立界别委员工作室联络员队伍的通知》《关于建立镇(街道)政协工作联络员队伍的通知》,加强政协工作人员配置,建立了乡镇、界别两支政协工作联络员队伍,共33人,延伸政协工作触角,为打通政协工作“最后一公里”提供了人力支撑。此外,为了更好发挥政协委员在协商中的主体作用,L市政协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多措并举提升政协委员综合素质。在理论方面,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开展专题学习会、主席读书会、政协讲堂及委员脱产培训等活动,集中学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了解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及时事形势,培养民主政治素养和意识,提高政治敏锐度和政治执行力,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在实践方面,推行界别工作“五机制”,引导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各类协商,通过不断参与实践活动提升民主参与能力。在原有“四机制”的基础上,增设“一月一联系”机制,每名委员自主联系10名以上界别群众,通过上门走访、交流座谈等形式,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界别群众联系互动,填写《联系界别群众情况登记表》,并把相关工作纳入履职考核。依托界别工作“五机制”,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协商履职活动,锻炼调查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解决

① 李旭辉、江生亮:《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与组织优势的效能优化》,《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60—70页。

② 李旭辉、江生亮:《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与组织优势的效能优化》,第60—70页。

问题能力,提高民主参与能力。

(四) 重视培育协商文化,厚植协同合作根基

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下,“潜护”功能主要指社会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储存和配置能量的能力,包括运用符号、观念、价值等文化供应而实现模式维持,以及运用共同价值规范处置和消除系统行动内在紧张的张力^①。实现模式维持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共同的价值文化能有效规范和引导个体行为,增加社会认同感,提升社会凝聚力,从而形成政协协商合力,提升政协协商效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产生一些新兴阶层。同时,受到多重文化的影响,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利益矛盾不断交织,部分群众把个人利益作为行动逻辑,社会共同价值和集体主义一定程度上出现淡化,社会系统的凝聚能力面临下降风险,凝聚共识工作空前艰巨。人民政协协商通过搭建多元化的协商平台,邀请社会中的多元主体参与相关议题协商活动,为社会各界别提供平等表达价值诉求的渠道,并在最大范围内协调利益关系,寻找最大公约数,维持政协内部及社会整体稳定。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的人民政协协商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文化核心内涵体现为求同存异、民主团结、凝聚共识的价值导向。因此,发展和培育人民政协协商文化对于协调系统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人民政协协商目标、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L市政协高度重视协商文化建设,立足自身特色实践,积极探索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文化的培育路径。一是挖掘地方特色,充实协商文化内涵。发展和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文化能增强政协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也更易于当地民众接受和学习。L市将本地的府城文化、宋韵文化与协商文化相结合,不断充实协商文化内涵,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品牌。编辑出版的《临海政协文化》,集中展示了L市政协协商成果,宣传了L市地域文化,实现以文化人、以史聚力。二是创新转化形式,扩大协商文化影响。创新政协协商文化的载体转化方式,实现政协协商文化的多样化呈现,有助于扩大政协协商文化的影响力。L市政协利用数字化技术,充分运用各类媒体,采用多种形式宣传政协协商文化,不断提高政协协商文化的传播力。为了普及政协协商知识,L市电视台开设“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专栏,制作协商议事月活动综述专题片,向社会大众展示政协协商的全过程。此外,运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设立《请你来协商》《委员风采》等栏目,集中展示政协协商成果、政协委员履职风采。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使社会大众清楚知晓政协协商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政协协商奠定了民意基础。三是深入基层实践,营造协商文化氛围。除宣传之外,L市政协通过搭建多样化的协商平台,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到协商活动中,通过实践活动切身感受政协文化的熏陶,培养协商意识,提高协商能力,促进政协内部及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协商氛围,形成政协协商合力。

四、结构功能视域下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效能的行动路径

基于对影响政协协商效能制约因素的分析,结合L市界别工作“五机制”案例,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剖析提升政协协商效能的实现机理。

(一) 适应层面:突出政治引领作用,实现集中领导与分散实践的统一

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开展政协工作的根本前提。政协协商能广泛汇集各方意见,凝聚民智民意,推动党和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持续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同时也使人民

^① 王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的功能实现机制——对社会组织的功能实现机制》,《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第119—126页。

群众更全面地了解党的大政方针和政治主张。在发展政协协商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突出政治引领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突出政治引领作用能为人民政协协商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人民政协协商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邀请社会不同群体建言献策,并把各群体的利益诉求转达给党委政府,促进党委政府决策科学民主。因此,重视政协协商和党委政府工作的衔接配合,才能充分体现党的领导,及时准确贯彻党委的要求,把握人民政协协商发展的正确方向,提高政协协商效能。另一方面,突出政治引领作用能为人民政协协商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适应”功能强调社会系统资源获取能力。人民政协协商完成协商目标、提高协商效能,都离不开大量资源的支持。党组织掌握多形式多方面的资源力量,包括人力资源、经费资源、信息资源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有利于强化对政协协商的资源供给,实现政协协商目标。

就基层政协而言,政协协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通常与基层协商相衔接,围绕具体而细微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和途径。由于地域发展状况各不相同,各地在实践过程中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尝试以便更好地达成协商目标,这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和分散性^①。虽然各地探索发展政协协商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彰显了协商民主平等包容、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集中领导与分散实践相统一,既为政协协商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资源支撑,又尊重了地方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激励地方进行自主创新从实践中寻找解决办法,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二) 目标层面:健全制度规范体系,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目标达成依赖于对各类资源的调动以及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引导,这就需要建立起相关的制度体系确保资源调动和行为引导顺利开展。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一项具有全局性的事业。因此,要健全政协协商制度规范体系,保障政协协商平稳运行,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一般而言,制度体系内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者并不是毫无关系,而是兼具不同的职能,共同作用于事物发展全过程。一方面,正式制度。与其他协商形式相比,人民政协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度较高,陆续出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制度,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职能、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协商流程等作出明确规范,为人民政协协商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虽然人民政协是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协商形式,但是也存在着不够健全完善之处,如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机制。在探索阶段,大部分的实践探索仍是非制度性的,缺乏严谨的制度设计,也没有严密的制度流程。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进程的加快,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的探索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对于协商议题选择、协商议程设置、协商结果落实等都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规范体系,极大地提高了政协协商参与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但仍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由此可见,人民政协协商以正式与非正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既包含探索性的尝试,具有高度的适应性,也不断总结经验做法并将其上升为正式制度,提高规范性和权威性,提升政协协商效能。

(三) 整合层面:优化内部结构关系,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整合功能是整个系统正常运转的核心。为了确保系统正常运行,需

^① 韩志明:《灵活的适应性机制——基层协商民主的弥散化发展及其效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43—53页。

要协调各子系统之间的行为规范,统筹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协同合作,达到既定目标。

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能促进社会关系整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依靠独特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人民政协搭建多样化的平台,为不同主体提供利益表达渠道,并通过有效的运作机制对意见诉求进行整合、处理,不断协调优化社会结构关系,形成最大范围内的利益共同体,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

实现人民政协整合功能,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多元化的人才队伍。一是组织保障。党组织作为一种权威性力量,具有较强的整合功能,能高效动员链接各类资源,并通过学习、引导等方式规范多元主体行为,在组织、协调、整合各方关系基础上形成行动共同体,推进政协协商目标的达成。二是队伍建设。政协委员是政协协商活动的主要参与力量,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影响着政协协商整合功能的发挥。政协协商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协商形式,要求参与主体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较高的参与能力,包括沟通协调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政治把握能力等。为了实现目标达成共识,政协委员前期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最大限度集中民智民力,在协商过程中要与各方开展平等理性的沟通协调,协商之后要与相关部门或群体通力合作,以确保成果落地。

(四) 潜护层面:构建社会价值体系,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结合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潜护层面的功能是由文化系统来承担。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是社会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能为达成共同目标凝聚力量。而在系统内所存留的文化是经过时间洗礼的,也是被行动者接受和认同的,并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的观念意识和行为习惯。

协商文化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体系,是政协协商正常开展的内在支撑。因此,要重视培育协商文化,构建社会共同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协商民主思想元素,比如“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兼听则明、集思广益”等价值观念。此外,中国古代社会也开展过具有类似性质的实践活动,既有国家层面的“咨询”“朝会”等形式,又有基层社会的“乡议”等形式。这些形式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与当代的协商民主文化内涵具有高度一致性,为政协协商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新时代以来,以政协协商为重要代表的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重要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参与政协协商活动,有利于各方面的行动者形成平等理性、开放包容等精神。这些精神为新时代协商文化注入丰富的时代价值,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有机融合,极大地激发了政协协商发展的内生动力。

责任编辑:罗 雷

协同治理视域下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研究

方 烨，刘艳云，王 峰

摘 要：在我国七大协商渠道中，政协协商相较于其他的协商渠道，具有更高的成熟度与规范化水平，是发挥国家治理功能的重要形式。以政协协商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天然优势与逻辑必然性。基于政协协商价值功能与基层治理共同体本质属性的耦合，以浙江省H市“两山协商驿站”民主协商平台实践为案例样本，运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探讨政协协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作用机制与推广路径。研究发现，基层政协能立足于基层社会的协同环境，通过激发协同动因、驱动协同引擎、畅通协同流程、推进协同行为、落实协同结果，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主体激活、主体增能、共识凝结、资源整合、行动协同、意义构建。实践表明，以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可以尝试的恰当路径，但需要注意打造协商平台、激发协商意愿，加强权威保障、畅通参与渠道，注重反馈转化、保障协商成果落地落实。

关键词：协商民主；政协协商；社会治理共同体；协同治理；“两山协商驿站”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5) 01-0035-10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社会不断经历结构性演化，新的社会矛盾显现，给基层社会带来新的治理难题。面对新时代基层治理中多元利益主体与复杂的治理任务，以单主体的“行政主导”或“村居自治”为导向的传统治理逻辑已经难以满足基层社会良政善治的治理愿景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目标，迫切需要更多的治理主体进入基层治理场域发挥作用。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报告都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①，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然而，基层治理共同体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多元主体、制度体系、社会环境等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如何统筹多样化的治理资源构建基层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乡镇政府承接赋权的运行困境与优化对策研究”（23BZZ055）；浙江省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村级小微权力监督的优化路径研究”（23NDJC434YBM）。

作者简介：方烨，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刘艳云，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教育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王峰，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会治理共同体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在新的治理语境下,基层治理现代化领域一个已明确的行动向度就是要充分且持续发挥协商民主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基层协商民主凭借直接、广泛和有效的参与为多元治理主体提供了利益表达渠道与合作机制^①,有效避免了“社会结构多元化背景下基层群众动员性与被动式政治参与的弊端”^②,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特点与优点。当前,我国协商民主体系主要由七种协商渠道构成,且七大渠道在协商主体、内容、程序、适用领域等方面各有差异。其中,政协协商相较于其他的协商渠道,具有更高的成熟度与规范化水平,是发挥国家治理功能的重要形式。面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③的治理现状,以政协协商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可以尝试的恰当路径。然而,政协协商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具体样态是怎样的?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相耦合的驱动逻辑与运作机制又是什么?这就成为本文的核心问题与研究重点。

基于对“政协协商”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的关切和回应,学术界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提出。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提出“真正共同体”概念,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强调个体与共体的和谐共生^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正式被提出,国内学者们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不断深化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在理论层面,学者们聚焦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⑤、构建逻辑^⑥、内在特点^⑦等方面开展研究,期望厘清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边界与主要特征,探明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政治等概念的内在关联。在实践层面,学者们聚焦社会治理共同体生成与发展的过程^⑧、参与主体的互动关系^⑨、结构要素的有机联系^⑩等,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需要处理的多维关系。另有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提出政治、法治、德治、自治与智治“五治”融合^⑪、地域文化与微观文化体系嵌入^⑫、情感共融等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方案。

① 张贤明:《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行政论坛》2023年第1期,第27—32页。

② 李建:《基层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路径探析》,《理论月刊》2017年第9期,第103—109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

④ 唐语琦:《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内在意蕴》,《经济师》2023年第12期,第28—29页。

⑤ 方堃、明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内涵及形塑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7期,第87—95页;张磊:《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及其构建可行性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39—50页;郝建兴:《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公共管理评论》2019年第1期,第59—65页。

⑥ 李永娜、袁校卫:《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8—23页;郑志钢:《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思想战线》2023年第3期,第75—81页。

⑦ 陈宜、王征兵:《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分析和实践路径》,《理论视野》2023年第3期,第75—80页。

⑧ 胡小君:《民主协商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价值、实践与路径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第25—31页。

⑨ 李永娜、袁校卫:《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8—23页。

⑩ 方楚、明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内涵及形塑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7期,第87—95页。

⑪ 刘琼莲:《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评价标准:秩序与活力的动态平衡》,《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11期,第31—36页。

⑫ 贺芒、陈彪:《文化嵌入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缘起、模式与路径》,《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12期,第85—87页。

既有研究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始终遵循多元协同共治、协商共建共享的发展趋势,其多主体互动、共享共治的目标与政协民主协商、有序参与的内在要求,增同减异、凝聚共识的功能价值存在耦合。为进一步理清运作机制,学者们围绕政协协商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作用优势、现实困境、实践路径等开展研究。人民政协作为国家的政治协商机构,凭借其在组织、治理、功能、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在社会治理中发挥“过渡、润滑、协调和缓冲作用”^①。人民政协的有效运转,既有利于畅通人民群众的诉求渠道,化解基层矛盾,也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效破解基层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②。但是,有学者也发现人民政协在参与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仍存在“组织悬浮”“中梗阻”,以及过度精英化、“老年化”等治理困境,弱化了政协的作用。另外,政协在基层治理场域的介入是一种“碎片化”介入,导致其长期以来“合法性有余而有效性不足”。对此,需要变更介入协商的方法与机制,引入精准介入^③,也可以通过界定治理边界、明确功能定位、完善长效机制等方式改善政协参与的实际效能。另有一些学者关注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优秀实践案例^④,从中总结政协有效参与的实践经验并提出优化路径。

整体来看,现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有益启示,但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一是当前研究多应然路径分析,缺少基于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然性经验提炼,也缺乏基于典型案例分析政协协商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发挥机制。二是“政协协商”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叠加研究还不够深入。当前研究主要是基于协商民主角度开展,且从协同治理视角开展的研究较少。因此,笔者借鉴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H市“两山协商驿站”(以下简称“协商驿站”)实践为案例样本,探讨政协协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作用机制与推广路径。

二、政协协商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逻辑必然

以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的必然要求,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具有天然优势与逻辑必然性。

(一) 政治逻辑:扩大政治共识、激发政治活力的必然要求

人民政协自成立之日起就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存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高度的包容性特点,能团结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统一战线贯穿于人民政协工作始终。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民政协要通过政治协商不断巩固多元主体共同的政治基础,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而“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⑤人民政协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在基层场域内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其本质就是动员和整合多元力量进入基层治理,通过广泛参与、信息共享、公开讨论等途径行使权利、达成共

① 韩金峰:《发挥好人民政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11期,第41—44页。

② 叶本乾、桂智鹏:《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路径研究》,《党政研究》2023年第5期,第73—81、126页。

③ 张丙宣:《人民政协精准介入基层协商的机制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16—23页。

④ 朱国华、王建新:《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下的多元主体共治重构》,《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第34—41页;杨卫敏:《治理共同体视阈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研究》,《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4—11页。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识,进而推进基层治理相关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基层治理激发民主政治的活力。

(二) 制度逻辑: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一些地区在人民政协四级组织架构基础上,依据“不建机构建机制”原则,在基层建立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机衔接的协同机制,例如浙江的“请你来协商”、江苏的“有事好商量”、湖北的“协商在一线”等。尽管政协在基层治理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不可否认基层政协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民主监督等实际工作中仍存在工作基础、人员力量等相对薄弱的问题^①。基层政协在结构与功能上的“悬浮”呼吁政协协商进一步向基层倾斜,凭借更强有力的制度规范保障基层政协作用的发挥。另外,基层协商民主虽然在长期的治理实践中获得了发展,但本质上仍是一种零散协商、被动协商,缺乏系统性、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协商过程常常难以达成既定目标。基于此,政协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有效途径,对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具有积极意义。

(三) 实践逻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基层治理单元承担了更多的职能,基层管理权力格局也从政府为主导的公权力负责制演化为多元主体复合共治。基层治理发展到了“秩序建设和深度协商”阶段^②。基于此,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进一步协调基层社会发展过程中新旧权力主体的相互关系与利益诉求,巩固多元主体的政治共识,需要在基层治理的场域中统筹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实现基层协商民主创新。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职能特点、作用发挥契合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以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能有效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汇聚共识,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方面的作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分析框架与案例选择

(一) 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分析框架

二战后,政策制定目标与实施成效的巨大落差,以及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机会的增多,使传统政府官僚制管理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协同治理理论由此诞生并不断发展。2008年,美国学者克里斯·安塞尔和艾莉森·盖升在分析了137个协同治理案例后提出了SFIC模型^③。SFIC模型主要包括四个核心要素(如图1),即起始条件(Starting Conditions)、催化领导(Facilitative Leadership)、制度设计(Institutional Design)和协同过程(Collaborative Process)。具体来说,起始条件是促进或阻碍多元主体开始协同的各种情境,包括各主体在权力、资源等方面的不对称,各主体的协同动机,初始信任程度等变量。催化领导是协调各主体参与协同过程,提升协同精神的领导方式,包括对参与主体的增权赋能、有效引导等。制度设计是多主体协同的程序性保障,以明确的协议规则、良好的制度设计保证协同治理的顺利开展。协同过程是多元主体通过有效的沟通、协商、合作参与到协同治理的具体过程,是整个模型的核心,直接关系到协同治理的实际效果。

①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政协报》2019年9月21日,第2版。

② 李翠玲:《从发展到生活:当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转向》,《新视野》2019年第5期,第72—78页。

③ Chris Ansell and Alison Gash,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18, no. 4 (2008), pp. 543—5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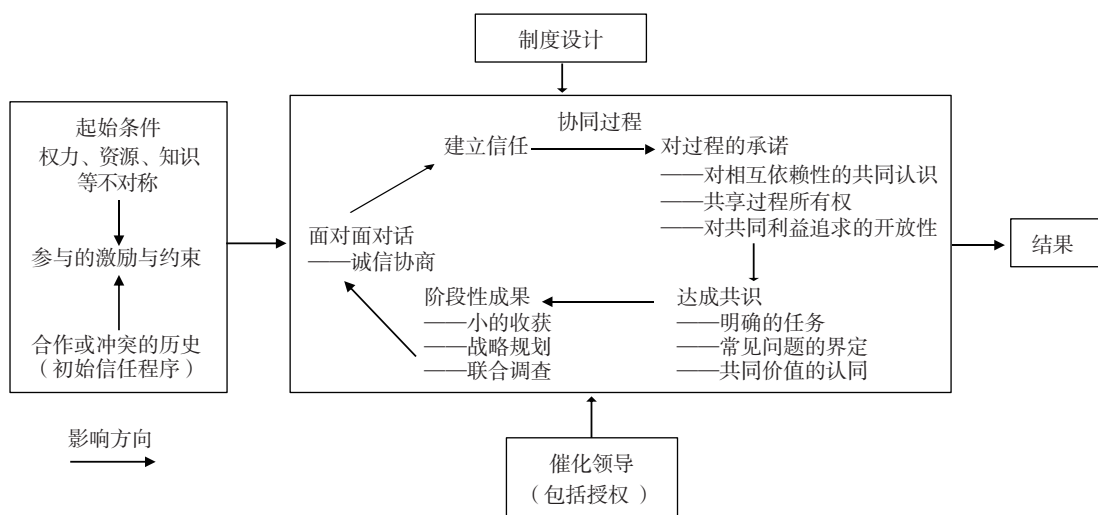


图1 SFIC模型

对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而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已成为共识。协同治理理论强调的多元主体有序参与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求的“多层次良性互动”、成果共享具有内在耦合性。尤其是SFIC模型对多元共治逻辑与运行机制的解释力适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模型需要。但是，SFIC模型应用到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忽略了外部环境的影响。政协协商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和结果会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研究框架有必要纳入外部环境因素。二是对协同结果的探讨不足。协同结果的落地、监督、评估、反馈是整个协同过程的关键环节，决定着后续协同治理走向，应当予以重视。因此，为了更精准地阐明政协协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行动逻辑，本文对SFIC模型进行修正，形成了包括协同环境、协同动因、协同引擎、协同流程、协同过程、协同结果六大要素在内的协同治理分析框架（如图2）。具体而言，“协同环境”是指对协同全过程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同动因”是对“起始条件”的修正，包括各主体的资源禀赋、参与动机、价值观念、利益诉求、信任基础等影响协同治理的非环境因素。“协同引擎”是对“催化领导”的修正，包括通过组织学习、增权赋能激发协同意识、提升协同能力、促进有效参与、实现资源整合。“协同流程”是对“制度设计”的修正，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透明的流程、开放参与的程序等。“协同行为”是对“协同过程”的修正，是多元主体直接参与的行为。“协同结果”是指通过监督、评价、反馈等举措推动成果的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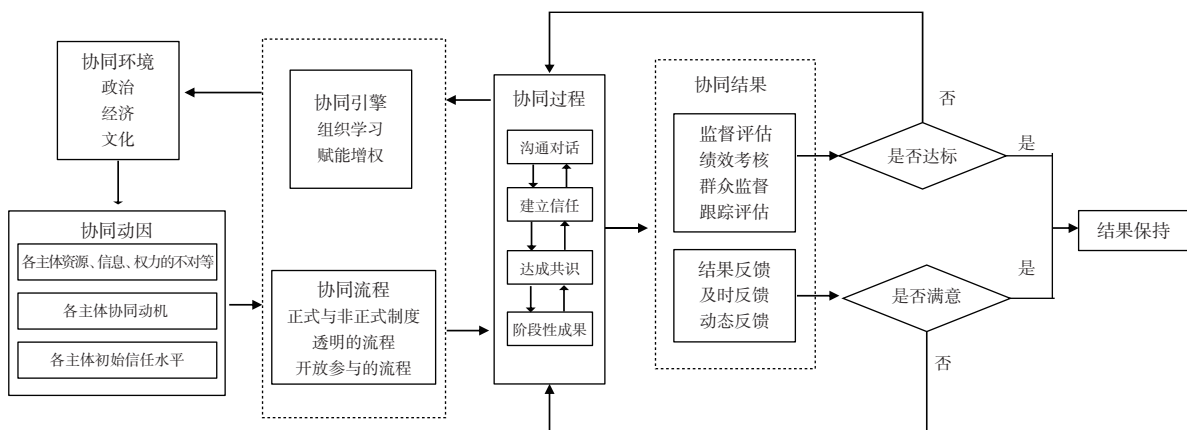


图2 协同治理分析框架

（二）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典型案例

案例研究是社会研究领域的常见形式，能“系统展现因果机制和过程”，深刻“呈现事实中的行为特征、关键条件、动力来源和因果联系”^①。当前，以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仍处在探索阶段，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分析有助于总结提炼一般性原理和经验，为基层实践提供借鉴。

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基层一直存在“基础工作薄弱、人员力量薄弱”的结构性难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功能“悬浮”。浙江省为充分发挥政协民主协商对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自2021年起在全省乡镇（街道）推动创建“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平台。H市为了进一步打通政协民主协商的“最后一公里”，推进“民生议事堂”平台向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延伸，结合浙江省政协“协商驿站”平台建设工作部署和“两山”理念发源地的优势^②，在2022年创造性地开展了“两山协商驿站”政协民主协商活动。为此，H市制订了协商驿站的建设方案，明确了以村社委员小组为内核，以县政协委员组成的履职小组（以下简称“履职小组”）为主体，广泛邀请相关界别群众，组成议事团体，围绕事关村庄长远发展和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开展广泛协商。“协商驿站”以“开门是群众、出门是基层”为目标，按照“1+N”的建设思路，做到有场所、有机制、有主体、有计划、有活动、有成果，形成N个协商现场，即哪里有困难、矛盾、需求，就在哪里协商。通过资源整合、功能融合，探索“一堂一品”“一站一品”建设，充分彰显政协协商的特色、质量与水平。目前，H市所有行政村均已实现“协商驿站”建设的全覆盖。自建立以来，“协商驿站”民主协商平台已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在平台建设、议题选择、协商流程、成果转化等方面形成鲜明特色，依托其开展的基层民主协商活动极大地促进了H市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四、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

通过对H市“协商驿站”民主协商平台实践的考察，发现基层政协能立足于基层社会的协同环境，通过激发协同动因、驱动协同引擎、畅通协同流程、推进协同行为、落实协同结果，有效推进基层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主体激活、主体增能、共识凝结、资源整合、行动协同、意义构建。

（一）激发协同动因：社会治理共同体主体激活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多元治理主体出于解决社会问题、提升治理效能等共同的目标而形成的相互合作、相互关联的群体。如何将多元主体有效组织起来，使他们充分参与治理过程，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首要解决的问题。对协同动因的激发可以充分调动参与动机，促进多元主体相互协作、利益整合，进而推进协同治理。面对基层治理场域中各主体掌握的知识、资源、信息等不对等的问题，H市政协在“协商驿站”民主协商平台建设上，充分发挥多方主体的优势，以共同的利益目标牵引协同动机。“协商驿站”开展协商活动前，一般由乡镇政协工作联络组组长兼任履职小组召集人，保证“协商驿站”充分调动多方力量和资源；建立村委会“协商驿站”议事小组，召集人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并联系该村的县政协委员担任共同召集人，其他成员一般为政治素质高、参政议政能力强、具有一定威望的本村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在协商主体结构上，充分考

^① 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126—142、207页。

^②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安吉县余村考察，对余村关停矿山、靠发展生态旅游让农民借景致富的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湖州市因此被称为“两山”理念的发源地。

虑议题类型、重要性、复杂度和所涉人员的范围、参与协商者的代表性等因素,将履职小组内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政协委员、基层群众、专业人士、利益相关群体、党政部门负责人等多元主体纳入协商主体范围。H市“协商驿站”激活了协商的初始条件,吸纳并动员了具有明显协商意愿且来自社会不同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多元主体,围绕基层群众关切的问题共同开展深度协商,推动了基层协同治理充分开展和创新发展。

(二) 驱动协同引擎: 社会治理共同体主体增能与共识凝结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参与主体具备思想共识、协同能力,进而有效参与到协同过程中。政协协商可以通过议题设置、组织学习、主体增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协同意识、协同能力,促进其有效参与。对此,H市“协商驿站”民主协商平台主要从两方面做文章。

一是协商议题聚焦民生,增进主体共识。选题在整个民主协商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从传统政协协商的议题选择看,政协协商更加关注国家社会在宏观层面面临的问题,对普通群众来说具有“距离感”“疏离感”。“协商驿站”通过议题收集、登记、筛选、审定、报备五步选题流程,规避了基层协商流于形式和随意性等问题,在议题提出的各个环节充分征求多方的意见建议,尤其是让基层农民群众参与进来。在选题的方向上聚焦基层党政关注的要事、民生改善的实事、社会治理的难事,注重选择切口小、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开展协商议事,让协商更加贴近农民群众、更能凝聚思想共识。

二是提升主体参与能力,实现主体增能。唯有提升多元主体参与的广度、力度和深度,基层社会治理才能避免冷漠化、无序化的困境。对此,一方面,“协商驿站”民主协商平台工作制度明确要“采取微课堂、微讲座等形式,组织县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及时了解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促进知情明政”。另外,“协商驿站”民主协商活动的常态化、经常化开展,也使广大农民群众理性参与、合法表达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得到很大锻炼和提升。另一方面,“协商驿站”为履职小组内的政协委员联系基层群众提供了平台,使相关界别(如农业界、教育界等)的政协委员能更好地服务于基层社会发展。

(三) 畅通协商流程: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资源整合

协商民主“一旦离开可操作化的程序,就没有真正的治理效率”^①,这一特点表明,要实现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互信互助、平等协商,需要强有力的制度、规范化的程序、标准化的流程予以保障。H市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协文件精神及工作部署,制定了“协商驿站”周详的实践方案和运转规则。平台在运行中,以党委政府权威给予平台运行强政策保障,以相关部门的制度化参与保障平台有效运行和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另外,H市“协商驿站”协商议事按照“议事前、议事中、议事后”明确议事程序,规范开展协商活动(如图3)。协商讨论秉持“公正理性、求真务实、平等互信、开放包容”的协商文化,强化互动交流,实现民主共识。协商结束后,协商意见在整理后会通过协商建议、协商纪要等形式报送给镇街政协工作联络组和区政协。在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和区政协指导下,各村“协商驿站”的协商活动会邀请镇街联系领导参加,每年开展频次不少于两次。当前H市大部分行政村的“协商驿站”月月有协商活动,解决了很多基层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于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① 董明:《新时代赋能基层治理的地方政协探索——基于浙江“请你来协商”实践的分析》,《治理研究》2021年第4期,第71—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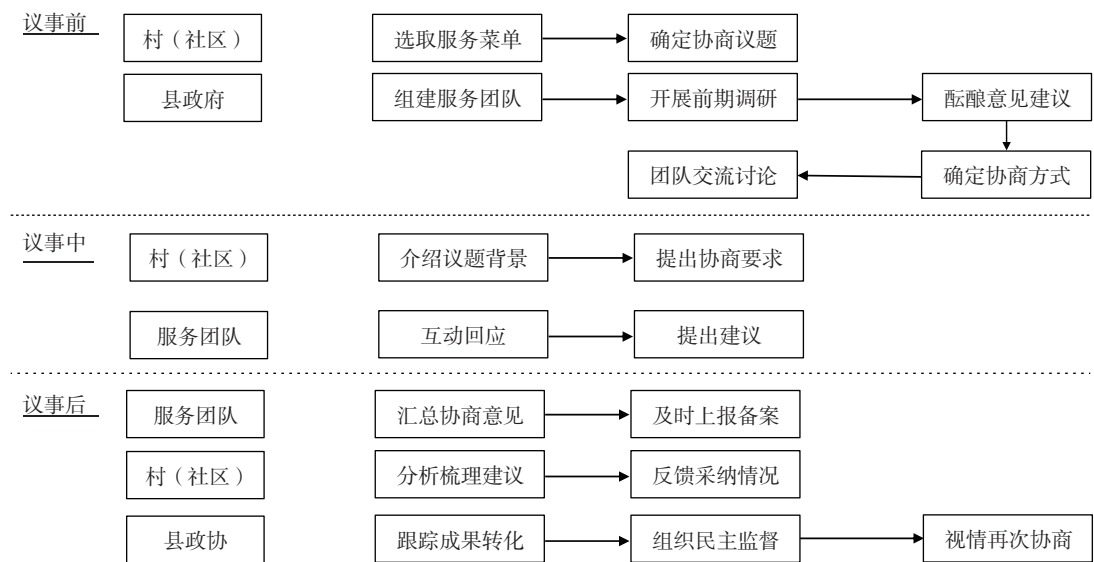


图3 H市“两山协商驿站”协商议事程序

（四）推进协同过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行动协同

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杂利益相互交织的集合体。协调多元利益、消解利益冲突、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目标。而政协协商就是通过沟通实现利益与秩序、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与兼容。协商所要解决的是公共事务，需要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客观来说，参与协商的人越多、收集的意见反馈越多，产生的决策与治理结果也会愈加民主与科学。但如何促进多元主体开展有效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实现利益融合进而凝聚共识是政协协商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此，H市“协商驿站”一方面通过搭建协商平台，在多元主体间建立有效沟通与相互信任。“协商驿站”在协商中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促进多元主体在不受干扰的充分互动中自由发言、表达诉求、平等对话，提高了各主体的协商意识与能力，也在频繁的互动中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增进相互间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扩大协商成果共享范围，推动协同合作可持续发展。在基层社会，群众所遭遇的重点、热点、难点、堵点问题大多是共性的，有些问题在本区域内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H市“协商驿站”针对地域毗邻需联合开展治理、主题类似需共享意见建议等现实需求，推动跨区域民主协商，并建立适配的联席会议、联动监督机制，进一步协调多元主体参与协商过程，拓展协商和成果共享范围，完善多元共治格局。

（五）落实协同结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意义建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形成的稳定联合体，其存续与稳定取决于多元主体对共同体的认同和对“集体”意义的认可，这也就决定了民主协商不能议完了事。协商结果若不能落地落实，民主协商也就失去了意义，失去了“民心”。对此，H市“协商驿站”建立了完整的协商议事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对协商成果落实的主体责任、规范化程序、监督评估、资源保障等都作出了明确的制度性规定。“协商驿站”工作制度明确，对已经形成共识的协商结果，协商议事室要及时形成建议清单并报送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对协商建议的办理，县政协要加强与党委政府部门的沟通对接，督促其形成责任落实清单，明确责任主体与完成时限。之后，要及时形成反馈清单并向参与主体及相关群众公布。对完成的结果，要联系专家学者、利益相关人、基层群众等进行跟踪评估。得益于这一严密的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H市“协商驿站”协商议事结果获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例如，在协商驿站的推动下，安吉县城南社区2022年在全县率先推进安置小区精细化、数字化管理，启动安置小区封闭式提升工程，新增门禁37处，有效解

决了停车难、秩序乱等老大难问题。

五、协同治理模式下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优化路径

H市“协商驿站”民主协商平台将政协协商元素向下沉、向前移,实现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在基层治理场域内的有机衔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但在两年的实践中,H市“协商驿站”实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行政村在议题选择上“避重就轻”,选择一些容易处理的问题进行协商,消解了基层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另有一些地区存在协商主体明显精英化、普通群众参与不足等问题。对此,结合H市“两山协商驿站”实践,笔者认为可以从下面三方面优化政协协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

(一) 打造协商平台,激发协商意愿

地方党政部门、政协、群众及其他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在权力、信息、资源等方面具有不对称性,成为基层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梗阻之一。地方党政部门掌握权力与资源,为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在日渐复杂的基层治理中对理性协商平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群众存在信息掌握不充分的问题,但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通过“协商说理”解决问题获得了利益,并对该方式产生了信任,也具备一定的参与协商的能力。多元主体在强烈的协商动机下希望获得一个有序开展公共协商的平台。人民政协作为党委政府联系社会的纽带,具有下通各界、上达中央、亦“官”亦民的特点^①,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政府和基层社会间双向沟通,驱动多元主体参与基层事务治理协商。

激发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协同动因,要求不断优化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平台,激发多元主体共同体意识与协商意愿。一是政协应当充分发挥其作为党委政府联系社会的纽带作用,在其自身价值理念和职责使命的基础上,强化互联互通共识性价值,与党政部门、人民群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建协同合作信任关系,培育社会共同体意识与“以理性协商达成共识”的民主协商精神,激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意识。二是政协应充分发挥“专业化、专题化、区别化、全程化、制度化”优势^②,打造吸纳多方参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化协商平台与决策平台,为基层治理多元利益主体提供沟通协商的渠道,保障决策的公共性与“合法性”。三是民主协商平台要下沉到基层,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衔接联动。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政协通过多元主体间平等协商对话、协商互动,收集基层群众最真实的社情民意并传递给党委政府;同时,借助这一平台向基层群众传递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法律政策,助推多元互动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

(二) 加强权威保障,畅通参与渠道

强大的领导力是持续推进协商且收获成效的重要保障,是应对基层政协功能“悬浮”问题和协商过程信任问题的重要基础。政协在嵌入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必须通过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制度规范保障协商过程的顺利开展,赢取基层群众的回应、重视与信任。

一是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借助党的强大动员力和号召力打破部门壁垒,保障相关职能部门加入协商,积极沟通、协同解决基层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问题。H市“协商驿站”民主协商平台在建设和运行中,市、县、乡镇相关部门领导参与平台的建设谋划、议题选择、协商过程以及协商成果的反馈与转化,成为驱动协商的重要一环。

二是要加强制度保障,以规范的制度体系保证协商具有一定刚性规制,以灵活的实践方案、

^① 李瑞环:《看法与说法:第2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1页。

^② 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新时代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2019年度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0页。

运行规则保证协商的弹性空间,避免协商的形式主义,提高协商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最大限度保障干群参与协商的积极性。例如,H市政协虽然通过制度规定各村“协商驿站”每年开展协商活动不能少于2次,但并没有对活动时间、地点、形式作出硬性规定,保证了协商活动组织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在协商活动开始前,所有协商主体都有充足的时间开展实地调查、深入研究,保证了协商的质量和效果。

三是要打造流程闭环。标准规范的协商流程有助于提高协商的质量。要严格按照“选择协商议题、确定协商议题、组织调查研究、开展协商讨论、报送协商成果、推动成果转化、成果监督评价”这一“全生命周期”协商机制,开展政协在基层所组织的民主协商,以协商力量链条聚合,推动协商平台纵向拓展与履职工作横向集成相互赋能。

(三) 注重反馈转化,保障成果落实

协商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基层群众参与协商议事活动主要是源于权利和利益的争取和维护。如何满足基层群众合理的价值诉求,解决其关切的问题,做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协商利民,最关键的是做好协商民主的“后半篇文章”,将协商成果落在实处。

一是要建立健全协商议事成果采纳、落实机制。协商成果只有经过转化运用,才能真正彰显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需对协商成果的建议采纳、办理要求、办理时限和跟踪问效等内容要作出明确规定,研究制定责任落实清单,用制度来保障协商成果转化、落实的闭环。

二是要建立结果反馈机制,形成结果反馈清单。要采取适当形式向参与协商的所有主体及其他相关群众反馈协商成果的落实情况。反馈形式可以分为实时反馈和动态反馈,前者要求将涉及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相关协商信息及时反馈给基层群众及相关利益群体,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后者要求根据协商的进度进行动态跟踪反馈,包括协商进度、阶段性实施效果、群众满意度等,未达到预期进展的应当说明原因,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三是要建立完善的监督评价机制,利用政协监督、党政约束等方式促进协商成果的高质量落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增强民主监督实效,助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①。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必须将政协监督贯穿到民主协商的全过程,尤其是在成果转化、监督评价等关键环节。通过政协会议、主席视察、专委会调研、政协委员联系等形式,将政协委员、相关专业人士、治理参与者、利益相关人联系起来,对协商所达成共识的落实过程、情况进行专业性评估与跟踪监督,推动协商意见切实转化落实。另外,要充分运用好政治压力传导,打破部门壁垒,加大协商结果落地的力度。由“协商驿站”民主协商平台实践可知,党委政府参与协商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以往政协“对协商结果应用的监督流于形式”的困境,使协商成果落地更有效率、更有保障。为了提升基层治理相关协商结果的落地,一方面要使政协监督与人大监督、纪委监督有机衔接,加强与党内监督、党外尤其是民主党派监督的联系与协调;另一方面,在将党委政府部门纳入协商过程的基础上,政协应在共识成果形成后,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推动党委政府明确负责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工作的具体部门、人员及相关职责,确保协商议事成果落地见效。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0日,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626/202410/content_6978637.html,2024年12月23日。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滇省夷人图说》 音乐符号的文化意蕴和图像表征

朱 敏

摘 要：《滇省夷人图说》是嘉庆年间官方绘制云南少数民族外貌特征、服饰、饮食、习俗及其他生产生活情况的民族图册，是清代“滇夷图”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借助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对《滇省夷人图说》中音乐图像展开分析：第一层次前图像志描述，分析了该图说的创作背景、符号类型和所呈现实景性场景；第二层次图像志分析，选取铜鼓、铜铃、芦笙、竹簧等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符号，阐释图像背后的神话故事和文化意蕴；第三层次图像学分析，从共源性音乐符号、共享性音乐符号和自享性音乐符号三个方面深层次分析该图说对中华民族共同起源和集体记忆的表达、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以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表征。通过图像学分析激活《滇省夷人图说》的音乐图像资源，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滇省夷人图说》；音乐图像；图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5) 01-0045-10

图像和文本一样是一种重要历史证据，它不仅可以佐证文字书写的历史，还可以见证文字表达之外的东西^①。它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社会现实，也表征了社会想象，其本身就是意义生产和实践的过程。《滇省夷人图说》是清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云贵总督伯麟受命于嘉庆皇帝，主持绘制反映云南少数民族外貌特征、服饰、饮食、习俗及其他生产生活情况的官方图说。图说共分夷图、舆图两个部分，夷图108幅、舆图22幅，其绘画精美、形象生动、情景交融，是清代“滇夷图”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200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馆藏抄本付梓出版，使得图说公之于世，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祁庆富、揣振宇（2009）对《滇省夷人图说》进行历史考证，认为该图说是《伯麟图说》目前所见最早的抄本。苍铭（2016）阐释了《滇省舆地图说》中所图绘的滇越边界变迁和治理策略^②。刘星雨等（2016）从聘礼、迎亲、媒妁和通婚圈入手，解析《滇省夷人图说》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③。薛其龙（2016）从地域、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滇省夷人图说》的图像学研究”（2024J0963）；楚雄师范学院创新团队项目“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云南实践”（XJTD05）。

* 本文所录图片见封三。

作者简介：朱敏，楚雄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视觉图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① [英]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② 苍铭：《〈滇省舆地图说〉与滇越边界及边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43页。

③ 刘星雨、苍铭：《〈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婚俗图像解析》，《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第81页。

服饰、仪式、民俗等方面论述了《滇省夷人图说》对清代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情景的图像表征^①。李文龙(2017)则着重分析了《滇省夷人图说》中清代云南哈尼族生计方式及产生原因^②。此前研究侧重对《滇省夷人图说》的物品、人物形象、服饰、生产生活场景等进行图像志分析,呈现出当时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生产的特点和习俗特征,但尚未有人专门从音乐图像的角度对该图说展开图像学分析,且对图说背后表征的政治心态、关系、价值观念等深层次意义阐释不够。

潘诺夫斯基把图像作品的图像学分析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称为前民族志分析,主要依据人直接的视觉经验和风格史来解读图像作品所呈现的线条、物品、事件,呈现图像的自然意义;第二层次是图像志分析,即通过主题和概念揭示图像题材构成的神话故事和寓意世界;第三层次是图像学分析,阐释图像背后深层次的“本质意义”,即“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基本原则”^③。这三个层次不是彼此割裂的关系,而是层层递进、相互支撑,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图像学分析的三个层级。该文试图从这三个层级对《滇省夷人图说》中的音乐图像符号展开图像学分析,揭示图说对中华民族共同起源和集体记忆的表达,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表征。

一、前图像志描述:《滇省夷人图说》中少数民族舞乐的场景

对母体的正确鉴别是正确开展图像学分析的必要前提。第一层次的图像学分析是通过对图像作品的自然主题进行描述,呈现出图像中线条、色彩等构成的人、动物、植物、房屋、家具等自然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这些第一性的自然意义载体组成的纯粹形式世界,即艺术母题(motifs)。通过作品母题的逐一例举,则是对图像作品的前图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④。也就是说,在前图像志分析阶段,主要依据人直接的视觉经验来解读图像作品所呈现的线条、物品、事件,呈现图像的自然意义。要对《滇省夷人图说》的音乐图像进行图像学分析,以理解和揭示其音乐图像背后深层次的意义,首先要对《滇省夷人图说》创作的基本情况以及音乐图像所呈现的事实性主题场景进行描述。

(一)《滇省夷人图说》的创作背景

《滇省夷人图说》作为《伯麟图说》的抄本,是在嘉庆皇帝的谕旨命令下,由云贵总督伯麟主持绘制的云南少数民族图说,是供嘉庆皇帝了解边情、夷情,治理和巩固边疆的图像资料。该图说历经两年的绘制,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完成并上报给朝廷。该夷人图说中共有108幅图说,其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分别介绍了108个少数民族的情况,并在图说之后附上1848个字的跋文,介绍图说绘制的始末和“滇省夷人”的整体情况^⑤。在《滇省夷人图说》的编撰中,以嘉庆皇帝为中心的朝廷是图说编撰的幕后主导者,皇帝和朝廷了解夷情、掌握边疆治理的情况等政治意图占据图说创作的主导位置。正因为此,该图说以反映现实为目的,有较强的纪实性。该图说的编绘组织者是云贵总督伯麟。作为在云贵任职十几年的地方官,伯麟一方面对云南民族地区有较为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想借图说向朝廷表现自己在守土抚夷和边疆治理上的功绩,故挑选了昆明知名的夷图画家李诒担任画师。从创造者和创作意图看,朝廷和地方对《滇省夷人图说》

① 薛其龙:《〈滇省夷人图说〉图像的文化表征》,《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20页。

② 李文龙:《〈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哈尼族群生计方式》,《民族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416页。

③ [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3—5页。

④ [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第3页。

⑤ 朱敏、李兵:《〈滇省夷人图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想象和图像表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8期,第41页。

的编撰工作是极为重视的。

创作风格方面,该图说的绘制者李诂“性明敏,善篆隶,尤精绘事”,擅长绘画夷图,而且他“到过云南许多民族地区,观察民情,就地取材”,“其作品采自风俗,绘其形声,宛如人民族居住之山村”^①。《续修昆明县志》记载:“图成,神采酷肖,称善本云。”^②正因《滇省夷人图说》出自名家李诂之手,使得画作写实的同时充满艺术性。从形制上看,李诂在绘制《滇省夷人图说》时采用中国传统绘画中惯用的“图文融合”的图像形制,以图像为主,将文字融入图像之中且占据较小空间,二者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使得图文相映成趣、引人入胜,像一场视觉交响乐,增强了图说的视觉冲击和审美情趣。从绘画风格看,《滇省夷人图说》使用的是大青绿画法,用笔工整、勾勒精细、墨色兼用、皴擦多重,整体呈现出清淡明妍、苍茫烟润的艺术效果。

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看,明清时期朝廷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由原来的中央管土司、土司管诸夷的间接管理模式改为直接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诸夷的直接管理模式。在这一政策指导之下,朝廷采用恩威并重的治理策略,以绥靖、怀柔政策为主,以儒化之、使之诚服。这一点在《滇省夷人图说》的跋文中亦有体现,“百蛮与汉民裸居,嗜欲习俗,有相协相洽,亦有未尽协洽。其负险阻育种族,眇闻禁教者,刚柔脆悍,聚散踪迹,什渟一浇,亦百不一律。故同一边壤,而其控驭绥靖之势,各有所宜”^③。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和差异化边疆治理强化了清朝朝廷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关系,是政治一体性的体现,也促进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通过对图说的创作者、创作意图、创作风格、社会背景的分析,《滇省夷人图说》反映了清朝朝廷认识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华民族政治版图的一部分且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因而对其高度重视,同时随着民族认知的深化,强化了朝廷与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一体性的关系。

(二)《滇省夷人图说》音乐图像符号的主题及类型

从对《滇省夷人图说》音乐图像的分析、整理来看,共有17幅夷人图像展现了与音乐有关的图景。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些民族在云南府、曲靖府、开化府、丽江府、大理府、顺宁府、楚雄府、蒙化厅、普洱府、临安府十个府厅都有分布,地域跨度较大。从图像主题来看,17幅音乐图像中有5幅图反映的是少数民族节庆主题,有5幅是生活主题,有3幅是节令主题,其余4幅分别是祭祀、占卜、宗教、婚俗主题。在每一幅图像中都有体现音乐元素的图像符号。展现舞姿的身体符号本身就是一个音乐符号,在许多音乐图像中都有体现,有的是搭手跳舞、有的围成一圈跳舞、有单人摊手跳舞,还有边奏乐边跳舞的。此外,以乐器的形式表现音乐场景的符号也非常丰富,如铜铃、铜鼓、葫芦笙、竹簧、木叶、锣、钹、号、竹板、刚洞等乐器,其中铜鼓出现4次、牛角号出现4次、葫芦笙出现3次、竹簧出现3次、铜铃出现2次。(见表1)

表1 《滇省夷人图说》中音乐图像主题和符号统计表

序号	族称	地域分布	场景主题	音乐图像符号
1	傣卜	云南府	祭祀	铜铃
2	苗子	曲靖府属宣威	节令	铜鼓、土篱、号
3	黑甘夷	曲靖府	生活	葫芦笙、竹簧
4	普列	开化府	占卜	铜铃
5	阿夏	开化府	节令	舞姿
6	阿猓	开化府	生活	竹簧

① 李立、史青:《清代云南夷人图说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231页。

② (清)陈荣昌、顾视高纂:《续修昆明县志》卷四《人物志二》下,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铅印本,第6页。

③ 揣振宇主编:《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序第7页。

表 1（续）

序号	族称	地域分布	场景主题	音乐图像符号
7	花土獠	开化府	节庆	鼓、锣、竹板、舞姿
8	普剌	开化府	生活	大鼓、铜鼓、牛角号
9	普岔	开化府	节令	大鼓、铜鼓、牛角号、舞姿
10	喇嘛	丽江府	宗教	大鼓、锣、刚洞
11	栗栗	丽江府及大理	生活	牛角号
12	蒙化彝	顺宁顺属云州	节庆	舞姿
13	嫫且	楚雄府	节庆	竹簧、木叶、舞姿
14	妙猓猓	蒙化厅及永昌	生活	葫芦笙、舞姿
15	龙人	普洱府近郭	节庆	舞姿
16	花百彝	普洱府	节庆	小鼓、锣、钹
17	麦岔	临安府	婚俗	葫芦笙

（三）《滇省夷人图说》中的音乐图像事实性场景的描述

《滇省夷人图说》共有 108 幅少数民族图像，其中音乐图像共 17 幅。这些音乐图像通过线条、颜色、人物、服饰、乐器、房屋、物品等自然对象，呈现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特点、习性和生产图景。这些画面搭配“名称+习性+地域”式文字的描写，共同构成了图像作品。下面对《滇省夷人图说》中 17 幅表现音乐图像的部分进行“前图像志描述”，整理民族、文字描述和场景描绘等信息，以力求依据直接的视觉经验来解读这些图像作品所呈现的自然意义。（见表 2）

表 2 《滇省夷人图说》音乐图像呈现的自然意义

序号	族称	图说序列及文字	自然意义的场景描述
1	傒卜	第 6 幅：傒卜能为农人，祭田祖，以纸囊盛螟，白羊负之，令童子送之境外，云南府属有之。	该图像中一男子身披披风，头戴尖顶圆帽，手摇铜铃，一小孩手牵一只羊行于后，描绘了傒卜摇铃祭祀的场景。
2	苗子	第 13 幅：苗子居水滨，以布束发，彩衣跣足，遇令节击铜鼓吹土箫以歌太平，曲靖府属宣威有之。	该图像中四人围在一起，或坐或立，击鼓、吹奏乐器，手舞足蹈，描绘了苗子节令时奏乐、歌舞的场景。
3	黑甘夷	第 15 幅：黑甘夷男衣麻，女衣氍毹，饰首以珠贝，居山中截竹屈铁亦名笙琴，口吹拍弹，迭为倡和，曲靖府属宣威有之。	该图像描绘了黑甘夷一人吹葫芦笙，一人吹竹簧，欢喜奏乐的场景。
4	普列	第 33 幅：普列性质直，勤于耕，婚必媒妁，善鸡卜，有疑取鸡骨卜之辄兆，开化府属有之。	该图像中一男立于树下摇着铜铃，两女跪地，前面摆着祭品，另一女拿着刀正准备杀鸡，描绘的是普列举行鸡卜的场景。
5	阿戛	第 34 幅：阿戛性柔，当春耕时拾花草相赠，荅抚掌而讴期田禾之茂也，开化府属有之。	该图像有两对男女，一对对男女拿着花枝对舞，另一对男女搭着手跳舞的欢快场景。
6	阿猓	第 35 幅：阿猓性粗略，男女皆衣麻，春日踏青削竹至薄，合而持之含胡啾谐以为乐，开化府属有之。	该图像两人拿着竹子制作的乐器（竹簧）吹奏、作乐的场景。
7	花土獠	第 36 幅：花土獠男衣彩、女服绣褐，婚不亲迎妇，翁携酒饮婿家，正月至二月老幼击鼓、喧舞相娱嬉，开化府属有之。	该图像描绘了三男两女围在一起，有的击鼓，有的拍锣，有的打竹板，边奏乐边跳舞的场景。
8	普剌	第 40 幅：普剌性醇，吉事款客，吹负高唱，节以钲鼓，男子衣不及膝，女则长服委地，开化府属有之。	该图像中有五名普剌男女，一人敲着地上的大鼓，一人敲着小鼓，一人吹牛角号，另两人合着节拍跳舞。

表 2 (续)

序号	族称	图说序列及文字	自然意义的场景描述
9	普岔	第 46 幅: 普岔性慈, 居边界, 亦耕亦渔, 涤场时歌竹枝于山谷庆有年也, 开化府属有之。	该图像描绘普岔围在一起, 击鼓、吹号、跳舞的场景。
10	喇嘛	第 55 幅: 喇嘛其教传自西域, 戒酒色、偷盗, 习西方梵字经咒, 日三诵, 行则以蒲团竹杖衣钵随, 丽江府属有之。	该图像描绘了五位喇嘛坐在蒲团上, 有的敲大鼓, 有的敲锣, 有的吹刚洞的场景, 另一位小喇嘛端着茶壶立于一旁。
11	栗栗	第 61 幅: 栗栗即力些, 毡衣毛带, 善用弩, 每令其妇负木的径数寸前行弩, 发辄中而人不伤, 西番畏其技, 丽江府及大理有之。	该图像主要描绘了两个栗栗妇人披着毛毯行于路上, 另一妇人抱着孩子走在前面, 一男拿着弩, 另一男吹着牛角号的场景。
12	蒙化彝	第 72 幅: 蒙化彝略似猺, 其俗于除夕前六日设酒食、燃炬、歌舞、照耀田庐, 逐来岁之疫也, 顺宁府属云州有之。	该图像描绘了三个人席地而坐喝茶, 两人在其后举着火把, 另两人在旁边手舞足蹈的节庆欢乐场景。
13	嫫且	第 76 幅: 嫫且拙于治生, 其俗以丑月朔酌饮于野, 弹薪吹叶声啁啾出林壑间, 入新年乃止, 过此虽终岁, 饥寒弗计也, 楚雄府属有之。	该图像描绘了一男一女吹奏着竹簧、木叶, 另一对男女在山间手舞足蹈的欢快场景。
14	妙猺	第 82 幅: 妙猺结茅松间, 团炉坐卧, 男或罗衣雀帽, 女三角冠、胸背刺绣文, 吹芦笙, 自清越也, 蒙化厅及永昌有之。	该图像描绘了两女一男围坐在火炉旁, 三人拿着长长的芦管共饮一壶酒水, 另两个人吹着葫芦笙在旁舞蹈的场景。
15	龙人	第 90 幅: 龙人知耕织, 其俗以正月元日作秋千戏, 殆以习轻巧而寓介寿之意欤, 普洱府近郭有之。	该图像描绘了龙人在正月元日欢庆的场景, 四人席地而坐喝茶, 三人搭手跳舞, 一人在戏秋千。
16	花百彝	第 92 幅: 花百彝性柔软, 嗜辛酸, 居临水以渔稼, 每岁三月, 男妇击鼓、采花、堆沙、献佛, 以迓吉祥, 普洱府属有之。	该图像描绘了花百彝三月节庆场景, 两人抬着大鼓击打, 一人打锣, 一人敲钹, 几名妇女儿童拿着花枝在旁舞蹈玩乐的场景。
17	麦岔	第 100 幅: 麦岔聘妇用牡牛, 吹笙酌斗以娱客, 终岁勤动恬如也, 临安府属有之。	该图像中一男牵着牛拎着酒, 一人背着柴薪, 另一人拿着葫芦笙, 一妇人立于旁, 表现了麦岔在婚聘中以牛为聘礼, 吹笙、喝酒、娱乐和款待客人的习俗。

二、图像志分析:《滇省夷人图说》音乐图像的故事和文化意蕴

所谓图像志分析,就是通过主题和概念揭示图像题材构成的故事和寓意世界。对图像故事和寓意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进行深义图像志(图像学解释)的必要条件。^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把前图像志描述中的诸多母题组合在一起,与主题或概念联系起来,从题材故事和寓意世界揭示图像作品的文化意蕴。对《滇省夷人图说》中音乐图像的图像志分析,亦是在第一层次符号呈现和事实描述基础上,对图像的故事和寓意世界展开分析。《滇省夷人图说》中的音乐图像符号有十多种,下面选取《滇省夷人图说》音乐图像中出现频率最高、最具代表性的四种符号展开分析,揭示其蕴含的神话故事、寓意世界等文化意蕴。

(一) 铜鼓符号及文化意蕴

铜鼓是一种由青铜铸造,平面曲腰、中空无底部的敲击体鸣乐器,发明于云南。^②云南楚雄万

① [美] 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第6页。

② 张增祺主编:《滇国青铜艺术》,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家坝出土的铜鼓，距今2600多年，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早的铜鼓。这一铜鼓的发现表明，早在春秋时期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就有了使用铜鼓的乐舞文化。铜鼓最开始是由古代炊具铜釜演变而来，后成为礼器、乐器。铜鼓有大有小，最大的鼓面直径百余厘米，最小的十余厘米，重量在十斤至百斤不等，且形式多样。鼓面一般有浮雕图案，边缘有蛙、牛、龟等动物装饰，鼓身也常有各色花纹。铜鼓创立之初，通常用来击打以号召族群成员进行战斗，是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是权力的象征。到了明清时期，铜鼓已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普遍使用的传统乐器。

铜鼓和少数民族神话故事有着密切联系，是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的象征符号。在佤族民间传说中，在远古时期，西盟县北面的高山里有一潭碧绿的湖水，人们称之为“弄球龙潭”，佤族视其为神秘之湖，是佤族的发祥地。在这里住着一对青蛙精，生了九个儿子、九个女儿。这九儿九女长大成人后，结婚生子，分别住在九条山沟里。这九儿九女繁衍的子孙，组成了一个部落，就是佤族。后来，青蛙精都去世了，佤族为了纪念它们，用青铜铸就了铜鼓，且在鼓面上铸有青蛙的形象，称之为“蛙鼓”。^①在佤族神话体系中，蛙神就是创世神、先知神、始祖神的综合体和化身。铸蛙铜鼓既是纪念蛙神的形式，也是对民族起源和集体记忆的承载，同时还表达了祈求祖先护佑、期盼风调雨顺的意愿。

明清以后，铜鼓逐渐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喜爱的一般性娱乐乐器，主要在宴饮、民族节日、庆祝活动、婚嫁、祭祀等场合使用。配合铜鼓演奏的乐器较多，有皮面大鼓、扁鼓、象脚鼓、铓、镲、牛角、长号、葫芦笙等。《清朝通典·杂乐》记载：云南“花苗，凡节序击铜鼓”，“仲家，岁时击铜鼓为欢”。^②这与《滇省夷人图说》中的记录相吻合。《滇省夷人图说》中多处出现铜鼓图像，如在第13幅图说“苗子”中，一人席地而坐，拍打着铜鼓，一人吹角、一人吹土箫相和，另一人跟着节奏拍手舞动，描绘了苗子“遇令节击铜鼓吹土箫以歌太平”^③的场景（见封三图1）。第四十六幅普岔图像中描绘了秋收涤场时，击鼓、吹牛角，“歌竹枝于山谷庆有年”的场景。在第九十二幅花百彝图像中，两名男子抬着铜鼓击打，旁边钹、锣相合，描绘花百彝过泼水节时击鼓、采花、堆沙、献佛以祈求吉祥的欢乐场面。

由此可见，铜鼓作为一种乐器在云南少数民族节令、节庆和日常生活场合中广泛运用，它既是作为纪念远祖、民族起源的象征，也是“歌太平”“庆有年”“祈吉祥”等文化意蕴的表达。

（二）铜铃符号及文化意蕴

从古滇国铜铃出土的情况看，铜铃在古滇国已普遍使用。铜铃有不同的形制和功能，如作为马的装饰品的铜串铃（又称马铃）、作为女性脚上佩戴的铜脚铃、作为法器的铜法铃等。铜法铃一般是祭祀时使用的伴奏乐器，有个长长的手柄。法师握手柄摇动，使得铃舌碰撞铃壁发出声音，在祭祀仪式中发挥乐器功能。^④

《滇省夷人图说》有两幅图像出现铜铃，都是手执铜铃且形制相同，都用于祭祀场合，说明是铜法铃。第6幅傩卜图像中（见封三图2），一男子头戴圆尖帽，身披披风，手摇铜铃，走在前面，一小孩牵着羊走在后面，呈现“以纸囊盛螟，白羊负之，令童子送之境外”的祭祀土地神场景。图中头戴法帽、身披斗篷、手摇铜铃的男子是法师，跟在其后面牵羊的童子则是沟通人与神的桥梁和纽带的“傩子”。《后汉书·邓皇后纪》中记载：“傩子，逐疫之人也。”^⑤傩子作为神的使者，将驱逐虫疫的愿望传达给神灵，从而为农业生产逐疫祈愿。“令童子送之境外”就是把虫害疫病送出去的意思。“白羊负之”是以羊作为祭祀的物品表达对土地神灵的敬重，且羊近“祥”取祥和之意，是对土地丰收的美好祈愿。这里的铜铃作为标志性的祭祀音乐符号，是确立整个图

① 乐声：《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②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③ 揣振宇主编：《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第10页。

④ 王玲：《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舞蹈图像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4—105页。

⑤ （南北朝）范晔：《后汉书·邓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5页。

像场景主题的关键。铜铃与法帽、斗篷、童子、羊等符号共同表现了傩卜祭祀土地神的场景和习俗。这一习俗与自古以农耕为主的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土地崇拜、土地信仰的文化基因有着密切联系。《说文》中曰：“地之吐生万物者也。”^① 中华民族把土地视为农业之本、万物之母，由此形成了各式各样关于土地的信仰。傩卜的土地神祭祀文化是土地信仰和崇拜的表现，也充分说明农耕文明已深植于中华各个民族之中。

还有一个铜铃图像是普列图像。在第33幅普列图像中，一男手摇铜铃，两女跪地，地上摆着祭品，另一女拿着刀正准备杀鸡，描绘的是普列取鸡骨头占卜以判断吉凶的习俗（见封三图3）。普列是彝族的一个分支。鸡骨卜是彝族常用的一种占卜方式，由毕摩或鬼师作法念咒、杀鸡烹熟后取股骨，股骨取出后用小竹签分别插入这些小孔，根据竹签插入股骨的相对位置和倾斜角度呈现不同的卦象，由此得出占卜结果。^② 占卜是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的重要部分，是沟通精灵的重要媒介。占卜的目的主要是查验各种精灵，了解他们与活人之间的纠纷，以利于针对性地禳解。鸡骨卜的图像表达了普列通过占卜敬畏神灵、解决生活问题、祈求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三）葫芦笙符号及文化意蕴

葫芦笙，又名芦笙，是一种用葫芦或仿照葫芦制作而成的乐器。目前我国出土的最早的葫芦笙是李家山24号墓出土的两件战国时期青铜曲管葫芦笙。^③ 此外，石寨山、官渡羊甫头、祥云县大波那等地古滇墓葬中都有出土青铜葫芦笙乐器。^④ 这说明葫芦笙早在先秦时期已在我国西南地区流传，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墓葬出土的葫芦笙是陪葬器物，通常用青铜制作，而人们日常使用的葫芦笙则就地取材，将葫芦挖空制作而成。人们把葫芦挖空作音斗，在葫芦上插5~6支竹管，内部用竹片或铜片制成簧片，便成为可吹奏的葫芦笙乐器。葫芦笙乐器不仅创作发明得早，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广为流传，在清朝更是如此。清乾隆时期《滇小记·芦笙》中有关于《芦笙舞》的记录：“滇黔夷歌，俱以一人捧芦笙吹于前，而男妇拍手顿足，倚笙而和之。盖古联袂踏歌之遗也。其笙颇大于常笙，以匏为壶，芦为管，竹叶为簧，管五，而其声宫音为多，苗人跳月，求偶皆吹芦笙也，俗称跌脚笙。”^⑤ 可见，西南少数民族吹芦笙、跳芦笙舞有着悠久历史。

葫芦笙这一乐器的流行和中国上古神话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典籍和神话传说中，葫芦都与人类创世有关。《诗经》中说道：“籛籛瓜瓞，民之初生。”意思是：“中华民族的先民，最初是出自共同的母体——葫芦（瓜瓞），它世代绵延，子孙繁衍。”^⑥ 在《礼记·明堂位》中也有记载：“女娲承庖（伏羲）制，始作笙簧。”意思是伏羲、女娲创造万物也创造了葫芦笙。《说文解字》中记录：“笙，像凤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谓之笙。”^⑦ 这是说笙通生，是万物生育的意思。彝族人认为，葫芦笙发出的声音是“汉、彝、苗、傣、哈尼等各族共祖伏羲、女娲的声音”。^⑧ 在佤族的古老传说中，佤族的祖先是“从司岗里”出来的，最先出来的是佤族，然后是汉族、傣族、拉祜族等其他民族。而佤语的“司岗”是熟葫芦的意思。在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中记载了汉代的滇西哀牢夷人的传说，即佤族、德昂族等的传说，是有了“沙壶”（葫芦的意思），“由是始有人民”。^⑨ 这些都与《诗经》里的“籛籛瓜瓞，民之初生”遥相呼应。由此，葫芦笙与中华民族的共同起源、共同祖先的记忆是紧密联系的，既是对人类远古祖先的情感表达，也是对繁衍后代、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祈愿。

① 刘星雨：《〈滇省夷人图说〉中祀田祝丰夷人图像解析》，《民族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384页。

② 杜薇：《百苗图汇考》，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82—283页。

③ 王玲：《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舞蹈图像研究》，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

④ 乐声：《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第2页。

⑤ 纪兰慰、邱久荣：《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

⑥ 游琪等编：《葫芦与象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2页。

⑦ 熊永忠：《云南葫芦笙舞源流考》，载《云南民族舞蹈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5页。

⑧ 游琪等编：《葫芦与象征》，第58页。

⑨ 游琪等编：《葫芦与象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4页。

在《滇省夷人图说》中有三幅图像出现了葫芦笙，分别是曲靖府的黑甘夷（见封三图4）、蒙化府的妙猱猱（见封三图5）、临安府的麦岔（见封三图6）。在第15幅黑甘夷图像中，两位头上扎着头饰的男女，一个吹葫芦笙、一个吹奏竹簧，表现黑甘夷“截竹屈铁亦名笙琴，口吹指弹，迭为倡和”的场景。这与《南诏野史》中记载的黑甘夷“婚配，男吹芦笙，女弹口琴，唱和相悦”的习俗是相吻合的。^①第82幅妙猱猱图像中一男一女吹着葫芦笙跳舞，另外一男两女坐在火盆边喝酒。第100幅麦岔图像展现了在婚嫁之时男方以牛为聘礼、吹奏葫芦笙的欢快场景。葫芦笙在婚娶仪式上不仅是一种演奏乐器，更是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民族永存的象征。

（四）竹簧符号及文化意蕴

竹簧又称弹篴、吹篴、响篴、口琴，是竹子做的一种口吹乐器，常与芦笙合奏，是彝族、拉祜族、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哈尼族、佤族、普米族、回族等西南少数民族节庆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乐器。

竹簧不仅是一种乐器，还是重要的文化象征符号，民间流传着关于竹簧的美好传说和神话故事。在先秦时期，《世本》中记载：“女娲作簧”，说明竹簧在远古时期就已存在。^②《礼记》中“女娲承庖（伏）羲制，始作笙簧”的“簧”就是指竹簧。在台湾高山族的泰雅部落的创世神话中，“卑南天王”作为部落盟主创世时便有了簧。景颇族中也有类似的传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竹簧这样的乐器。由此可见，竹簧和芦笙一样也是一种与人类起源相联系的音乐符号。除了表征人类起源，竹簧还成为中华各民族相互倾诉、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载体。在拉祜族的传说中，有两家以狩猎为生的邻居，一家有个男孩叫扎缇，另一家有个女孩叫娜偓，两人青梅竹马，感情非常深厚，长大后十分相爱。但后来两家有了隔阂，两人只能在夜间相会，两家父母知道后在中间修筑了一道篱笆，将两人分隔起来，两个人再也不能在一起谈笑、唱歌了。有一天，女孩娜偓手抚竹篱笆时，裂开的竹篴发出了悠扬的乐音。于是，两人此后选取竹篴吹弹，传递着相爱的深情。最后，二人因家庭不和不能长相厮守，选择食毒草而死。此后，竹簧成为爱情的象征流传下来。白族将竹簧视为定情信物；纳西族将竹簧弹奏得好不好作为择偶的条件；傈僳族也常常用竹簧来传情；彝族青年男女将竹簧随身佩戴，既作为乐器也作为装饰。

在《滇省夷人图说》中有三幅图像与竹簧有关，分别是黑甘夷、阿猱、嫫且。黑甘夷图像中，一人吹葫芦笙、一人吹奏竹簧，是其婚配习俗的体现。在第35幅阿猱图像中，一男一女在春日踏青之时，“削竹至薄、合而持之含胡啾谐以为乐”，表现吹奏竹簧为乐的欢快场景。与《云南通志》中记载的阿猱“婚嫁悉听男女自择，含口琴吹唱相悦，即为夫妇”的习俗相符。第76幅嫫且图像中，一男一女吹奏竹簧，另有一对男女在山间搭手舞蹈，表现“丑月朔酌饮于野，弹薪吹叶声啾啾出林壑间”的习俗特点。这一点在《南诏野史》中亦有记录，嫫且“性好欲，男吹竹笙，女弹口琴，欢饮竟月”。《滇海虞衡志》中也描写了嫫且“男妇作欢，鸣叶吹薪，弹篴弄枯，音节流畅，合夷曲而杂和之，啾啾可听”。^③由此可见，无论对于黑甘夷、阿猱还是嫫且而言，竹簧既是一种乐器，也是婚恋、爱情的象征。

三、图像学解释：《滇省夷人图说》音乐图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觉表征

前图像志描述对母题的确认、图像志分析对图像故事和寓意的分析都为第三层次图像学解释奠定基础。图像学解释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运用综合直觉的能力，从深层次、本质和哲学层面进一步深入挖掘图像作品背后的象征意义，即从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国家的层面揭示其政治、宗教、哲学及社会倾向的文化征象。^④而这一深层意义的解释才是图像学阐释的最终目的所在。

① 乐声：《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第78页。

② 乐声：《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第77页。

③ 乐声：《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第78页。

④ [美] 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第12页。

《滇省夷人图说》中的音乐图像的图像学解释,主要通过共源性音乐符号、共享性音乐符号、自享性音乐符号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共同起源和集体记忆的表达、对清朝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呈现、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的表征。这些图像和符号的表征体系映射出清代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觉表征。

(一) 共源性音乐符号:对中华民族共同起源和集体记忆的表达

所谓共源性图像符号,是由中华民族整体享有,表征着中华民族共同起源、集体记忆的视觉符号,是中华民族一体性的重要表征。^①黄河、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生息地的象征,是对中华民族共同地理空间、生存空间的表征。黄帝、伏羲、女娲等是表征中华民族共同起源、共同血脉、共同文化基因的符号。这些共源性图像符号以形象化形式“把一种想象的一致性强加给分散和破碎的经验”^②,整合了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从而建构和增强民族认同感。

共同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空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的首要条件。《滇省夷人图说》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黄河、长江等表征中华民族共同生存空间的图像符号,但其每一幅图像作品都以山川河流为背景,中华民族的大山大河这类共源性图像符号是以“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身份而存在的。同时,其附图《滇省舆地图说》对各民族的地域分布、州府舆图的绘制皆以山川、河流为主线,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共同生存的场域空间。图说通过地理空间的视觉建构,以可视化形式呈现人们共同生活地域和场域,也是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疆域的视觉表征。

在音乐图像方面,《滇省夷人图说》中频繁出现葫芦笙、竹簧等音乐符号。葫芦笙、竹簧不仅是广泛流行、广受欢迎的乐器,也与伏羲、女娲、盘古等中华民族共同祖先、起源开端的神话叙事紧密联系。这些象征着中华民族共同起源的音乐图像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集体记忆,增强了民族认同感。

(二) 共享性音乐符号:对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各民族呈现出文化上的“家族相似性”的特征,即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不一定共有某个相同的文化特性,但是每一个民族与其他一个或多个民族间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通过这些相似性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大家庭。这种文化上的“家族相似性”是以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基因为基础,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的。共享性图像符号正是呈现中华民族文化“家族相似性”的重要载体。共享性图像符号即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共有文化基因基础上,各民族在历史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在多个民族之间共同享有的视觉符号,这些图像符号表达着共同的象征意义。

《滇省夷人图说》中也有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家族相似性”的共享性音乐图像符号。该图说中出现乐器的12幅图分布在曲靖府属宣威、开化府、丽江府、楚雄府、蒙化厅及永昌、普洱府、临安府等地区。这些图像分布地域较广,但使用的乐器却大同小异。如:葫芦笙在图说中出现了3次,分别是曲靖府的黑甘夷、蒙化厅及永昌的妙猱猱和临安府的麦岔。三幅图中的葫芦笙形制完全相同,在日常歌舞娱乐和婚嫁场景中均有使用。铜铃图像两幅,分别为云南府保甸和开化府普列,铜铃形制和使用方法也是相同的。铜铃上方是个三叉形的手柄,下方是椭圆形铃铛,内有铃舌,手摇发声。又如,同是开化府的普剌和普岔,两幅夷人图像中的乐器都是大鼓、牛角号和铜鼓,且形制相同,只是在铜鼓的击打方式上略有不同,充分体现了相同乐器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间的共享和交流。(如见封三图7、图8)这些以葫芦笙、铜铃、铜鼓等为代表的共享性音乐符号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流通体现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也表征了在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基因下的“家族相似性”。

① 方李莉、孟凡行、季中扬、甘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共同体意识建构”笔谈》,《民族艺术》2021年第1期,第17页。

② 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0页。

（三）自享性音乐符号：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表征

自享性图像符号是指在某个少数民族内部自享，表征着某个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视觉符号，也是获得族群内部认同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在各自地域、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生活、服饰、习俗、信仰。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的差异性是在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基因基础上的多样性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一体下的多元。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就像是一个“文化生态园”，百花齐放、绚丽多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保持中华民族文化一体下的多样性恰恰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态园”繁荣茂盛、充满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前面的共源性符号和共享性符号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滇省夷人图说》中也有一些图像符号从自享性图像符号的角度表现中华民族乐器、服饰、习俗的多样性特征。乐器方面，《滇省夷人图说》中出现的乐器除了上面介绍的铜鼓、铜铃、葫芦笙、竹簧之外，还有苗子吹的土簫，普岔、栗栗、普列吹的牛角，花百彝的钹，喇嘛吹奏的刚洞，嫫且吹的木叶，等等。如，刚洞是由古代角类乐器衍生而来的一种寺院法器。铜制刚洞发呜呜音，音色粗犷，音量较大，常同时使用两只吹奏，先轮流吹奏，后再一起合奏，其乐有召神之意，主要用于喇嘛寺院诵经音乐、羌姆表演和宗教仪式等场合，是藏传佛教大型寺院常用的宗教乐器。又如，木叶是中国中南、西南少数民族利用一种叶面光滑、具有韧性的椭圆形树叶吹奏发音的乐器。吹奏木叶通过手指绷紧或放松叶片的各种技巧，改变叶片振动频率，由此发出高低、强弱不同的音响，其乐音清脆明亮、悦耳动听、近似人声。^① 这些音乐图像呈现出民族乐器的多样性。服饰方面，《滇省夷人图说》的音乐图像中呈现出云南少数民族独具一格的服饰风格。爨蛮、蒙化彝都喜披羊裘；花百彝、花土獠、普列等的女性都喜欢穿五彩带褶长裙；普剌女性穿彩裙，披龙纹边及地的披风；妙猓男戴雀帽、女戴三角帽，喜欢穿胸背带刺绣的衣服；苗子喜欢以布束发，穿彩色衣服。如，普岔作为彝族的一个分支，服饰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在披风边缘有火焰纹。《广輿胜览》中记录：普岔蛮“男女皆著青白长领短衣，披幅布，缘边如火焰”^②。习俗方面，龙人图像表现了在正月初一荡秋千、载歌载舞的节庆习俗；阿戛图像描绘了春耕时拾花草相送、搭手跳舞祈禾苗茂盛的节令习俗；蒙化彝图像展现了除夕前燃火把、唱歌跳舞以驱逐病疫的新年习俗；麦岔图像图绘了牵牛、提酒、吹葫芦笙以娱宾客的婚嫁习俗；普列图像描绘了用鸡骨占卜的祭祀活动；傣卜图像展现了法师摇铃、儿童牵羊祭祀田祖的仪式；喇嘛图像展现了吹号、击鼓、诵经的宗教习俗。《滇省夷人图说》的音乐图像通过舞乐场景表现出云南少数民族在乐器、服饰、习俗上的多样性特点，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表征。

《滇省夷人图说》通过山水风貌、人物形象、服饰用具、生产生活场景的描绘，一定程度上以视觉还原了清朝嘉庆年间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为清朝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通过对该图说三个层次的图像学分析，其音乐图像背后表征了清朝朝廷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起源和文化基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特征，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历程的见证。对《滇省夷人图说》音乐图像的图像学分析也有利于进一步激活图像史料，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乐声：《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第227页。

② 李泽奉、刘如仲：《清代民族图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页。

民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多维互嵌结构

——以一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为例

伍永辉

摘 要：当前，随着交往交流的增多，散杂居地区各民族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加，联系日益紧密，交融程度日渐加深。以湖北省襄阳市 Y 社区为例，空间互嵌为社区各族居民之间的接触与磨合提供了更多机会；经济互嵌使得彼此相互接受与依存；文化互嵌使得双方相互认可与信任，进而在他们心中牢固树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Y 社区民族工作的生动实践为散杂居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活范本，即在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维结构的基础上，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关键词：Y 社区；散杂居；互嵌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5) 01-0055-08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①。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医疗、就业等资源都在向城市集中，城市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东部和内地城市流动，散杂居化已成为民族工作一个新的阶段性特征。不同的民族适应城市化的能力不同，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可能会因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②。社区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内容和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载体，已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抓手和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Y 社区原称教门街，1964 年襄阳市政府将该街区改名为 Y 街。为进一步彰显民族特色，2009 年樊城区政府将其正式命名为 Y 社区。社区位于襄阳市交通枢纽——汉江大桥北端西侧，东起铁路沿线，西至朝阳路，北起解放路，南至汉江大道，辖区面积 0.12 平方千米。^③截至 2018 年^④，Y 社区共有 5 个家属院、9 个居民组，常住居民 1200 余户 2700 多人，其中回族 600 多人，约占社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稳定脱贫机制研究”（20AMZ017）。

作者简介：伍永辉，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3 年 10 月 29 日，第 1 版。

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3 年 10 月 29 日，第 1 版。

③ 襄阳市樊城区档案馆、襄阳市樊城区史志研究中心：《樊城年鉴 2021》，武汉：长江出版社，2022 年，第 249 页。

④ 此数据为 2018 年樊城区政府统计所得。因社区近年来在进行大面积拆迁建设工作，故近几年社区常住人口未有明确官方数据。

总人口的25%，属于典型的民族散杂居社区。多年来，在襄阳市委、樊城区委的领导下，社区党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按照“党建领导、民族同心、民生为本、共同发展”的思路，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不断促进居民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切实“有形、有感、有效”地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社区于2017年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称号，为当年湖北省内唯一获此殊荣的民族社区。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研究等方式获得相关材料，共面向社区居民发放问卷160份，回族、汉族居民各80份，回收有效问卷153份，其中回族居民77份、汉族居民76份。鉴于Y社区的民族构成状况，这里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发生在回族、汉族之间。

一、空间互嵌：分布上的交错融居

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居住空间是民族成员间建立社会关系、培育共同价值的基本场域。一个区域内各民族分布状况可以反映该地区的民族凝聚程度、民族关系现状和民族交融进度。因此，通过对民族空间分布的研究，我们可以窥探Y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情况。

元末明初，西域回回内附在全国范围内迎来了高潮，大批回民迁入中南地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聚居区，迁入湖北的回族多集中于武昌、襄阳、钟祥、沔阳这四个地方。Y社区地处襄阳城区、汉江之畔，商业繁荣，航运发达，周围有小渡口等多个码头可供船舶停靠，有舟楫之利，是荆襄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商品交易市场，吸引着大批回民来此经商，他们中的一部分遂在此定居。如清雍正年间，沔阳回民定士焕移居襄阳；同治元年（1862年）河南回民马氏第三十三世子孙马宏诰由河南新野前往襄阳出售牛皮，遂落籍樊城。^①位于Y社区内的樊城清真寺中藏有一块残碑，碑刻记载，该寺肇自明永乐年间。清代Y社区回族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据碑刻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重修清真寺时，参与捐款的回族已有222户；道光十七年（1837年）再次重修时，“我寺公同酌来，乡友意将在樊城，住教亲按各户逐户逐日抽取厘金，积少成多，至二十补修”^②。综上，回族先民在元代就进入了Y社区，明代呈聚居之态势，经过清朝前期的迁移、流动，至清朝中后期已然形成了聚居区。

民国时期，襄阳已经形成了“九街十八巷”的商业格局，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聚集地。Y社区原称教门街，为“九街”之一，意为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都是有教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他民族开始进入，社区逐渐从传统的回族聚居形态向民族散杂居形态转变。《襄樊^③民族志》对此就有记载：至1977年底，Y社区的回族人口约占社区总人口的40%。对此，社区一位姓马的回族老人讲道：“Y社区以前是襄樊最热闹、最繁华的街区之一，在这里经商、工作的各族人都有，但他们都不在这里住。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秩序越来越好，人们手里慢慢有了闲钱，就开始找地儿盖房子。那个时候盖房子没现在这么麻烦，有钱就能盖，我们这儿人少空地多，就有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人在这儿盖了房子、住了进来。”

改革开放后，社区人口流动加快，至2012年Y社区棚户区改造工程被纳入襄阳市“两改”工作前，社区共有居民1157户2517人，其中回族123户730人，占社区总人口的29%^④，交错融居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形成。近十年来，随着旧城改造进程的不断推进，社区人口流动更加频繁，部分回族居民因拆迁而搬到了襄城南街的回族聚居区，部分汉族群众随着“襄阳天下”项目的开发，以购买商品房的进入社区，使得回族人口所占比重进一步降低（回族人口仍在不断增长，只是占社区总人口的比重有所降低），原先围寺而居的现象逐渐减少，各族居民之间的居住地理界线日渐模糊，互嵌交融程度不断加深。

① 答振益：《湖北回族》，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17页。

② 马建钊、张菽晖：《中国南方回族团体与宗教场所文史资料辑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

③ 襄阳市曾用名襄樊市，2010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襄阳市。

④ 襄阳市樊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樊城年鉴2013》，上海：中国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567页。

彼此隔离、互不接触的“平行社会”状态，会带来民族关系脆弱、社会结构断裂的恶果，^①只有突破居住结构的割裂格局，各民族才具有向“共同体”发展的条件。分布上的交错融居，拉近了Y社区各族居民之间的交往距离，为交流交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机会，使他们能够在近距离接触中相互了解、尊重、包容，消除可能存在的误解和隔阂，增强对彼此的接受度和认同感。

二、经济互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集市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反映了特定区域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Y社区牛羊肉市场位于汉江之畔、交通要道汉江大桥之下，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各族群众在此工作、交易，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市场交往环境，是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重要缩影。经过多年发展，回汉商户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市场也成为闻名襄阳的牛羊肉交易场所，市场内形成了回族售卖牛羊肉、汉族经营牛杂的互补型经济模式。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流量和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社区其他产业的发展，使得居民们的收入不断增加、交往日益密切，交融逐步深入。

（一）市场垄断与恶性竞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Y社区是一个纯粹的回族聚居地，几乎没有其他民族的人在此居住。回族的饮食习惯，使得牛羊肉成为其主要的肉食来源。在这一时期，牛羊肉经营活动几乎全部由回族把控，垄断初具雏形。

1953年“三大改造”开始后，属于私营经济的市场逐渐被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所取代。1956年社区组建了牛羊肉合作社，1966年合作社被并入国营食品公司，由国家粮食进行统购统销，根据每家的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等因素按需定期发放粮票、肉票。这一时期，商品交易由人们自主经销转为国家统购统销，但无论是对牛羊进行屠宰加工的工厂还是生产合作社，抑或是国营食品公司开设的换购点，不是位于社区内，就是在社区附近。之前从事牛羊肉屠宰业和售卖业的回族居民也大多进入了国营工厂，从事的仍是与屠宰、加工有关的工作。因此，回族历史延续而来的牛羊肉经销传统并未被完全阻断。

改革开放后，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职能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放开了对市场的管控，政府由直接管理者变为了宏观调控者。社区牛羊肉屠宰业及销售业得以有所恢复并不断发展，市场再次焕发生机。据统计，改革开放七年内，襄樊全市的回族商业和服务业就已发展到22个。^②历史延续而来的经销传统一直深深根植于回族民众的基因之中，使其具有从事相关工作的优势，能够在市场复苏及国家政策放开之后迅速投入到这一行业中去。加之，回族具有经商的良好信誉，他们倡导诚信交易、货真价实，一般不会出现缺斤少两的现象，肉类品质也可以得到可靠保障，从而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越来越多的市民会专程前往Y社区进行采购。一个由回族群众所垄断的牛羊肉市场由此形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收入不断增加，普通家庭已有能力去消费在当时来说稍显“贵重”的牛羊肉，改变了“买肉者多尽回族”的现象，扩大了需求量，部分逐渐掌握屠宰技艺的汉族人独立出来加入了市场竞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强化个体和群体的利益意识，各种竞争会将同一族群的个体凝聚起来为获得某种稀缺资源而采取集体行动。^③在回族商户看来，他们世代以此为生，市场也是由他们组建起来的，现在生意红火了，汉族非要参与进来，那就是要抢他们的饭碗。因此，回族商户们纷纷团结起来以抵抗汉族对这一行业的“入侵”，进而出现了一些恶性竞争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商户们的整体利益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直到几年后，市场才恢复往日的繁华与热闹。

① 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及启示》，《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24页。

② 答振益：《湖北回族》，第127页。

③ 严庆：《族群动员：一个化族裔认同为工具的族际政治理论》，《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第35—41页。

（二）行业分工与良性竞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开放是大势所趋，没有谁可以形成垄断，它赋予了每个民族、每位社会成员平等竞争的权利和机会。在竞争变得不可避免时，回族商户只能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竞争力，于是作为族群身份标识的回族帽饰开始被广泛使用。

回族经营者家庭分工明确，分拣、售卖等较为细致的工作一般由女性负责。在无法阻拦汉族经营者入驻市场后，为凸显自己的回族身份，女性经营者们纷纷戴上了回族帽，其中也包括嫁给回族男子的汉族女性。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在多年发展历程中，回族商户们已经打出了清真牛羊肉的名声，建立起了自己的金字招牌。汉族入驻市场，就意味着需要与其共享这一招牌。为明确与汉族商户作区分，回族帽作为回族身份的象征开始被广泛使用，戴上回族帽，就彰显了自己的回族身份，就意味着其所售牛羊肉均为清真，而清真又是牛羊肉口碑和品质的代名词，从而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吸引了大量顾客，逐渐在市场竞争中占尽优势。

与之相比，汉族商户进入市场时间较短，既没什么名气，也无法获得“清真”认证这一吸引顾客的金字招牌，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久而久之，汉族经营者就退出了牛羊肉销售业，转向了回族民众不愿从事的牛杂业。牛杂作为牛肉屠宰、销售的边角料和附属品一直存在于市场之中，但真正受到广泛关注和追捧却是始于改革开放后的几年，稍晚于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关于社区牛杂业的兴起，据资料记载，牛羊肉销售摊位在每日收摊时会剩余许多没有处理的牛杂，为避免天气炎热变质发臭，遂将其低价甩卖甚至免费送给有需要的街坊邻居。一位汉族居民见此情形灵机一动，将买回来的牛杂剁碎洗净后，加上卤料，煮成一锅牛杂汤，当作臊子往素面上一浇，一碗牛杂面就被创新出来。吃腻了寡淡无味素面的社区居民对这麻辣鲜香、色香味全的“新品”甚是追捧，许多市民也纷纷慕名而来，于是面摊生意异常火爆，收益颇丰。^① 回族商户在此之后虽然也看到了牛杂所带来的可观利润，但当时市场对牛肉的需求量非常大，而宰牛这一工作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在做好牛肉经销的同时并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处理牛杂。何况，与牛肉相比，牛杂价格低、利润少，回族商户抱着有处理牛杂的时间为何不多宰头牛，这样效益会更高的心理，放弃了牛杂这一营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汉族商户则迅速抓住这一商机，变“废”为宝，使牛杂提高了自身价值，摆脱了附属品的身份，成为与牛肉并肩在市场中畅销的商品。

在市场存在着全年性经营户和季节性经营户，后者主要集中在春节前后两个月出摊经营。实地调研发现，在25户全年性经营户中，有20户专营牛羊肉生计，均为回族，剩余5户专营牛杂产品，均为汉族。在34户季节性经营户中，专营牛羊肉生计的有25家，其中23家都是回族，仅有2家是汉族，其余9家专营牛杂产品的商户则都是汉族。由此可见，在Y社区牛羊肉市场，虽然回汉商户交叉混杂经营，但行业分工却又十分明晰，几乎无汉族商户专营牛羊肉生计，牛杂产品的经销也几乎没有回族商户参与，形成了回族专营牛羊肉，汉族专营牛杂产品的“肉”“杂”分离的良性竞争格局。

（三）相互依存与合作共赢

随着“肉”“杂”分离格局的形成，回汉商户之间没有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都意识到恶性竞争只会损害双方利益，密切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襄阳牛肉面”就是社区各族居民共建利益共同体的典范。

如同兰州拉面和武汉热干面一样，襄阳牛肉面馆早已开遍襄阳市的大街小巷，而Y社区的陈家、马家、龚家所经营的则是被广大襄阳人所认可的、最地道的老襄阳牛肉面。关于襄阳牛肉面的兴起，据访谈对象讲述，今之襄阳牛肉面的做法最早是由一名陈姓汉族通过改良回族传统牛肉面技艺而来的。陈氏原本是回族饭店的工作人员，改革开放后，回族饭店在国营经济改组重建中倒闭，陈氏失业，遂加入自主创业的浪潮之中，其凭借工作期间学到的牛肉面制作技艺，在社区开办了第一家私营牛肉面馆，并在经营过程中按照襄阳人的饮食习惯进行了技艺改良，逐渐形成

^① 曾庆伟：《味蕾上的乡情》，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69页。

了现如今襄阳牛肉面的风味。多年来，面馆生意蒸蒸日上，现已成为社区内最大的牛肉面馆，即今汉江大桥桥头“陈家面馆”，每日从早到午排队等位的顾客络绎不绝。襄阳牛肉面是回汉民族文化互动、调适、交融的产物，它起源于回族代际传承的牛肉面技艺，后经汉族的创新改良，丰富了口感，使其成为一道适合各族群众的风味美食。经过多年发展，襄阳牛肉面逐渐由Y社区走向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从一道民族特色美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襄阳饮食文化符号。

当我们将社区牛羊肉市场视为一个整体时就会发现，在“Y社区牛羊肉”和“襄阳牛肉面”的金字招牌下，回汉商户都主动融入市场共同体之中，形成了关系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基于Y社区的地域认同就凸显了出来。具体而言，回汉商户为了生存发展和追求更大利益的需要，都不希望“牛羊肉”和“牛肉面”的声誉受到任何影响，从而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共享经营经验和生产要素，希望通过密切合作来实现互利共赢。在访谈过程中，社区内几家著名牛肉面馆的工作人员也讲到，其店中所用牛肉均来自市场中的商户，在生意火爆时店内所需牛肉量可占其供应商日销牛肉量的一半以上，而这些供应商也会准时准点将新鲜牛肉送上门并在价格上根据购货量给予一定的优惠。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发展是各民族的普遍诉求，利益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构成要素。Y社区回汉商户之间合作伙伴关系的确定，使民族利益得以平衡、民族团结得以巩固、民族交融得以深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文化互嵌：文化上的兼收并蓄

“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③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交融与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要求，决定着其他面向和领域交融互嵌的广度和深度。Y社区各族居民在交错杂居和经济依存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传播着本民族文化，也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其他民族文化，文化互嵌随之逐步推进。

（一）饮食习俗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个体生命延续的根本，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它的变迁发展最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社会适应、融合历程。Y社区回族居民虽然受交错杂居、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在饮食上的要求已不再那么严格，但本民族饮食禁忌的核心仍代代传承了下来，并进一步衍生到语言、态度与消费行为中，强化了该禁忌在实际生活中的履行^④。

调查问卷显示，社区接近79%的汉族居民都充分了解回族居民的饮食习俗，17%的人基本了解，剩下4%不太了解的人几乎只是在社区购买了房产但未曾居住过。汉族居民不仅了解、尊重回族的饮食习俗，而且逐渐接纳、认可乃至喜爱。社区汉族居民王阿姨讲道：“我认识的汉族邻里差不多都知道他们（指回族）的一些习俗……我非常喜欢吃清真餐，觉得月牙泉（Y社区内的清真餐厅）做的饭菜就很好吃，是我们聚餐或宴请（不会饮酒的宴席）的首选场所。”同时，社区回族居民特别是清真餐厅也会借鉴、吸收汉族的一些菜系来对菜品进行改良和创新，使得清真餐的品类更加丰富、味道更加美味。

社区回汉居民虽然在饮食习俗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随着交往的日益密切，彼此间了解和熟悉程度不断加深，几乎所有汉族居民都熟知回族的饮食习俗并会给予充分尊重，回族居民也没觉得饮食上的差异会对他们与他人交往产生什么阻碍。社区居民在这种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调适的友好氛围中得以密切交往、和谐相处、共同进步。

（二）节日礼仪

节日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构成某一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性地展示了该民族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9日，第1版。

③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9月1日，第1版。

④ 哈正利：《回族饮食禁忌论》，《回族研究》2000年第4期，第73—77页。

某种民族情感。民族节日的定期举办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新的平台,是增进民族认同、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融的重要渠道。与全国范围内的传统节日一样,Y社区回族居民的民族节日主要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

对待回族节日,社区汉族居民李先生讲道:“平常礼拜什么的我都会和我老婆(回族)一起。开斋节的时候我也会提前和单位请好假跟着他们家一起过,单位领导知道我老婆是回族,对这些也理解,一般都会批的。等到我们汉族节日的时候,他们家也照过,春节前会炸油馍、炸菜丸、弄蒸肉什么的,也得去彼此的亲戚家串门拜年,就是拜年的时候得注意,不能乱磕头。”

对待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社区回族居民马爷爷讲道:“春节我们也过,二十九我儿子和儿媳一般就会回来,大年三十儿一起在家里吃团年饭,初一开始就到处走亲戚、拜年,联络一下感情。除了不吃大肉外,我们和汉族过年没什么区别,都是一个样。不止春节,除了清明外的其他节日,我们这一块的回族都会过,最起码我认识的都过。”

调查数据显示,社区回汉居民对彼此的节日都比较了解。82%的汉族居民表示他们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回族的传统节日。89%的回族居民会过春节、中秋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回族节日的举办也为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场域,增加了人们认识、了解的机会,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认同。近半数的回族居民经常参加节日庆典、仪式等活动,26%的人偶尔参加。很少参加活动的大多为中青年,他们中的多数并非不愿参加,而是因为工作、上学等客观原因无法参加。同时,37%的汉族居民参加过回族举办的节日庆典活动,21%的汉族居民表示他们对此较为感兴趣,如果有时间的话愿意参加体验。

在Y社区,虽然因文化背景的差异,居民们在节日礼仪方面各具特色,但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下,许多回族居民除了过本民族节日外,也过汉族节日,部分汉族居民特别是回汉通婚家庭也会参加回族节日。在共同庆祝节日的过程中,汉族居民会自觉、主动地尊重回族居民的节日礼仪。回汉居民对彼此节日的接受、认可是族际互动的结果,反映了社区民族关系融洽程度和民族交融程度。

(三) 族际通婚

婚姻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互通,尤其是族际通婚,是民族间在社会结构层次上互动的一种体现,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两族成员间的通婚愿望是否得到本族群群体的支持,是体现两族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①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认识到族际通婚对社会稳定和皇权巩固具有重要作用,主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族际间的通婚。如《新唐书》载:“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宋会要》载:“海獠多蒲及海姓,渐与华人联姻。”元朝鼎盛时期东尽辽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朝代。疆域的扩张使得境内民族不断增多,随着这些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元朝迎来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普遍存在着通婚的现象。明朝更是以法律的形式对回汉通婚做了规定,蒙古、色目人现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族际通婚。

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巩固政权,他们对不同民族采取了差异性的民族政策,意图以此破坏民族团结,导致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增多。由于回族曾爆发过大规模的反清运动,加之其在全国分布广泛,没有一个有绝对影响力的领导人物,便于分而治之。因此,无论是清廷还是地方各级政府或地主豪绅都对回族压迫尤深。这一时期,回族逐渐由族际通婚转为族内婚,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面对外部的压迫,回族内部的民族意识和族群认同得以不断强化,内聚力不断增强,其自身逐渐排斥与其他民族进行婚嫁;二是明朝以来不允许回族内部婚配的法律已被废除,经过多年发展,回族人口规模已相当之大且在全国都有分布,基本可以满足内部择偶的需求;三是回族发现,在与其他民族大量通婚后,自身的民族文化元素越来越稀少,文化底蕴越来越薄弱,民族特征正逐渐消失。在Y社区,族内婚的传统也深刻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① 马戎:《民族社会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立前回族居民的婚嫁，甚至还出现了以制度来维护族内婚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确定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各种民族歧视和压迫的陋习被彻底革除，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各民族之间日益呈现出和谐共处的景象，为回汉族际通婚奠定了基础。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任何人不得加以强迫或干涉，为族内婚的变革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后，经过各方面的宣传教育，社区回族民众对自由婚配有进一步的认识，族内婚的习俗逐渐开始有所改变。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区许多回族青年开始脱离固有的生计方式，进入各种单位工作，传统寺坊结构凝聚的族内关系网络逐渐被打破，回族年轻一代之间的交往联系日益减少。与此同时，回汉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两族文化更是在密切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接纳、相互交融，彼此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多。共有元素的积淀及互动交流的增多使得两族青年经常一起学习、玩耍、成长，在此过程中对彼此产生好感，奠定了族际通婚的现实基础。

对待回汉通婚，社区汉族居民李先生讲道：“我和我老婆是上学的时候认识的，现在我们结婚都好几年了，感情还和刚在一起的时候一样好。当然偶尔也有摩擦和拌嘴，但都是两口子正常的事嘛。虽然我是汉族，她是回族，但我觉得民族不同不该成为两个人在一起的限制条件，感情才是最重要的，感情到了，彼此之间就会包容和体谅，就不会有什么大的矛盾和分歧，才能长久恩爱地过日子。”回族居民李女士也表示，“我不认为自己以后非得嫁给回族男生，遇到一个互相喜欢的人并不容易，管他是不是回族呢。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感情和性格，婚姻这种事还得看缘分和感情，和民族没太大关系。”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社区年轻人的思想越发开放、视野越发广阔、交际范围越发宽广，他们拥有更为自主的恋爱观、择偶观和婚姻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宗教信仰等对其婚姻大事的束缚越来越弱。同时，受交错杂居、经济合作、年轻人自主意识增强等因素的影响，社区老人对后辈们婚姻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逐渐接受了族际通婚，选择让孩子们自己决定终身大事，不再过度干预。现如今，在影响Y社区年轻一代缔结婚姻的各种因素中，民族身份不再是决定性和限制性条件。社区绝大多数未婚青年表示他们并不介意族际通婚，在婚配时首先考虑是否情投意合、门当户对、性格合适等非民族、非信仰因素。为整体把握社区回汉通婚的情况，调查问卷中设计了“您配偶的民族类型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鉴于社区汉族人口多于回族人口，因此仅统计回族居民的婚姻类型。在有效填写调查问卷的回族居民中，46%的人配偶为汉族，54%的人配偶为回族或其他民族。当两个族群间的通婚率达到10%以上时，可以认为这两个族群间的交融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①同时，为维持婚姻稳定，通婚的两个家族在共同生活中会相互迁就、相互包容、相互改变，使得民族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多、差异性逐渐减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Y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启示

Y社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形成有力促进了回族和汉族居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彼此间的共同性，而共同性的凝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日常生活情境下的呈现及缩影。对于散杂居地区各族民众而言，所处区域社会是一个混合了历史、生境、情感等原生因素与场景因素的场域，族际交往互动既为历史情景，又是当下常态。^②通过对Y社区个案的研究，可为散杂居地区做好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定的经验启示。

（一）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结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逻辑整体，具有空间、经济、文化等多重维度。其中，空间

^①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② 李洁、曾佳：《基于经济互动的回汉族群边界演进及共同性凝结——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路径》，《广西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第171—179页。

互嵌是基础条件。遥远的地理空间距离,意味着遥远的社会距离、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这是民族之间有效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阻碍。^① 分布上的交错杂居可以为后续的共学、共事、共乐拉近物理空间距离。经济互嵌是物质保障。对经济利益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各族人民的本真愿望,经济互动背后是由共生资源笼络的区域人群经济共生样态,其发生发展会直接影响其他面向和领域的交融互嵌。文化互嵌是本质要求。只有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嵌交融,才能激发情感的联结和内心的共鸣,形成较稳固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② 虽然不同维度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但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补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要件。因此,要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结构,不断增进各维度的互嵌性和黏合性,通过多维互嵌,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团结友爱美好家园,共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

(二) 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③。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属性是民族独特的符号印记,也是区分一个民族的本质特征。由于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和相对独立性,不同民族文化是与该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蕴含着该民族普适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因此,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差异的存在并不代表冲突的发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可以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汉族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民族,回族作为全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回汉文化在民族成员接触、交流、碰撞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使得两个民族的文化既保留了自身的特质,又促进了彼此间的交融互嵌。特别是在回族散杂居分布地区,这种趋势越发明显。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要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为原则,促进各民族对彼此历史、民俗、文化等的认知和理解,培育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社会环境,搭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平台,激发各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记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五、结语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愈加频繁,类似Y社区这样的散杂居社区将日渐增多,挖掘、归纳、总结不同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样化经验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民族散杂居地区而言,要想跨越空间、阶层、职业、文化、宗教等族群边界,实现各民族的交融与共、协同发展,就需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寻求空间、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互联互通,营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进而巩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社会氛围,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引导各民族树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严庆、于欣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空间整合视角》,《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第5—16页。

② 王瑜、马小婷:《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辨析、理论阐释与教育路径探析》,《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第32—39页。

③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场域、 价值逻辑与践行路径

刘世翔, 李 娜

摘 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国际国内两大时代场域, 从国际场域来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党的民族工作带来冲击挑战的时代必然要求, 从国内场域来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对民族关系提出全新要求的必然结果。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价值逻辑, 是构筑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的理念指引、加强和改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稳定器、两个“共同体”同心圆建设的逻辑中介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分别从强化政治保证、夯实经济根基、型构文化依托等多方面, 全方位坚实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根基, 打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各项基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5) 01-0063-09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总纲, 已然成为维系和谐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指引与精神动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充分肯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深刻彰显了铸牢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更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升至制度机制高度, 明确指出要“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②。在 2024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鲜明提出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将“四个共同”升华凝练为“五个共同”, 同时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③,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要“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

基金项目: 西藏民族大学 2025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一般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振兴研究”(项目编号: Y2025067)。

作者简介: 刘世翔,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李娜,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 第 1 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年, 第 29 页。

③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年, 第 3 页。

同体建设”^①。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抓手。党中央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定位及其重要性的不断强调，是着眼于国际国内两大变局的时代场域，面向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代诉求的客观需要，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有力凭依，可以为构建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内在性支撑与可行性实践路向。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中华民族大团结合力，稳步全面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步伐，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价值逻辑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场域

新时代新征程全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面临新的时代场域。统筹把握“两个大局”之下新时代新征程新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面临的挑战因素，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要素，也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合力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党的民族工作带来诸多挑战的重要推动力，有利于在把握机遇与应对挑战中更加深入地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

（一）国际场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党的民族工作带来冲击挑战

从国际场域来看，全人类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因应变化对党的民族工作带来诸多冲击与挑战。

第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党的民族工作带来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② 全球局势的急剧变动、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既给当前和今后外交工作带来新的时代机遇与便利条件，同时也给国内民族工作带来新矛盾新挑战。国际上美西方世界为了实现世界霸权，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不断制造和挑起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行和平演变等，致使国际局势紧张动荡。这既给我国民族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亦影响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力，不利于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民族复兴伟业的稳步推进。

第二，意识形态渗透冲击我国民族工作。当前，民族领域面临的意识形态渗透挑战仍旧严峻。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阵地，重视意识形态在民族团结工作中的影响，积极稳妥处理关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是确保新时代党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内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民族领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从未停止过，并假以民族和宗教的外衣对我国民族地区进行干扰破坏和渗透颠覆活动，肆意散播不利于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错误言论，对我国各族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造成严重误导，极其不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筑和民族大团结局面的维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创新性民族话语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安全挑战的现实背景，是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明辨是非、正确区分政治原则、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民族理念。

第三，多元价值理念倾销影响民族团结。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交互程度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各国的交流联络、依存程度空前深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进步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但是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普及，美西方国家借助网络传播等现代化媒介不断对我国各族干部群众传播西方多元主义价值观，采取多种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对我国输出带有明显西方政治文化特点的价值理念，致使我国部分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影响，逐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质疑和文化自卑心理，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受到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众化普及和全方位牢铸，既不利于民族团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1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75页。

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也在实践运用方面阻滞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

(二) 国内场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对民族关系提出全新要求

从国内场域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方位,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出新的诉求。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对党的民族工作提出新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秉持世界视野观照世界局势变化和国内发展要求,对新时代新阶段目标任务的再度重申和话语表达。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方位,要求全方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凝聚思想共识、激发精神自觉、汇聚实践伟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境况和时代重任,始终致力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完成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任务和奋斗目标,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路向砥砺前行。回望党的百年历史,我们党在百年实践征程中,坚持将初心使命体现在带领各族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实践历程中,始终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贯彻主题和奋斗旨向,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系统昭示了党领导人民团结奋进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也集中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意涵。

第二,实现民族复兴需要更加稳固的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迈入新征程新阶段,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①。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这需要稳固的民族关系、强大的民族团结力量以及高度的“五个认同”意识作为内在支撑。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牢固坚实的民族关系,是推进民族复兴的内核影响因素,关涉到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的打造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进程。由此,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方位铸牢,既是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必然要求,亦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需要。

第三,拟合发展不平衡所带来心理逆差的现实需要。长久以来,由于社会历史因素和现实发展条件的限制,一些少数民族所处地区地理位置偏远、气候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现代化发展程度较之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具有较大差距。尽管伴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脱贫攻坚战略的施行,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是长久以来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主义矛盾转化所导致的心理疏离感和不平衡感仍旧存在,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全面消除。这不仅极易导致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卑心理,而且不利于中华民族一家亲和谐局面的打造,会影响中华民族凝聚力、感召力和向心力,严重削弱全国范围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铸牢。通过积极号召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最大程度上弥合这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心理逆差,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二、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的国家荣誉感、民族使命感和心理归属感,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新时代新征程,面向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时代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从思维意识层面凝心聚力,最大限度地汇聚各族人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信念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及同心共筑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意识。这对于构筑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加强改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推进两个“共同体”同心圆建设以及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价值逻辑和时代意涵。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2页。

（一）构筑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的理念指引

第一，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理念指引。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系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的精神文化基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历经岁月磨难与历史挑战，从分裂走向团结、从松散走向紧密、从多元体系走向一体格局，在交往交流、互通互鉴中不断实现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大格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确切来说是同属一个大家庭的家庭成员关系，是一体与多元的共生关系，五十六个多元民族共同建组成一体的中华民族。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能够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①，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断提升对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认识，有效构建新型民族关系，继而不断夯实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思想根基，促进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的打造。

第二，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秦始皇实现全国统一形成古代大一统思想，到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再发展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寻求多民族共生共荣和谐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统一的真实写照。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要目标和价值取向，一个国家和民族，唯有在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的思想认同基础上，方能形成实现共同理想的磅礴合力，否则只会落得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而在新时代新征程新阶段发展语境下，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随时需要应对的意识形态思想渗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引导各民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深刻认识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系民族团结和谐，是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和最高利益，各族人民要积极树立和稳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国家总体安全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凝心聚力，提供强大实践动源和精神动力。

第三，深化命运共荣的思维意识根基。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深化各民族命运共荣意识。构建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离不开民族与国家命运共荣的思维意识，各民族与国家整体前途命运的共生共荣，则是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原则之一。妥善解决好民族问题、构建起和谐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既是做好当前民族工作的中心基点，同样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兴盛的轴心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联结和沟通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中间桥梁。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需要汇聚所有民族的奋斗力量与精神动力，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处理好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达成各族人民关于民族与国家命运共荣的共同体意识。而协调好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二者的关系，首先应明确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国家前途命运依赖于民族关系与民族利益而存在，民族利益与民族命运同样依存于国家前途命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离开国家整体的民族利益，亦没有脱离民族利益单独而存在的国家利益。概言之，面对如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要在尊重各民族多样化需求以及不同特殊利益的基础上客观剖析国家整体利益，通过引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夯实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维意识根基。

（二）加强改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稳定器

第一，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利益的精神价值共识，是全面增强民族团结、加强和改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价值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是新时代发展境遇下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8页。

的理论指南与实践运用。通过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遍化铸牢,能够有效提升各族人民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意识,切实维护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助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实践。

第二,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创新性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耦合性时代场域,结合新时代我国民族发展面临的挑战性因素和时代性诉求,围绕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需要提出的创新性民族理念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然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和总纲,在民族事务治理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内容与实践路向的重要方面。自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在内涵表述、时代价值、实践内容等方面均伴随着新时代民族问题和国内现实不断予以与时俱进的发展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党的民族工作发展进步的重要方略,需要长期坚持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民族意蕴与价值内涵。

第三,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内生性动力。各族人民的民族团结意识与民族团结实践是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亦是关涉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内生性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思想认识和价值理念,是推进民族和谐、增进民族认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铸牢过程,本质上就是促使各族人民群众增强对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共识凝聚的过程。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是提高全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加强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灵魂关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迈入新时代、面向新征程,唯有坚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辅之以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五个认同”意识的内涵作用,充分调动起五十六个民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感,才能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集中昭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内生性动力的重要作用,进而实现各民族地区稳步前进发展,打造“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①的中华民族一家亲格局。

(三) 两个“共同体”同心圆建设的逻辑中介

第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指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时代稳步推进,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凝聚和情感牵引机能的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指南和实践运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在党的各项民族工作中,紧密贯穿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项工作中。如此一来,既有利于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②,也更有助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6月份在青海考察时指出,“五十六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意涵和内核要义作出了明确界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旨在最大限度地团结五十六个民族,将五十六个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汇聚成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动力。

第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样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习近平关于“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国内表达,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世界层域的国内延伸,是习近平关于“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世界表达,体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统一。通过引导国内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和稳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能够从实践意义上为在国际大国外交层域,携手世界

① 《习近平讲故事》(第二辑)编写组:《习近平讲故事》(第二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52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45页。

③ 杜尚泽、贺勇、张晓松等:《“五十六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青海、宁夏考察纪实》,《人民日报》2024年6月23日,第1版。

各族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建构经验和引领示范作用,也能够为各民族提供民族事务治理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深化世界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认同,共圆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美好梦想。

第三,扎实推进两个“共同体”建设的逻辑中介。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共同体”理念分别折射在国内民族工作领域和世界大国外交维度的重要表征。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促进国内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念指南,旨在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和中华民族一家亲,推进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筑亦不能脱离世界场域而孤立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在全球化共同发展境遇下进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经验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实践样板和经验启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在其中起到联结互通的逻辑中介作用,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能够维护民族和谐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也能够为世界各民族的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提供实践引领作用。

(四)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

第一,有利于构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稳定民族环境。民族地区团结稳定既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新时代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的现实保障,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社会环境基础。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发展格局,五十六个民族构成了一体的伟大中华民族,共同谱写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新时代篇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务须建立在各民族团结友爱共处的基础上,不仅需要以稳定安宁的社会环境作为实现条件,而且需要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为内在支撑。处理好民族关系事关民族内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程度,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紧密相关,关涉到新时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有效提升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的正确理解,有效维护各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与安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稳定的民族社会环境。

第二,有利于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族人民力量。中国梦既是国家的梦,也是民族的梦和人民的梦。各族人民都是“同心共筑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进。“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①而各族人民亲如一家局面的创造离不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神驱动和力量汇聚作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的重要课题”^②,通过广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人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③的高度认同,充分汇聚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实践伟力,铺就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内生动力与强大力量。

第三,有利于打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富裕局面。实现共同富裕与实现中国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共同的逻辑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共同富裕的实现紧密相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等领域的全方位民族复兴梦想,是集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于一体的共同梦想,以充分昭彰人民共同利益的共同富裕为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④坚持新时代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旨在增进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为实现民族复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页。

② 黄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祖国完全统一》,《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8期,第41—48页。

③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61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3页。

兴奠定重要基础。共同富裕既是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价值基石,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指向。各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决定其发展前途与命运,进而影响国家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关涉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因而,通过积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将其充分彰显在以新质生产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积极构建起新时代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助力于伟大复兴梦想的顺利达成。

三、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路径

铸牢与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内容的纵向延伸与实践践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离不开全国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与共同努力。由此,务须“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①。具体而言,要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工作的全方位推进,从强化政治保证、夯实经济根基、型构文化依托等方面进行细致探讨,以充分奠定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根基,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建设,携手各族人民共谋中华民族大团结、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一) 强化政治保证:积极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

第一,坚持党对民族工作全面领导,发挥领导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始终坚持把解决民族问题作为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贯彻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即在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下,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解决当下的民族问题、推进民族工作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当下民族工作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民族工作的践行中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这充分说明,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发挥党的领导制度优势,逐步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②,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第二,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法治在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中取得了空前的地位,有效保障了民族事务治理的有序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用法治的思维方式去规范和引导民族问题的解决。推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首先,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坚持把法律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进而实现民族事务的依法有效治理。其次,要确保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正确运行,加快建立起有效的政府监管体系,依法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公平有效实施。最后,加强对各民族的法治宣传教育,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树立各民族同胞的法治意识,在促进民族事务法治化实施的同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

第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加强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制定了并不断加以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不仅从制度上保障了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也有效地解决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治理难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基础,必须在新时代新征程民族事务治理中继续坚持巩固和不断发展完善,以有力确保人民当家作主、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7页。

②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7页。

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充分发挥其维系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民族团结,维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效提升各族人民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向心力,有效提升全国各族干部群众的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意识,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二) 夯实经济根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厚植物质根基

第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离不开坚实的物质保障基础。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稳步推进各地区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以经济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务须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②相衔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别,积极促进城乡、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推进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通过深化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确保各民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有效提升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意识。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其中最为根本和最为紧迫的任务。这要求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有力促进各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与各民族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更为契合的生产关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因地制宜、开放创新地稳步发展新质生产力。结合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和经济发展条件,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各地区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渐融为一体,共同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确保各民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享现代文明成果,“为建设共富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③,从物质经济维度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和宏观经济治理作为助推动力。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健全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有力有序地推动各地区经济持续健康稳步发展提高。务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逐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同时统筹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满足人民在财税、金融等经济领域的经济发展需求。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效提升科学的宏观调控水准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水平,从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维度有效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提升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认同意识,促进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推进发展。

(三) 型构文化依托:以文化认同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第一,推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提升文化认同意识。“中华文化认同是深蕴在全体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纽带。”^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通过推动各民族之间的多元文化交织交流、融合汇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巧妙融合,在包容多样、异彩纷呈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而汇聚起中华民族整体性文化认同意识,实现文化认同的更高层次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8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22页。

③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第17页。

④ 齐付清、孔建勋:《以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学术探索》2024年第6期,第65—71页。

定文化根基。此外,亦只有通过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精神基底,才能够准确找寻出与科学整合起各族人民在心理基础、情感依托、共同利益上的契合点、共鸣点与融合点,在共生共荣、交融互助、互惠互利中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实现民族之间的团结共赢。新时代新征程,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文化目标指向,通过推进各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交织交流交融与共同繁荣发展,能够极大地提升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意识,从文化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二,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基础和文化依托,能够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赋予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时代任务,离不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支撑和情感牵引,需要多举措协同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深层次认同。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植根各族人民内心深处。加强对各地区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和历史文化教育,不断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①,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植入孩子们的心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形成更加深刻的认知,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第三,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②。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切实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不断优化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积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同时,正确处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不断提升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文化认同感,促进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文化根基。

四、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面对两个大局的时代场域和党的民族工作发展诉求,以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心任务,需要全方位坚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凝聚、精神感召和情感牵引价值,以此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调,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引导中华民族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心聚力携手构筑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通过不断地多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把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凝聚到一起,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③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6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32页。

③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谱写好宁夏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6月22日,第1版。

“因俗而治”与疆域“大一统”

——以清前期边疆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朱 强, 庄弘泰

摘 要:“大一统”是中国历代王朝追求的政治理念,而实现疆域一统则是“大一统”的重要内涵。清前期的边疆治理集历代之大成,对“因俗而治”思想的因地、因时、因人的灵活运用,通过“因俗设官”,制定专门法律法规等,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治理,实现了对辽阔疆域的“大一统”。清前期的边疆治理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技艺,不仅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辽阔疆域,而且为今天优化边疆治理体系、完善中国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历史经验。

关键词:清前期;边疆治理;大一统;因俗而治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5)01-0072-06

引言

中国历代王朝往往将作为政治理念的“大一统”落实在疆域一统。但是,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广土众民、国情复杂的超大规模国家,边疆与内地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历代王朝在边疆治理中,往往会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地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在此基础上实现疆域“大一统”。清朝是古代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前期^①的边疆治理集历代之大成,是“因俗而治”治边思想的集大成者。目前,学界关于清朝的边疆治理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②尤其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青年项目“清末云南留越学生历史书写中的中国意识研究”(QN202314)。

作者简介:朱强,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史;庄弘泰,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① 本文中的清前期指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

② 如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李治亭:《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周竞红:《“因俗而治”型政区:中国历史上“一体”与“多元”的空间互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张云:《少数民族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学海》2008年第5期;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李金飞:《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廖国强:《“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清代云南改土归流地区两种文化治理方略及其关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再诠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李大龙:《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李大龙:《试论游牧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实践》,《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李金飞:《论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是李金飞论述了清朝疆域“大一统”观的特点,提出清朝“运用疆域‘大一统’观来达到以‘地’建‘统’的终极目的,确立起凭疆域即可为‘正统’的唯一评价体系”^①;王向民、陈立业指出清代“复兴‘大一统’的空间本义,兼顾汉化的同时容纳少数民族特性,呈现出多元样态,从政治实践方面丰富了大一统形态的历史可能性”。^②这些研究的视野与内容颇多新见,并观察到了清朝对边疆认识及治理的变化,同时,学界对“大一统”与“因俗而治”的渊源、演变与特点也有研究,^③但是多为长时段研究,对清朝“大一统”与“因俗而治”两者的关系的研究尚有深入空间。因此,本文在梳理清前期边疆治理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分析清王朝如何通过“因俗而治”的具体途径,最终将边疆地区逐步纳入统一国家之中,实现疆域一统。这样,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清代边疆治理政策的灵活性与丰富性,而且可为今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中国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提供历史的经验与启示。

一、以地建统:清前期的疆域“大一统”

“大一统”既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统一的政治理念,也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思想的核心。“大一统”出于《春秋公羊传》。《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注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④“大一统”思想形成后,历经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成为影响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重要思想。^⑤

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大一统”思想有其独特之处。纵观历代王朝,“疆域‘大一统’观与文化‘大一统’观相互交织、对抗”,由于王朝建立者的差异,往往形成“少数民族侧重疆域‘大一统’观,汉人政权强调文化‘大一统’观的分离趋向”^⑥。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这种先天的“短板”导致其统治合法性的缺失,无法凭借文化立国。因此,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疆域“大一统”,认为“只有构建起超越以往历代的疆域,才能稳固立国根基”。对此,学者将其概括为“以‘地’建‘统’”。^⑦

清代的疆域“大一统”有了全面突破,形成“合‘内外’疆域为一国”^⑧的局面。清代以前,历朝构建的“大一统”疆域观未包括边疆地区,尤其是长城以外的“三北”。至清代突破长城,把边疆地区纳入“大一统”疆域内,实现了“中外一家”局面下的“大一统”。^⑨

清王朝为实现“大一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自1644年清军入关到18世纪中叶,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清王朝最终达成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实现了疆域

① 李金飞:《论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80页。

② 王向民、陈立业:《“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第181页。

③ 李伟、孙任哲:《“大一统”格局下的“因俗而治”: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理念引领下的治道意识》,《道德与文明》2023年第2期,第92—101页。

④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八·《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隐公元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66页。

⑤ 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3期,第43—58页。

⑥ 李金飞:《论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第73页。

⑦ 李金飞:《论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第74—78页。

⑧ 李金飞:《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第86页。

⑨ 李金飞:《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第75页。

一统。在西北边疆,清战胜卫拉特蒙古及西域诸部,收服西部广大地区。经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清占有阿尔泰山以东地区。1720年,清兵入藏,结束和硕特和准噶尔等统治西藏的时期;1724年,平定青海和硕特部之叛;1757年,平定准噶尔部,准部所属地区(包括乌梁海诸部)尽入版图;1759年,平定天山以南的回部。在北部边疆,通过雅克萨之战和外交谈判,确定中俄东段、中段边界。1689年、1727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边界的东段、中段。1728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界约》再次重申了以上两个界约的规定。在西南边疆,乾隆末年击退廓尔喀(尼泊尔)对西藏的侵扰后,相继与廓尔喀、布洛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等划定了边界。^①

至此,清王朝疆域西起葱岭、巴尔喀什湖,东至库页岛,北抵西伯利亚南部萨彦岭和外兴安岭,南及南沙群岛。“边疆地区真正被纳入‘中国’范围内,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奠定了近代中国的领土基础。

二、因俗而治:清前期边疆治理的政治技艺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超大规模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边疆地区,其居民的情况也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富有弹性的治边思想,形成了对边疆地区因人、因地、因时而治的传统。^③历代王朝根据具体情况,针对不同地域,制定相应的治边政策,历代边疆治理思想有着前后相继、不断发展的延续关系,发展至清朝趋于完善。^④

清前期的边疆治理进一步发展了“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贯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李兆洛将清前期的“因俗而治”思想概括为“其于诸藩也……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来则怀之,劳则劳之……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⑤。基于这样的治边思想,清前期推行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边疆治理政策。

其一,在中央“特设”筹边机构——理藩院,^⑥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理藩院所属有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徠远、理刑六司,分掌部界、封爵、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会盟、朝贡、贸易、宗教等事项。^⑦理藩院负责处理内蒙古、喀尔喀蒙古、青海蒙古、唐努乌梁海、新疆、西藏等地事务。同时,为了强化对这些地区的管理,理藩院还派出相当数量的司员驻扎在基层,参与地方的司法管辖。理藩院通过其派出机构和人员的设置,有效地监督地方司法机构对案件的审理。这样,清中央政府通过理藩院从中央到地方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实施全面控制,达到有效治理边疆的政治目的。^⑧“从纵向来看,清代理藩院组织严密,职掌分明;从横向来看,理藩院则在行政上具有相当的独立地位,并对驻边的将军、大臣具有直接指导的权力,因此处理边疆要政,上通下达,事权统一,职责明晰,有迅赴机宜之功,从而确保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和统治。”^⑨“理藩院的设置不仅开创了我国在中央政府中设置民族管理机构的先河

① 马大正:《马大正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499—500页。

② 李金飞:《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第86页。

③ 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3页。

④ 李大龙:《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第98—106页。

⑤ (清)祁韵士著,刘长海整理:《皇朝藩部要略》,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

⑥ 赵云田、成崇德:《略论清代前期的“因俗而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第19页。

⑦ 夏征农:《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216页。

⑧ 马青连:《清代理藩院的法律功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0—44页。

⑨ 成崇德:《清代边疆民族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208页。

……而且也体现了清前期‘因俗而治’的民族统治政策。”^①

其二,在机构设置方面,实行“因俗设官”。清王朝根据不同边疆地区的情况,设置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针对边疆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在东北地区,主要实行军府制度,即由中央派将军分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副都统专治八旗旗人之事,设府、州、县机构,管理汉民事务;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同时清政府在蒙古地区也设立军府,派遣将军、都统、大臣分驻各地,屯兵驻守,对所辖的盟旗代表中央政府实行监督与控制;在新疆地区,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在南疆地区设参赞大臣管理军政事务,同时在地方行政方面保留伯克制;在西南地区,清初仍沿用土司制度,至雍正年间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又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这种“通过宗教问题来解决边疆领土,无疑是极富想象力的政治技艺”^②。同时,清政府从雍正年间开始设驻藏大臣,噶伦等重要官员的任免也由中央政府决定。在西南地区,清初仍实行土司制度,至雍正年间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才有所变化。清王朝在边疆地区“因俗设官”的统治方式,反映了“以民族地方建置统治边疆是我国边疆治理的一个历史传统,与今天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存在着渊源关系”^③。

其三,针对边疆地区专门立法,规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清朝边疆治理的另一个创新,就是总结历代管理边疆民族的经验,进行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先后制定了《理藩院则例》《盛京条例》《蒙古律书》《回疆则例》《钦定西藏章程》以及《西宁青海番夷成例》等一系列与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清朝“把制定和完善民族立法提高到治国方略和基本国策的高度,清朝民族法规数量之多,规范之细密,制度之完备,不仅为历代所未有,也是世界法制史上少见的”^④。这些法律法规使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边疆民族事务管理的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维护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而且留下了大量可供借鉴的治理多民族国家的经验。^⑤

总之,“因俗而治”作为边疆与内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在一定时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条件,是边疆地区由“不治”到“治”的重要转折,曾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基本上贯彻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思想,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⑥“客观上使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对清王朝中央政权产生了一种向心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⑦。所以,“满族建立的清朝政权,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⑧

三、一国多制:清前期“因俗而治”与“大一统”疆域的巩固

“大一统”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统一的政治理念,实现疆域一统是其重要内涵。^⑨但是,要将

① 赵云田、成崇德:《略论清代前期的“因俗而治”》,《青海民族学报》1983年第2期,第20页。

② 强世功:《“一国两制”的历史源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七》,《读书》2008年第6期,第7页。

③ 程妮娜等著:《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43页。

④ 张晋藩:《清律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139页。

⑤ 廖杨:《论清代西北地区的民族立法》,《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第74页。

⑥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1—73页。

⑦ 赵云田、成崇德:《略论清代前期的“因俗而治”》,第21页。

⑧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2页。

⑨ 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第43—58页。

“大一统”的理念落实到疆域一统的现实,需要妥善处理好边疆与内地的差异性,需要立足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因俗而治”。清前期在边疆治理中,以“大一统”为最高目标,而在具体实践中,则根据边疆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政策。

“因俗而治”是在“一统”前提下的因时、因地、因人而治。清王朝能实现对空前广袤疆域的统治,与其在“一统”下推行“因俗而治”有着密切关系。^①清王朝在东北地区设奉天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初为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将军等三将军辖区,在西北有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和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等两将军辖区,在青藏地区设西宁办事大臣和驻藏办事大臣两辖区等。清王朝通过在各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设置不同的机构,给予程度不同的自治权,将边疆地区纳入大一统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

纵观清前期的边疆治理,不难看出“因俗而治”是在“一统”的前提下,承认不同地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不同地区因时、因地、因人而治,它的发展演变具有多样、复杂的特点。但是,这仅仅是统一主权下的政权形式之别。正如方国瑜先生指出:“(我国各民族)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构成一个整体。在整体之内的各族,各有具体情况,社会发展不平衡,政权形式是不同的,但都是国家主权区域是一致的。”^②换言之,“因俗而治”仅仅是政权形式、治理机构、治理政策的差别,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框架之下,为维护统治、对特殊领域进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措施……无论是汉之属国、唐之羁縻府州、元以来之土司制,皆是划入版图、纳入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灵活治理方式”,^③而不能视为国家主权的差别。清朝边疆治理的目标是强化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强调国家的统一,强调边疆地区的安定。只有稳定的边疆,才能贯彻适宜各民族的“因俗而治”政策。^④因此,清朝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尚未能直接进行统治时,就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但是绝不允许有背离清朝大一统的行为。在施政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最后达到由中央政府有效治理的目标。^⑤由此,“因俗而治”巩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通过‘因俗而治’确认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上与中央的关系,以区别于中心区域的统治方法,节制和管辖边疆民族,将其纳入了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中”,^⑥“因俗而治”成为“大一统”从政治理念落实到现实中疆域一统的重要途径。

“大一统”是王朝的最高目标,但与现代国家不同,“大型传统国家内部存在异质性”^⑦。古代中国广土众民、国情异常复杂,历代王朝在具体实践中不得不根据边疆地区的历史传统、社会情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制定出适应当地实际的管理方式。清前期边疆治理中的“因俗而治”思想也是历代边疆治理的一个缩影,其治理模式中蕴含着“一国多制”的理念。在清前期边疆治

① 需要指出的是,清朝以“因俗而治”的方针治理边疆地区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各民族交流,影响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消极的政策,影响比较大的有“隔离政策”和“封禁政策”。“隔离政策”出现在台湾和天山南部的回疆等地区,台湾有汉番隔离政策。参见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

② 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方国瑜著,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1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③ 贾益:《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与“大一统”》,《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第53页。

④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6页。

⑤ 成崇德:《清代边疆民族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

⑥ 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7页。

⑦ [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3页。

理的思想体系中，“大一统”是最高目标，“因俗而治”是实现该目标的具体途径。由于边疆与内地差异性的长期存在，清朝在治理边疆的实践中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策略，因时、因地、因人采取不同措施，最终将民族众多、地域广阔的边疆地区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奠定了近代中国的领土基础。

四、结语

清前期的边疆治理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技艺。清王朝在“大一统”的最高目标之下，在边疆治理中因时、因地、因人地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最终将其纳入“大一统”之中。清前期的边疆治理以“大一统”为最高目标，以“因俗而治”为具体途径，通过在边疆地区灵活采取不同的治理制度，实现了对超大规模国家的有效治理，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辽阔疆域。

“统一不是全国范围的铁板一块，完全一致，毫无分治分立现象”，^①而是统一中也有差异性，允许各地存在差别。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紧密联系为“大一统”奠定了基础，而“因俗而治”则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的重要途径。清朝在“大一统”目标的推动下，对“因俗而治”原则的灵活运用，不仅保障了疆域“大一统”的稳定与延续，而且为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积累了宝贵经验，体现了“大一统”的包容性。正因为有这种包容性，才能不断将边疆地区纳入统一中国之中，并在近代以来遭遇列强入侵的巨大冲击后，仍能保有大部分疆域，并最终建立起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戴逸：《中国民族边疆史简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西南联大新校舍考

龙美光

摘要：西南联大新校舍是西南联大这所闻名中外的一流名校办学历史、办学文化和办学精神的重要物质承载。在传续西南联大历史文化、讲述西南联大教育救国故事的过程中，新校舍亦是一个不可替代、不可绕过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和历史遗产。本文着重钩沉西南联大新校舍建设的始末，用翔实的史料拨开历史迷雾，纠正了一些有关联大新校舍的历史误解和讹传，并借此追寻西南联大在物质上的“不得了”（艰苦办学条件的不得了）和精神上的“了不得”（师生精神风貌的了不得），为新时代传承弘扬西南联大爱国精神提供历史路径。

关键词：西南联大；史实考证；新校舍变迁；梁思成；林徽因

中图分类号：G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5）01-0078-08

位于昆明大西门外的“新校舍”，是西南联大自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以后唯一的自建校舍。它见证了西南联大五色交辉、璀璨夺目的教育传奇，承载了广大师生刚毅坚卓、克底于成的时代记忆，书写了可歌可泣、光辉灿烂的历史一页。

1992年7月5日，汪曾祺在散文《新校舍》中深情地回忆了联大新校舍的人和事，吸引了数以千万的读者走近西南联大，品读西南联大。

这是一所内迁的联合大学，何以有“新校舍”一说？汪曾祺先生倒也说得明白：“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坟主的后代大都已经式微或他徙了，联大征用了这片地并未引起麻烦。有一座校门，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连下雨，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为东西两区。”^①自建校舍为新校舍，余则系租借性质。

一个“新”字，不过为了区分租借校舍与自建校舍而已。联大在滇办学八年。无论1938年短暂设立的蒙自分校、1940年设立仅一年的叙永分校，还是昆明城区的其他校舍，均是租借性质。这些租借校舍，或位于昆明城西城东的中学、农校、工校，或位于各类会馆。师生们的住宿和实验室，则多寄寓于寺庙、祠堂，以及当地的官商、士绅和农家中，成为战时大学教育的一道特殊风景。

正如汪先生所说，位于大西门外的124亩多自建校舍，虽谓之“新校舍”，其实很简陋。它并非我们想象中气派华丽、窗明几净、设备先进、又新又好的现代化学校的模样。这个自建的校舍，

作者简介：龙美光，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编有《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著有《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研究方向为西南联大史。

① 汪曾祺：《新校舍》，《中华散文珍藏本 汪曾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其实更像一个云南落后地区的乡村聚落，大部分是低矮的茅草顶学生宿舍和铁皮顶教室，只有图书馆和食堂是瓦顶的高大建筑，而教室内部多施以桌椅两用的“火腿凳”。

那么，如此简陋的西南联大新校舍是如何启动建设的，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是谁设计了它？我们有必要跟着档案和文献的记录，走进这一段珍贵的历史。

一、建筑新校舍之议

七七事变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教育部令辗转南下，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那里有清华已提前建成的部分校舍，外加在韭菜园圣经学校、涵德女校、四十九标营、岳麓书院、南岳圣经学校等处租借的房舍，这所临时大学终于在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了。

“临时大学”之“临时”，名副其实。开学三个多月后，在日寇炮火的频繁威胁下，学校只好再迁云南。全校师生于1938年2月中旬分三路启程，于4月底全部抵达昆明。其间，4月2日教育部“汉教字一六五四号”电令：“国立长沙、西安临时大学：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①校名由“临时”而“联合”，表明了国家高等教育为抗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一日不胜利，这两所联合大学的教育抗战将一日不结束。

迁到云南后，西南联大一面租借房舍继续办学，一面筹建新校舍。4月19日，在师生还未全部抵昆前，联大在昆明本校办公处召开了第58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报告，清华大学决定补助联大建筑经费10万元（从3月起拨，年底拨完）。同时，决定在昆明建筑校舍（预算暂定20万元），设立以黄钰生任主任，胡适（冯友兰代）、周炳琳、潘光旦、饶毓泰、施嘉炆、庄前鼎、吴有训、杨振声、袁同礼、杨石先、孙云铸、李继侗、赵友民、陈序经为委员的建筑设计委员会。常委会还决定设立以施嘉炆为主任，王明之、杨铭鼎、蔡方荫为委员的工程处，处理建筑工程事宜，还特别聘请正在中国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的梁思成为工程师^②。

就这样，联大在昆明还未开学之时，就把新校舍的建设作为极端重要的工作排在了需要急抓紧抓的工作日程里。梁思成作为非学校编制的建筑工程师，也成为西南联大新校舍建设工作的重要人物之一。

二、梁思成、林徽因的建筑设计被暂缓实施

1938年5月16日，蒋梦麟常委签发了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联大关防此时应尚未到校，故仍以“临大”名义）致中国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的函：“迳启者：查本校拟在三分寺附近建筑校舍，敬请贵社担任设计及建筑事宜。特此函邀，务希惠允为荷，此致中国营造学社”。^③原来，请梁思成为工程师，主要是为了委请中国营造学社担任联大新校舍设计及建筑事宜。

5月22日，梁思成作为中国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法式组主任复信联大：“迳覆者：前接五月十六日合字一一三号大函，贵校拟在三分寺附近建筑校舍，嘱敝社担任设计及建筑事宜。查敝社去秋南迁以前，曾议决在抗战期间，凡关于国防及国营建设工作，可予服务。贵校建筑事关学术前途，又属国家建设，应即从命担任设计及指导监工事宜。即希查照为荷。此覆 国立西南联合

^① 王建领主编：《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档案史料选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4页。

^②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③ 转引自李传玺、徐静：《西南联大校舍到底是谁设计的》，《中华读书报》2023年10月25日，第5版。

大学”。^①

6月17日,联大常委会第73次会议决议:“本校全部校舍建筑困难,应尽先建筑理学院全部及办公室与工学院之一部分机电两系校舍,并限于明年六月以前完工。”^②

在联大领导机构的一再推动下,7月1日,第76次常委会议决购置校址地基一百二十四亩四分五厘。7月12日,第79次会议决议,收买三分寺(即龙翔街今军区干休所)附近校址。在云南省政府及省教育厅的支持和协调下,昆明县政府派员会同联大建设长黄钰生一起,短短两三天时间,就四次勘察校址,“裁订桩界,清查业权亩积等”^③,制定了土地补偿标准、坟墓迁移费标准,并报请省政府同意。

就在紧锣密鼓筹备校舍建筑工作时,8月9日第84次会议上,联大常委会突然传达了7月28日中国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关于校舍建筑设计事项不能继续进行的来函内容:“敬启者:曩者贵校以昆明三分寺附近校舍建筑设计事项相囑,敝社愿为义务服役。顷奉敝社代理社长周寄梅先生自贵阳来函,坚决不以本社执行设计业务为然。敝社应即停止一切役务工作。致贵校建筑计划,亦不能继续进行。兹将亦完未完图样全数奉上,不胜歉憾!尚希见谅为荷。此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附图三十八张)”^④在传达完复信内容后,常委会决定接受中国营造学社终止建筑设计的意见。

从上信件可推知,中国营造学社此次为联大设计校舍,全属于义务性质,并未收取设计费。不管贵阳方面出于什么原因叫停了联大新校舍设计及建筑工程,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还是将已完成、及待完成的38张设计图全部奉送给联大,表明了自己尽最大力量支持联大校舍建设工作的原意。

尽管昆明工作站已表示全属义务帮忙,联大方面还是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很快,梅贻琦常委代表三常委,亲拟感谢函向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致意:“徽音、思成、士能^⑤先生道席:本校新校舍建筑设计事宜,承蒙悉予指导,悉心擘划,裨益甚多,良深感激。随函奉上酬金国币一千五百元,聊表微意,并申谢忱。即希晒纳赐教为荷!专此顺颂道绥”。^⑥酬金不多,但表达了由衷的感谢之忱。

至此,作为团体的营造学社退出了联大新校舍建筑设计工作。但在第84次常委会上同步定下来的,却是继续聘任梁思成、林徽因两位为建筑工程顾问,并由学校工程处各委员会处理本校建筑事宜。建筑设计工作的变更,实则饱含了难以为外人道的曲折。因此,梁思成于11月4日致在天津基泰建筑公司^⑦工作的老友、建筑师杨廷宝的信中说:“我们这一家子,与士能一家子……(1937年)十二月八日离长沙,在路上足足走了卅九天才到昆明。我们到昆明已将十个月了。工作不多。最初因西南联大叫我为校舍设计,还闹了不少是非。”^⑧

梁思成在信中说“闹了不少是非”,到底是什么是非,他并未明言。不过,西南联大工程处所撰的工作报告披露:“本校迁来昆明以后,即决定自行建筑校舍,预定经费为国币二十万元。在大

① 云南省档案馆档案。

②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会议记录卷),第58页。

③ 见《云南日报》1938年7月15日。

④ 云南省档案馆档案。

⑤ 士能,指刘敦桢。

⑥ 云南省档案馆档案。

⑦ 曾担任清华大学校舍设计工作。

⑧ 《梁思成致杨廷宝信》,《建筑史学刊》2023年第4期,第157—158页。

西门外浙江享堂购地百余亩，请梁思成先生设计绘图，包括各院系办公室、课室、实验室、图书馆、宿舍等。二十七年八月中旬，平土工程开始，同时进行招标事宜。开标结果，仅男生宿舍部分，即须国币十六万元。乃经常务委员会议决，此种正式房舍，暂缓进行。”至此，梁思成设计的正式校舍绘图因经费关系被迫搁置。

其间，就在平土工程开始前后，8月16日，施嘉炆请辞工程处主任，联大常委会除请其仍任委员，改由王明之任主任，增聘人员助理。为做好新校舍建筑用款支付工作，学校决定由会计室另立建筑专账，有关建筑工程用款支付事宜由工程处会同会计室、出纳组制定详细办法报常委会核定施行。

联大工程处的报告接着说：“是时本校下学期开学在即，蒙自文法学院亦须迁回昆明。此种房舍造价既高，又不能解决开学后员生住宿问题，因此决定改建临时房舍。此种临时房舍，于九月间开始建造，第一期工程，包括新校址西区36所临时房舍。全用土基墙木板草顶，于二十八年三月间完成。仅围墙及洋井平土等工程在继续进行中，自3月起，第一期工程开始。本期工程包括临时房舍50余所。图书馆、医院、食堂，以及其他房屋零星工程等。普通房屋均盖以铅铁皮，涂以绿色油漆。图书馆医院等则盖以瓦顶。九月间遭遇连日暴雨，一部分围墙倒塌。十月初开学在即，乃令工人日夜加工修缮，现各工程皆陆续完工应用，仅城墙内大防空洞二座工程，尚在积极进行中。”^①

工程处的报告是1940年1月4日撰写的，报告中说1938年9月即开始建造临时房舍，其实不然。根据西南联大档案，到了1938年12月6日，联大96次常委会才议决：“本校原定之校舍建筑计划及图样应暂时保留。先由工程处就本校目前需要，在本校所购校址内赶建临时校舍。”^②这在陈岱孙教授1992年8月27日所写的《西南联大校舍的沧桑》中也有印证，他回忆：“1938年秋末，校舍的草图已出。地狭，又限于经费，设计中的校舍只能是分建在横贯这块地的一条东西南的城北环城马路南北两侧的一套高两层、砖木结构的简单楼群。南区地较狭小，计划为理学院各系教室、实验室、办公室所在地。北区则计划为图书馆，饭厅，文、法两院各系和校总部各行政办公室，本区各学院的教室和男生宿舍的所在地（女生宿舍仍借用昆华中学南院）。但在校当局提出这一校舍设计草案征求意见时，有人提出强烈的批评意见，认为这一设计没有考虑到理科各实验室的规范和要求，主张重新设计。校当局不得不顺从‘民意’，将这一设计发还给原设计师，请其于征求有关理科各系意见后修改原设计。事实证明，这一周折造成设计工作几个月的延搁，使我们付出一个很高的代价。就在这年秋冬的几个月，昆明物价飞涨。到了将近年底，设计师向学校汇报，前此的原设计已远在学校原预算经费财务所及之外。”^③

原来，由梁思成按20万元预算标准设计的新校舍建筑设计，其实已进入正式实施阶段。然而，因为被认为不能满足理科实验需要，被打回修改，从而错过了最佳建设期。等修改方案完成后，物价已猛然上涨。开标结果，更为完善的新方案已无法上马。就这样，根据以上档案记载可知，原定的建筑规划和梁思成夫妇的建筑设计只能暂时搁置。工程处只好依据学校实际，按临时校舍标准及时调整和推动新校舍的建筑工程。

在本文完成之前，坊间广泛流传着梁思成先生将设计方案一改再改的故事，由上可见，其实

① 有关工程处内容均引自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2—183页。

②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会议记录卷），第76—77页。

③ 《陈岱孙遗稿和文稿拾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0—94页。

皆为臆造的情节。从联大工程处的报告可知,梁思成最早的设计方案,标准不是高了,而是低了。但就在完善设计的过程中,物价突然上涨,导致原来未达期望值的设计方案也已不能实施了。从上面情况看,梁思成在致杨廷宝的信中所说的“是非”,不外两点:一是已经进行大半的建筑设计工作,突然被周寄梅先生叫停,很为尴尬;二是担任建筑工程顾问后的设计方案又因物价上涨等原因而流产,实属无奈。

关于建筑设计事宜,陈岱孙教授所写文章还回忆,学校“拟议……委托前在天津基泰建筑公司工作的建筑师代为设计”^①,但基泰建筑公司在联大新校舍建筑设计事宜上的关联,目前尚未见到相应档案记载,而前引梁思成致基泰建筑公司建筑师杨廷宝的信,却可反证出该公司与联大新校舍的建筑没有交集。

三、新校舍建成与铁皮顶被售卖

此后,联大新校舍的建筑在物价一涨再涨的困难之下,进行得颇为艰难。

到1939年5月9日第108次会议召开时,校舍建筑费用因工料涨幅再次超出原预算很多。除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清华两处补助之建筑费外,不足之数只好谋求教育部拨给。在部款未到前,联大决定分别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及富滇新银行暂行借支。常委会决定,若部款不能照拨,则由本校经常费中调剂拨还;如仍无法偿还完,则由三校依照教育部所发经费比例摊还。

尔后,为了新校舍如期竣工,联大校方又曾追加工程预算。至1939年8月,这个几经波折的新校舍,在联大校方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付出了高昂的人力、物力之后,终于建成竣工,并于月底投入使用。新校舍分南北两区,共有50余所临时房舍。其中,文、法商学院设于其北区,理学院设于南区。联大中文系校友赵瑞蕙回忆:“除了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顶,而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茅草屋。”从此,“就在这片新校舍以及其他借来的房屋中,在如此简陋的校园里,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教学、读书、研究、实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开拓了一条空前的爱国、民主和科学,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道路,‘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②。从此,西南联大新校舍也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新校舍设有校门,门楣上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名^③,教室、图书馆、常委办公室、学生宿舍、盥洗室、学生自治会、制图室、各学系、校医院、各部(处、股、组、室)办公处、研究室、教员休息室、教职员合作社、金城银行、食堂、校卫队、浴室、洗衣房等一应俱全,是联大师生一生难忘的校本部所在地。

1940年,在著名作家林语堂主持的《宇宙风》杂志上,杨彤发表了《穷苦的大学生》一文,他这样描述联大新校舍的简陋情形:“新校舍从外面看简直和乡村房子一样,黄泥墙,涂上灰石灰。窗子是木条横七竖八拦成的,玻璃买不起,用着报纸或玻璃纸、牛皮纸,拿来粘在上面以蔽

① 《陈岱孙遗稿和文稿拾零》,第90—94页。

② 赵瑞蕙:《离乱弦歌忆旧游 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文学回忆录)》,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23页。

③ 校名的书写者,有陈立夫说、罗庸说等,但经笔者核对,既非陈字特征,亦无罗笔姿态。一位精于书法的学者认为系于右任先生手笔,经与于所书“国立河南大学”校名比对,确相似,但仍需严谨求证。笔者曾考证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笔迹出自蔡元培之手,近观蔡氏为燕京大学所写校名,亦与联大校名的字迹有相似之处,但尚难成定论。立此存考。

风。屋上铺的是茅草，只有几间课堂有被铁皮铺屋顶的幸运。至于内部，更不像话，地板是没有的，天花板更谈不上，四五十个人挤在这么一间屋子里。晚上，每四个人合用着一盏豆油灯。”^①从中透着多少惊叹，多少钦佩。

然而，已经困窘如斯的新校舍，其不少教室的铁皮顶最后也被迫易为茅草顶。1946年6月23日，正在美国加州大学进行学术访问的西南联大生物学系主任张景钺教授，致时任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海洋生态学家朱树屏教授的信中披露了这一情形。他说：“抗战后几年直到目前，国立学校经济之困窘实难令人想象得到。例如在联大后几年，信封、信纸停发，钺为公事写信也须自出文具，自出邮费。去年雨季屋漏，我桌上两处滴水，屋又小，桌子无处可移，只好用两个罐子接水，在一个较干的角上做事。当然学校补一间屋漏的钱还有，但问题是房子间间都漏，常委（即各校校长）办公室也是漏，若要整个补漏就要一大笔款，非费力筹措不可。若弟台去年到联大去，可以看见联大校方将屋顶上铅皮取下，换上草顶，原因是有一家电影院要铅皮，愿买学校的屋顶，学校卖去，换上草顶，可以得一笔钱，略为贴补。”^②

新校舍在建成六年后，联大不得已而将屋顶上的铅皮取下换上茅草顶。因为这时有一家电影院需要铅皮，学校正好卖了教室屋顶的铅皮，换上成本便宜得多的草顶，这样就置换出一笔经费，继续改善办学。其实，这是1945年春节前的事。

1945年3月3日，重庆《万象周刊》刊登了一个月前一则从昆明寄来的短讯，其以《学府之穷竟如斯耶！西南联大拍卖校舍》为题报道了联大在办学经费万分困难的状态下的不得已之举。这篇报道最早于同年2月1日以《昆明各大学经费困难 联大变卖铅皮换住草房》为题刊登于昆明《扫荡报》。报道称：“抗战以来，全国军民奋战，生活均极艰苦，其中尤以教育界坚守岗位，不顾艰苦而始终致力于百年树人之计，颇堪钦佩。乃近来物资续涨，而教育经费支绌，益感维持不易。此间国立云南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等，为维持教育数千学子，以及历年之巨额亏空，已不堪再以维持。联大为清偿历年所有之负债，将该校新校舍所有铅皮屋顶以二千万余元售于本市某某大公司，另易以茅草屋顶……”

报道中所述的买铅皮的某大公司，亦即张景钺在信中提到的某电影院。那么到底是哪家买走的铅皮屋顶呢？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在1945年2月7日的日记中详述道：“八时起。十时入校治事。明之来函，责问昨日学校扣留所售铅皮^③事。此事昨日下午大光明曾派人来问，余以不知，令其往询胡蒙子，未料其事严重至此。校中新校舍屋顶铝皮经明之与月涵商，定售予大光明六百三十张，每张定价六千八百元，立有合同，应于上月二十九日银货两清。已交二百五十万元，取四百张。本月二日来取余货，余以其货价未清，未允其取，并函大光明，请其按照合同议价，嗣由明之与月涵再商，准其立交余款，即行付货。昨日价款交清，货亦点交由大光明装车运出，临时乃为沈刚如所阻，不准运出。其时余已离校，全不知之。大光明乃向明之质问，要求赔偿，因其原建房屋屋顶已拆，急待改装铝皮，如不装，遇雨损失当在千万元。明之大不悦，函余并函月涵，月涵一函尤不客气。刚如本非直接负责之人，此种举动本属轻妄，而事后绝未以告余，以为阻止后即无事，尤属荒唐。今日月涵得信大急，急命将铝皮运走，而对昨日责任竟无所问，可谓大怪！蒙子云，康甫以未经手，大不高兴，怂恿为之。矛尘亦云，连日康甫与刚如数数谈议，昨日刚如先

① 杨彤：《穷苦的大学生》，《宇宙风》1940年第92期，第288—290页。

②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年，第196—198页。

③ 又称为“铁皮”和“铅皮”。

至康甫家，复返校阻止，阻后复至康甫家云。余甚望其仅因不高兴而已，切莫有其他企冀，否则学校名誉更不堪矣。”^①

原来，是被在昆明极具知名度的大光明电影院买走，货款两清时间约定为1945年1月29日。但所售金额并非报道中所说的两千余万元，而是428.4万元。电影院先以250万元取走400张，至2月2日，又来取剩下的铁皮，只因货款未清而未能取成。2月6日，电影院按要求交清欠款后欲运走，不料被联大常委会秘书沈刚如所阻。事情闹得极不愉快，于是，电影院责问联大工程处主任王明之。王又分别致函梅贻琦和郑天挺，表露了极大的不满情绪。最终，在梅贻琦的强势干预下，铁皮才被顺利运走。否则，如郑天挺所说，学校在昆明的名誉将不堪了。

张景钺写这封信时，西南联大已结业快两个月。这所大学在昆明，从颠沛流离中建盖极端简朴的校舍为艰难开端，又以变卖铁皮作更加穷酸的结束。

联大新校舍的铁皮顶教室里，布置着整整齐齐的“火腿椅”。这是一种木质的高腿椅子，椅之右侧带有扶手，以一前宽后窄的木板固定其上，以达到椅、凳、桌三用的功效，既有利于增加教室利用面积，还特别便于搬动，是西南联大因陋就简灵活办学的一个好办法。因其木板形似云南宣威火腿，故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火腿椅”。

这种火腿椅，曾被认为是西南联大的独创和发明。果真如此？实则不然。汪曾祺先生在其另一篇散文《七载云烟》中就说，这种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其“设计可能还是从美国传来的，我在爱荷华——耶鲁都看见过”^②。不知汪先生是何时在这两所大学见到这种椅子。在国内，笔者在上海中共二大会址、与西南联大邻近的云南大学会泽院等地也见过这种火腿椅（体积比西南联大的小一些），这当然是近年来的事。

追溯在联大开办前后，还有没有哪里使用过这种椅子呢？翻阅民国时期的旧期刊，笔者在1946年10月出版的《艺文画报》第4期找到一帧清心男中教室内景的照片，同学们端坐着的和教室进门左侧摆放着的，都是极为显眼的火腿椅；在另一本1929年6月出版的《教育与民众》杂志第1卷第2期，所刊登的中央大学“民众教育院学生上课情形”的照片里，火腿椅的身影也赫然纸上。

综上所述，火腿椅这一形制，在西南联大诞生前就已得到推广，联大时期也有其他学校在同时使用。由此可推知，或许是在西南联大成立后，组成联大的三校又将这一绝佳的创意从平津带到昆明；也或许是从云南大学将这桌椅两当的做法移植联大。故而，火腿椅由联大发明或独创的说法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不过，火腿椅这种形式，被经费拮据、条件艰窘的西南联大把它的实用价值开发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数千上万的西南联大莘莘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桌椅上异常勤奋地完成学业，成长为抗战建国、民族复兴的英才。

四、余话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芦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辉煌史一页，应教青史有遗篇。”^③。茅草顶的宿舍、

^①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94—995页。

^② 《又见红塔——“我与云南”散文集萃》，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年，第32—42页。

^③ 王力著、张谷编：《王力诗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8页。

铁皮顶的教室、瓦顶的图书馆与食堂、桌椅两用的火腿椅，在农舍群一样的新校舍，铸就了中国教育史上不朽的文化抗战篇章。

早在1944年12月，居华两年之久，刚刚返英的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教授，在演讲时即称“中国之科学家及技术工程人员，虽处于战时物质缺乏、设备简陋之环境下，然彼等竟能以大无畏之精神最勤劳之努力获致极光辉之成就”，并举例说：“昆明之西南联合大学与贵州之浙江大学及其他数大学学生之程度，堪与英国之剑桥、牛津，美国之哈佛、耶鲁等大学比美。”^①

因此，另一位来过联大访问并受邀作了学术演讲的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abcock Cressey）教授在其《中国高等教育考察报告（1943—1944）》里说：“尽管昆明的消费高于其他地方，但西南联大的教育水准和师资力量之高，也让学生更愿意来到这里。”^②

其实早在1931年，梅贻琦先生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这样演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③西南联大在这样简陋的新校舍和充满流难辛酸的租借校舍里，以其名师云集和英才辈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有力地为国家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教力量、学术力量和人才力量，对大楼与大师说进行了最好的诠释。

1946年5月4日结业典礼后，西南联大“一分为四”^④。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员回平津各自的校址，另以联大师范学院整建制留滇成立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即今之云南师范大学）。自此，联大新校舍由昆明师范学院整体继承，开启了办学育人、建设边疆的新篇章。

如今，经过岁月洗礼，联大新校舍只保留下来一间原教室，以及1946年建成的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西南联大纪念碑和梅贻琦题写校名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柱。以这间简陋的教室和火腿椅等历史遗迹为中心，每年都有数十万计的参观者前来瞻仰学习“西南联大教育救国”和“闻一多舍生取义”的爱国故事，不断荡涤精神与灵魂，汲取爱国奋进的力量。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龙美光：《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24年，后记。

② 龙美光：《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后记。

③ 梅贻琦：《就职演说》，《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11页。

④ 云南省政府参事叶燎原教授与笔者等一席之谈话。

文化抗战中的学府风貌

——读《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

马绍玺

摘要：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是一所值得从不同文献去认识和研究的著名大学。《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是首部以书信录的方式展现西南联大故事和西南联大精神的书籍，为读者呈现了西南联大绵密、温情、生动的历史，是一本特色鲜明，雅俗共赏，值得认真阅读和研究的好书。通过这些穿越历史的书简，可以更好地领悟联大人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命运的爱国精神，探索知识和真理、严谨治学、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或庄严肃穆，或潇洒从容、正直坦荡的个性风范。阅读《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可以更深入地感知西南联大的人和事，净化我们的灵魂，获得向上的力量，从而转化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西南联大；书信；《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文化抗战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5) 01-0086-05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战争的破坏与毁灭无所不及，“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8 月，奉教育部命令，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于同年 11 月 1 日开学上课。一学期后，因战事逼迫，学校于 1938 年 2 月复迁云南昆明。4 月 2 日，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联大”），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 5 个学院。抗战胜利后，1946 年 5 月 4 日，西南联大完成使命，光荣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开始复员北返。8 月 1 日，由联大留昆的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成立“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西南联大共存在 8 年 11 个月，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是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乃至世界教育的奇迹，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关于西南联大的一切依然是人们不断言说的佳话，热度长盛不衰。由龙美光撰写的《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团结出版社 2024 年 4 月出版），是首部以书信录的方式展现西南联大故事和西南联大精神的书籍，为读者呈现了西南联大绵密、温情、生动的历史；是一本特色鲜明，雅俗共赏，值得认真阅读和研究的好书。

该书分上下两册，合计六十余万字。书名中的“靛花巷”原是抗战时期深藏在昆明翠湖边青云街的一条只有两三人家的陋巷。但是，诚如 1941 年曾在这里旅居的老舍先生称赞的那样，“巷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南联大学者演讲文献整理与研究”（23BZW128）。

作者简介：马绍玺，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致力于中国现代诗歌、西南联大与抗战文学研究。

名的雅美，令人欲忘其陋”。“靛花巷三号”则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驻地和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集体宿舍所在地，是西南联大人与外界广泛接触的重要活动中心。傅斯年、郑天挺、陈寅恪、赵元任、董作宾、向达、汤用彤、罗常培、姚从吾、闻家骅等众多名家巨匠曾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何陋之有”。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三号”曾是西南联大这所流亡大学诸多教授私信、公函来往的地址，也是他们内心温暖的情感码头。该书以“靛花巷三号”这一极具历史特质和文艺气质的代表性地名作为书名，不仅完美匹配了校舍简陋、物质匮乏而精神卓越的西南联大之精神气质，更呈现了因抗战而流亡的联大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情感所向。

该书从海内外出版的数百种图书、杂志、报纸，以及大量档案、私人藏品中，精选出闻一多、朱自清、蒋梦麟、梅贻琦、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陈梦家、沈从文、曾昭抡等一大批名家、联大学生以及社会人士所写的与联大有关的书简200多封进行释读。信的内容，“既有家国要事，也有鸡毛蒜皮和柴米油盐；既有《诗经》《楚辞》，亦有下里巴人；既有抗战救亡，还有儿女情长；既有教学日常，更有诗和远方……”诚如作者所说，对于这些信件，他的任务“并不止步于发现它们，而是在百年无废字的珍爱中，站在读者的角度，用新闻的眼光看历史文献，用历史的眼光衡量对这些书信的书写”。全书将这200多封书简按联大的历史实情，归类于西迁昆明、家信祈盼、以身殉学、警报日常、居无定所、选课转系、学术休假等82个主题分别释读，串联起联大八年间光辉灿烂的文化抗战年华。于是，抗战大时代里西南联大精英们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所憎所爱，真意满满的家国情、人间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知识分子群像等诸多联大日常都得到了充分展示。全书从不同维度呈现了西南联大丰富多彩、厚重刚毅、气质坚卓的抗战学府风景，展现了联大师生浓厚的家国情怀、热烈的学术追求以及苦中作乐的豁达精神，是一部书信中的西南联大办学史、学术史、生活史、心灵史和抗战史。阅读中，不仅可以品味历史细节和大历史中个人的私家情感，更可以感悟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和中国知识分子神圣的文化抗战使命以及高洁笃定的精神操守。为增加可读性，全书还随文配发了西南联大时期的一批珍贵照片，其中不少是首次发表，做到了书信与史料的生动互补。

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我以为，在相当多的方面已经有思维定式的情况出现。但是，《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就像一个功能强大的新的导航系统，引导我们走不一样的道路，欣赏不一样的风景，最终让我们在新的阅读中实现对西南联大的新的认识。比如，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强调“刚毅坚卓”的品质和向度上展开。这样的研究当然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常常想，联大这些著名学者们在“刚毅坚卓”的面相背后，是否也有柔软的一面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们也是人。比如我们最熟悉的闻一多，除了作为学者、民主斗士的一面，他也有温润甚至是软弱的一面。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闻一多的意思，相反，这恰恰使得闻一多的形象在读者心目中更加丰富和完整。因为，这才是他的诗人的底色。在《洗袜子是会的，补却不会——闻一多致高孝贞》的一组书信里，我们就看到了因收不到家信而无助、脆弱的闻一多。他在给妻子的诸多信中这样写道：“出门快一星期了，尚未接家信，这是什么道理？”“我到此从未接到一信。这未免太残忍了吗？”“我现在哀求你速来一信，请你可怜我的心并非铁打的。”“你常常写信来，我就快乐！”这些情真意切的信中私语，或恳请，或哀求，或表达情感的无助，或强调收信后内心的富足，都是闻一多心灵深处诗人品质的闪现，句句牵动读者的心。

在一些人的观念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是“何妨一下楼先生”，都忙着读书、教书、做研究。然而，通过阅读这些珍贵的书信，我们知道教书、学术之余，他们也打牌，也下棋，也为了生活精打细算自己的工资，也在诸多事情上有徘徊和犹豫。这些都是书信这种独特的文体为我们

珍藏的抗战时期中国学者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我们要感谢本书著者龙美光的学术眼光，他没有忽略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书信，从而为我们呈现了更加丰富、亲切的西南联大和西南联大学人。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最高学府，师生之间的学林生活是其中最精彩的内容之一，这些书信为我们留存了许多这类珍贵的文献。比如，1941年5月16日，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学生林抡元给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教授写信，全信如下：

查训导长钧鉴：

蒙陈序经先生之介，拟于本月十八日（星期日）清晨六时半趋师院贵寓求教。

届时如钧座有空，恳稍留玉步，俾得领教，不胜感激！专此即请

钧安

学生 林抡元 谨上

五月十六日

信虽短，但极具特色。学生如饥似渴，有专门知识必须请教查良钊教授，但是担心求师不遇，特请陈序经教授介绍，专门去信一封，既是表达虔诚和尊重，更是恳请老师百忙中如有可能，给自己留下求教时间。查良钊早年毕业于南开中学，留美归国后于1938年应邀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次年出任联大训导长。他以训教合一为原则，实行自治、启发与同情相结合的训导方法，深得学生拥戴，并因为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被学生亲切称为“查菩萨”。“他住在师院一间小屋里，一张木板床铺着白白的被单子，书桌上零散着公事纸张，和线装及洋装的书籍，一架大理石的小屏，很优雅的。但他本人在这屋子的时间却只有晚上回来休息。从清晨六点钟后，你再找他，是不容易见到的！他的时间就是为着青年们去奔波。”林抡元深知训导长几年如一日，清晨就外出为学生奔波服务的习惯，因此，即使是星期天，也提前去信预约，恳请老师“稍留玉步”，以遂登门求教之愿。从这封短信里，我们就真切感受了西南联大让人感佩的教学和学风。

联大读书风热烈，也许是今日大多数学生无法想象的。1939年9月，21岁的广东新会籍学生伍廷法自澳门培正中学考入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学号：联1516）。经历两个月的联大生活后，11月10日他写信给母校图书馆主任萧维元、校刊主编关存英两位恩师，报告在联大的所见所闻，鼓励学弟学妹毕业后也报考西南联大。他在信中这样描述联大学生的读书生活：

联大读书风气甚浓厚，不读书便不能及格及升级，绝对不能存侥幸作弊来帮补自己成绩，在考试时监考教授之严，改考试卷时之认真，若发觉有一点雷同，在该科成绩定加上一个零字矣。联大读书情形是值得报告，成绩严，而且外省学生多，每一联大学生，皆不能不勤力，尤以外省为甚，晨早四五时起床，晚上非十二时不睡，日间一有空，便用以读书及自修，有不少学生能将整部英文字典读熟，每字之用法、意义无不熟识……晚上图书馆尚未启放之前，已有数百人正等待，挤拥情形，确是不少见，争座位，夺参考书，往往因此发生争端，故来慢一步，真是额满见遗。在联大，图书馆日夜生意甚兴隆，滔滔不绝，名符其实，晚上甚少见人在房内自修，无论如何是往图书馆来自修。至于联大图书阅览室共有五所，（师范学院有两所）而学生人多，书籍颇少，尤以参考书更形缺乏，因此图书是不能借出，只能在室内凭学生证取阅。

伍廷法用“挤”“拥”“争”“夺”这些唯恐落后的动词来描述联大学生的读书情景，传神至极。1940年冬天，一位化名为“谷”的同学给他在新加坡的华侨朋友写信时，更是用“战斗生活”一词字来概括他在联大的生活情景。他跟朋友写道，“我在这儿的生活，可说是抢夺的生活”，早晨起床抢热水洗脸，上课抢座位听讲，到饭点去食堂抢饭，上图书馆抢教师指定的参考

书，“夜深时，由图书馆踱回宿舍，这才是一天战斗生活结束的时候。安静地向床上躺下吧！快去补充健壮的精神来应对明天那战斗的生活”。这样的学风又岂是如饥似渴这样的词语能概括得了的？

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特色鲜明、品质超群、令人敬佩和仰慕的卓越大学，它的办学条件非常简陋，师生们衣衫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每日在物价的疯涨和日军的频繁空袭中度日，物质生活极度艰涩，但是这一切并不能限制他们思想的开放和精神的豁达，反而锤炼出他们刚毅坚卓的爱国心，他们亲手写就的一封封书信里真切地保存着他们文化抗战的真音、真情、真爱、真思。1938年9月28日起，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昆明，西南联大也是轰炸的目标之一。自此，跑警报就成了联大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联大人并不被轰炸吓倒，反而在跑警报中寻得益处，每日乐此不疲。1941年1月13日，著名教授刘文典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这样叙事跑警报的好处：“所堪告慰于老友者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弟常说‘敌机空袭颇有益于昆明人之健康’，并非故作豪语，真是实在情形。”与刘文典的心理相同，曾是联大学生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在《跑警报》一文中更是用“不在乎”来概括联大人对日本军空袭的无畏与豁达。他说：“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不为逆境所困，把黑暗守成光明，正是联大重要的品质。

学生从军抗战是西南联大众多佳话之一，他们这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豪情志气，至今激励着今天的青年学生。1944年11月15日，联大法商学院法律系一位名叫金若刚的学生写信给《国讯》期刊，表达他急切想从军抗战的激情和大学生从军的优势。他在信中说，听到大学生可以征调从军的消息，异常兴奋。他写道：“战争时间的延长会使一般人的心理变态，我看了以往中国的历史，觉得现在社会的确循着以往的历史走，若不趁这个机会来一种新的刺激，恐怕人会麻木，所以我们都希望在这机会能走向从军。”信中，他表达了联大学生的从军信念和从军的优势与决心：“我们决不承认战争会失败，但我们相信如能征调学生一定能使战争期间缩短；我们不敢自傲一个人能抵得上现在作战的士兵几个，但我们认为我们接受机械化或斗智方面的能力一定比他们高；……任何人都有为国作战的义务，任何人都有为国牺牲的责任，我们决不会留恋……”不仅男生如此，联大的女生也踊跃报名参军。但是联大校方从大局上考虑，许多女生的报名都不予同意。为此，一位女生还写信给梅贻琦校长，表达自己的不理解和不满意：“值此国难时期，学生亦应尽一点责任，但为什么不征收女生？同样受国家栽培，同样受知识，男生能作者，我们一定能。”这是多么珍贵的爱国文献呀！缪弘是联大1943级外文系的学生，在校读书时，他曾多次输血支援抗敌将士。在第五次输血后，他慷慨写下《血的灌溉》一诗，非常真切地表达了他以及联大学生愿为国赴死的爱国雄心：“没有足够的粮食，/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也该让我们的血，/来注入你们的身体；/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缪弘以1944年从军救国，1945年7月3日在反攻桂林的战役中光荣殉国，他像一颗灿烂的星辰，与联大为抗战献出生命的年轻星辰一起，永远亮在联大的夜空中。

教育救国、学术报国是联大教授们一致的爱国行动，书信中有他们很好的自述。1938年10月30日，陈梦家写信向老师胡适汇报联大西迁的经过和自己的古文字研究心得。他说：“这五年以来，我埋首于甲骨、钟鼎和古籍之中……这五年的苦读，救疗了我从前的空疏不学。我从研究古

代文化，深深地树立了我长久从事于学术的决心和兴趣；亦因了解古代而了解我们的祖先，使我有信心虽在国家危急万状之时，不悲观、不动摇，在别人叹气空想之中，切切实实从事于学问。”——这就是文化自信，在学术研究中坚定了虽陷国难，国家危急万状，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乐观与自信！

联大教授从来不轻视手中的学术，他们深知，抗战不只是前线阵地军事的比拼，更是两国文化的全面较量。1940年5月22日，清华大学金希武、华罗庚、陈省身、赵九章等49名教授联名致函梅贻琦校长，恳请校方在万般艰难条件下恢复因战争中断的海外学术休假制度。信函里教授们态度殷切，一切恳请皆从学术救国的大义出发。他们写道，海外学术休假，乃“垂远之定制，期品质之提高，促学术上已有成就之人才更要求精诣，此于我国学术之独立，我校事业之发展关系极大，无俟同人等之缕述。同人等见暴敌我军事与文化侵略双管齐下，目睹心惊，深知学术之竞争，不让于戎马之驰突”。教授们虽然身在学府，但情感所系处处都是家国大事。

西南联大办学过程中物质的匮乏是出了名的，但是联大人在艰难困苦中育养的熠熠精神更是卓绝非凡。用幽默大师林语堂在联大演讲时的话来说，就是西南联大“在物质上不得了，在精神上得了不得”。通货膨胀是联大师生必须面对的难题。到1940年，联大教授的平均薪金只有法币300元，只合战前42.9元的水平，收入实际只有战前七分之一的水平。但是，昆明的米价已经超过百元一石，即使是大教授陈寅恪也不得不在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联合大学师生皆困苦不堪”。教授感受如此，一般教职员生活之苦就更甚了。1941年，听说学校有对低薪教职员津贴适当提高的讨论，1月21日，22名低薪教师致信联大常委会，感谢学校的体恤之情，他们在表达期望“凡薪金在二百元以下者，每月生活津贴增至五十元”的区区请求的同时，更多表达的是愿与学校同舟共济、共赴国难的信念和决心。信中写道：“同人等月入些微之数，衣食难备，家室遑论，生活之苦不待详述。惟念国步艰难，财政不裕，但得多吃一日苦、多做一日事，亦即略尽书生报国之微意。是以各就本位，龟勉从事，不愿历历诉苦。”言语朴实，没有夸张与矫情，但句句拨人心弦，催人泪下。“但得多吃一日苦、多做一日事，亦即略尽书生报国之微意”的圣洁之心，更是把联大人文化抗战的精神、思想和人格光辉具体、通俗地表达了出来。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时，充分肯定了联大结茅立舍，弦歌不辍，赓续中华文化血脉，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历史与精神，并说联大的历史“深刻启示我们，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联大师生人格至伟，智慧至深，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命运的爱国精神，探索知识和真理、严谨治学、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或庄严肃穆，或潇洒从容、正直坦荡的个性风范，显示了中国人美好的人生气象。阅读、感知他们，能净化我们的灵魂，获得向上的力量，从而转化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精神力量。愿更多的读者来阅读这本厚重的《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感知联大人和联大精神，并将所得化用到生活工作中去。

责任编辑：念兴昌

以文化润疆为核心的高校红色校史档案 育人路径探赜

鲁昆洪

摘要：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高校是推进文化润疆的具体实践场域。作为学校记忆的重要组成，红色校史档案以其翔实的记录、丰盈的内容和承载的意义，之于文化育人优势极为突出。利用红色校史档案赋能大学生成长成才，是新时代新疆高校立德树人的应然需求。基于教育学视角，从目标、内容、方式、场域等角度，阐明文化润疆与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之间的内在机理，提出大学生红色校史档案“知—情—意—行”四维度的主体建构过程，实现档案育人从静态的价值功能转向动态的作用机制，意在突破高校档案育人的局囿而注入新动能，找寻档案驱动文化润疆的高校实践增长点。

关键词：红色校史档案；文化润疆；档案育人；新疆高校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5) 01-0091-09

一、引言

档案与教育是密切联系的，宣传教育是档案工作的重要功能之一。红色校史档案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服从革命、建设和改革需要的各类学校办学历史的真实记录。^①作为文化润疆独特的精神标识，红色校史档案之于育人话题，不断地被注入新的元素，并迸发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活力。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强化校训校歌校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②2020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鼓励档案馆开发利用馆藏档案……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③新疆在自治区“十四五”规划中亦提出“深入挖掘红色档案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充分发挥档案在理想信念教

基金项目：2024年度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以教育家精神引领地方高校教风高质效建设研究”(BC24024)；云南民族大学审核评估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民族院校一流本科质量文化建设的价值探源与达成路径研究”(SHPG2023Z03)。

作者简介：鲁昆洪，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

① 章华明、张燕：《面向“大思政课”育人改革的红色档案叙事转向——以校史资源为例》，《档案学通讯》2023年第4期，第14—21页。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3日，第6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人民日报》2020年7月16日，第16版。

育中的重要作用”。^① 202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强调“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各类主题活动”^②，“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被列入2024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③

作为党和国家倡导的一项工作，本论题亦引起学界关注。有学者指出，“校史档案不但肩负着建档存史的使命，还承担着育人的重要功能”^④，可以从“管理机制、育人形式和技术支持等路径入手”^⑤，充分利用“红色校史档案的叙事转化，推动大思政课中红色基因的传承”^⑥。此外，红色校史档案除了在校内发挥作用，可凭借“档案征集、校史研究、平台建设等走出校园，辐射社会”。^⑦就新疆高校而言，有学者提出要充分“发挥新疆红色资源的育人优势，构筑新疆大学生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⑧特别是“以校园文化为载体，积极开展国家认同教育”。^⑨还要发挥档案资源“在文化润疆中的资政参考作用”^⑩。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对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育人机理着力不多，且较少借以观照文化润疆。鉴于此，笔者以文化润疆为逻辑起点，系统考察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育人价值与深化路径，力求为拓展档案育人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化润疆与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之间的内在机理

纵观“文化润疆”这一概念，具有深邃的内涵和多重的维度。仅从字面上进行拆分理解，不论是“文化”还是“润”以及“疆”，这些词语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均可被赋予不同的解读方式。^⑪而文化润疆与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两者有内在契合性和同构性。下面，基于教育学的视角，从文化润疆的目标、内容、方式、场域等维度，阐明文化润疆与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之间的内在机理，揭示以文化润疆为核心的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面临的“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和“怎么做”的一系列问题。

（一）目标引领：紧扣长治久安的工作大局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2020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文化润疆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被鲜明提出。2022年7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疆的首站就走进了新疆大学校史馆，了解新大历史沿革和人才培养情况，他指出“要以增强认同为目标，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党员之友（新疆）》2020年第12期，第6—7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5日，第5版。

③ 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24年2月20日，第1版。

④ 沈洋、谷松岭等：《挖掘校史档案思政元素 发挥档案育人重要功能》，《中国档案》2022年第2期，第58—59页。

⑤ 王晓谦、孔炜义：《高校校史档案的育人功能及其实现路径》，《档案管理》2022年第1期，第73—74页。

⑥ 章华明、张燕：《面向“大思政课”育人改革的红色档案叙事转向——以校史资源为例》，《档案学通讯》2023年第4期，第14—21页。

⑦ 王凝莹：《论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开发宣传——以苏州大学档案馆为例》，《档案与建设》2023年第3期，第69—71页。

⑧ 孙秀玲：《新疆红色资源在高校文化育人中的价值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56—62页。

⑨ 王连旗、高汝东：《新时代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第185—189页。

⑩ 黄娜：《文化润疆战略背景下的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探究》，《兰台内外》2021年第24期，第4—6页。

⑪ 李红兵：《文化润疆：基本概念与研究框架》，《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124—132页。

深入开展文化润疆”^①。文化润疆与新疆工作总目标一脉相承，成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的治本之举。档案作为最权威、最直接的历史原始记录，蕴含天然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档案工作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职责使命，在文化润疆中起着强本固基的基础性作用。文化润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治引领、经济助力和文化支撑，当三个实践主体共同朝着同一个目标行动的话，往往会达到“1+1+1>3”的叠加效应。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离不开政治、经济的硬实力，同样也少不了文化、教育的软实力。新疆高校要始终围绕党中央的中心任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新疆长治久安的战略需求，坚持用红色校史档案立德树人、铸魂育人，“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突出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资源在建构高校文化记忆，用档案讲好治疆稳疆建疆故事的战略价值，这才是文化润疆的终极目标。

（二）文化导向：凝聚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

文化润疆是一个开放的持续建构过程，它以文化的隐性力量来夯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之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之策。^②从人文角度看，档案通常具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档案是物质性的信息记录载体；另一方面，档案建构过程中包含着文化与意义的复杂交织。^③现代中国的高等学府，因发轫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扎根中国大地而带有强烈的国家性、民族性和文化性表征。^④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对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⑤红色校史档案作为高校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文化产物。据此可知，高校红色校史档案是凝聚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也是提高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新疆高校依托红色校史档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内化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共同旨趣，使个体获得群体的“我们”感，进而增进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成为文化润疆倡导之下高校档案育人工作的重要之举。

（三）方法明晰：采取润物无声的育人手段

文化润疆之“润”乃滋润、浸润，“润”是方法，也是手段，在于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并非一日冰冻、填鸭漫灌。“润”的是新疆各族大学生爱国之心，“润”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之心，“润”的是增强新疆大学生的“五个认同”的传承之心，“润”的是各族大学生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心。^⑥依据皮尔斯符号学的观点^⑦，红色校史档案的育人过程，就是对符号解码和传播的过程。这里所指的符号，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五观”精髓以“编码”方式“内嵌”于红色校史档案之中，同时符号本身也被赋予了深刻的含义。依托档案丰富的表现形式保证档案符号“受众”的广泛性，并以参与性强和易于接受的特点在大学生中实现“解码”，使校史

① 杨明方、李亚楠、阿尔达克等：《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人民日报》2022年7月17日，第1版。

② 徐安玉、陶文飞：《文化润疆：理论逻辑、现实意蕴与实践路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41—48页。

③ 白语嫣：《作为“档案”的博物馆》，《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第9期，第39—51页。

④ 鲁昆洪、毛菊：《面向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校史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档案学研究》2023年第6期，第119—127页。

⑤ 加小双、徐拥军：《档案与身份认同：背景、内容与影响》，《档案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6—21页。

⑥ 黄中民：《“文化润疆”背景下高校语文课程思政融入路径研究》，《语言与翻译》2021年第3期，第71—75页。

⑦ 季海宏：《皮尔斯符号学和国内外研究现状》，《俄罗斯文艺》2014年第2期，第85—90页。

档案符号尽可能兼顾所有大学生群体，使其成功解码、产生共鸣并内化于心。质言之，文化润疆就是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通过红色校史档案编译和阐释，让新疆高校大学生接受红色校史档案文化的浓厚积淀、思想内蕴。以春风化雨般“润”的方式，铸牢新疆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树立起爱国爱疆的自觉意识，达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

（四）场域凸显：立足学生主体的档案利用

红色校史档案是高校育人实践的一个重要变量，用好档案文化资源，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空间是“记忆的介质”，作为一个特定的“记忆场”，大学空间把办学历史、文化样态和生活图景容纳其中。高校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国家和地方的叙述，强化其认同，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嵌于世界的场所”^①。高校以独特的办学理念、历史脉络、人物风貌、校风学风等基本元素构成的“大学精神”是一种内隐式精神体系，发挥着凝聚人心、成风化人的作用。新疆各高校的大学生是推进文化润疆的主力军，是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践行者，是新疆的未来和希望。将红色校史档案融入高校教育教学的始终，从而实现“一草一木会说话，一墙一壁皆育人”的效果，最终达到文化润疆的目的。在此背景下，有序推进高校档案文化建设工作，将分散化、碎片化的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资源进行关联整合，建构高校档案文化资源体系，提升文化润疆服务育人的效能。

三、以文化润疆为核心的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的价值表征

国家在新疆布局的数十所高校，扎根天山南北，创业戈壁荒原，远者已逾百年，近者已近半个世纪。新疆高校的校史档案是师生们置身大学时空场域，体悟大学理念，浸润大学精神，承载下来的深厚历史积淀。较之于高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静置的校园记忆，新疆高校的校史档案完整记载了党领导新疆建设改革实践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新时代新疆高等教育发展变迁中最富生机活力的时代脉动。新疆高校红色校史档案既呈现了一校“小历史”的内容逻辑，也包裹着“国之大者”的象征性符号，散发着活态的教育能量（见表 1）。

表 1 新疆部分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现状举例

高校名称	建校时间	档案馆、校史馆设置情况	重要校史人物	红色主题	办学特色	档案编研成果
新疆大学	1924 年	设档案馆；设校史馆（为自治区社科普及基地）	俞秀松 林基路 杜重远	抗大第二	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	话剧《我们正青春年少》《共产党人在新疆》《新疆大学校史》《大事记》
石河子大学	1949 年	设档案馆；设校史陈列馆	王震 潘世征 张仲瀚	兵团精神	用兵团精神，育新时代戍边人	《石河子大学校史》
新疆农业大学	1952 年	设档案馆；设校史馆（含线上校史馆，为自治区社科普及基地）	王震 涂治 杨捷 王桂五	胡杨精神	屯垦戍边办大学、稳疆兴疆育人人才	话剧《大地之子》《新疆农业大学史（1952—2002）》《新疆农业大学史（2003—2012）》
新疆医科大学	1954 年	设档案馆；设校史馆	邵达	新医精神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新疆医科大学校史》

^① 鲁昆洪、毛莉：《面向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校史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档案学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119—127 页。

表 1 (续)

高校名称	建校时间	档案馆、校史馆设置情况	重要校史人物	红色主题	办学特色	档案编研成果
新疆师范大学	1978 年	设档案馆；设校史馆	黄文弼	家国情怀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新疆师范大学校史（1978—1998）》，话剧《红流》
塔里木大学	1958 年	设档案馆；设校史馆（含线上校史馆）	王 震	胡杨精神 沙漠学府	用胡杨精神育人、为兴疆固边服务	《塔里木大学校史（1958—2018）》《塔里木大学老照片（1958—1976）》《塔里木大学大事记（1958—2018）》
喀什大学	1962 年	设档案馆（与图书馆合署）；设校史馆	阿不都热衣木·艾孜佐夫	胡杨精神	立足南疆、扎根边疆、面向全疆、辐射中亚	《喀什师范学院校史（1962—1992）》《喀什大学发展史（2012—2022 年）》
伊犁师范大学	1948 年	设档案馆（与校办合署）；设校史馆	艾尼瓦尔·汗巴巴	品正学实	用胡杨精神育人、为兴疆固边服务	《伊犁师范大学校史》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研整理，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5 月。

（一）认知优化：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明理基础

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时指出，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① 回望新疆高校的历史，无疑都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场景中起步的。自 1924 年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新疆大学前身）创立肇始，拉开了新疆百年高等教育史的序幕。与共和国同龄的石河子大学，诞生于解放大军进军新疆途中。新疆农业大学的前身八一农学院，由王震将军于 1952 年创建。作为国家“一五”计划重点项目，新疆医科大学由新疆医学院易名而来。此后的 1958 年，为适应国家屯垦戍边事业需要，在王震将军的倡导下，在戈壁大漠创建塔里木大学。1978 年底，新疆师范大学于改革春潮中萌发，打开了新疆教师教育新局面。迄今为止，全疆共有公办本科院校 17 所，这些高校始终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保持同向同行，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先进知识分子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边疆稳定的坚定信念。“爱国底色”“红色基因”“党亲手创办”“哪里需要建哪里”等内容如同一页一页的书，记载于校史档案不同的篇章之中。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复杂，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愈加激烈，尤其对新疆高校大学生的红色信仰造成冲击。作为意义叠加的新疆高校红色校史档案，本质上带有强烈的国家性、民族性和文化性表征。着眼于这些资源的活化利用，不断唤醒和强化如“大漠胡杨”一样顽强生存、奋发向上的红色记忆，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认知，形成价值认同基础上的自觉接纳。

（二）情感激励：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感官体验

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历史就是大家都同意的故事”。^② 红色校史档案是在大学这个特殊地域形成的，指涉稳定的思想规范与行为导向功能。记忆将“已逝”的过去与“活着”的现在联系起来，记忆“不仅是为了‘对抗遗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③ 记忆和红色校史档

①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第 2 页。

② 吕思勉：《吕思勉史学四种》，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4 页。

③ 扬·阿斯曼、王霄兵：《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第 88—90 页。

案紧密相连,一方面,红色校史档案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可以对记忆进行干预和影响,从而影响其认同;另一方面,根植于红色校史档案中的价值意蕴,亦可以悄无声息地影响大学生的现实生活。红色校史档案既包含校史资料、手稿、信件、人物传记、图片、音像、文物、雕塑等有形的符号系统,也涵盖一所高校所沉淀的广大师生所共享的历史文化、大学精神、校风学风等隐形的价值理念。这些弥足珍贵的红色校史档案以固化的记忆张力,成为当代大学生触摸历史脉动的重要情感纽带。如今的新疆大学校园内有一条“俞秀松路”,路的尽头便是校史馆。在这个质朴敦实的黄色二层楼里,一页页档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了俞秀松等共产党人把新大培养成各族进步青年摇篮的生动故事。俞秀松“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人”铿锵有力的宣言,与新生代新大人既息息相通又一脉相连,在俞秀松路上续写新大故事成为“抗大第二”的代际传承。

(三) 信念固化: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品质凝练

档案之于精神宛若三棱镜之于光,反映着光又分解了光的形态。红色校史档案与校风、校训、校歌等大学精神元素相互交融,可以提高红色校史档案的感召力和创造力。如新疆大学校史馆浮雕墙上篆刻着《我们正青春年少》的校歌,歌词源于时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共产党人林基路的诗作,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疆大学校史馆时曾在此长时间驻足。歌词中澎湃激昂的旋律,“争当抗战教育的模范,锻炼建设新新疆的骨干”,无一不流露出镌刻于新大人血脉中的家国情怀。听诊器是医生的标配,新疆医科大学档案馆收藏着一件听诊器,它的主人是该校创始人之一、首任副院长邵达。1954年9月,邵达奉命从西北军区卫生部调至新疆负责筹建新疆医科大学,而随身携带的听诊器,是邵达在延安时期配发并一直使用的,曾多次为中央首长看过病。一件看似普通的小小听诊器,却承载了新医人献身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大气魄。基于此,红色校史档案与大学精神一经相遇,大学精神的内涵就能得到充分释放,不仅可以使传统的德育观在档案育人的内驱力下实现由“灌输式”向“内生式”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校史档案教育在高等教育的广阔舞台上实现载体的拓宽,以一滴水见太阳,折射出“静悄悄的革命”。

(四) 行为生成: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使命担当

文化记忆与红色校史档案教育都是对“过去”的意义的指涉,都是对“过去”文化的传达继承。文化记忆是从记忆的角度来完成文化的传承,红色校史档案教育是从教育的角度上来完成文化的传承。^①当前各种社会思潮交锋于校园,大学生受到多元文化影响日趋明显。红色校史档案业已形成的内隐价值,不同于具有强制性的规章制度和约束性的校纪校规,具有润物无声的规训功效。于新疆高校而言,红色校史档案育人关涉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由于新疆地缘环境复杂,受民族宗教、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三股势力”常利用这些因素,把对新疆大学生学校教育的影响和渗透作为重点。红色校史档案是“国之大者”象征性符号在高校的重要实证,这种符号既镌刻在大学精神里,也呈现在一件件实体档案中。高校革命先烈、学术大师、时代楷模等典型人物,或国家战略、大国重器和专业典范等鲜活案例,同样适用于档案教育叙事。恰如新疆各高校的校徽总体元素皆为“同心圆”一样,寓意各族师生团结和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每逢国庆,大学生们用悠扬的“木卡姆”、悦耳的“库布孜”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正是新疆大学生爱国情感的仪式化表达。概言之,通过红色校史档案达成的文化润疆,找到了新疆各族学子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了各族学子大团结的最大同心圆。

^① 李立宏:《文化记忆理论在高校红色文化教育中的有效运用》,硕士学位论文,西华大学,2021年,第20—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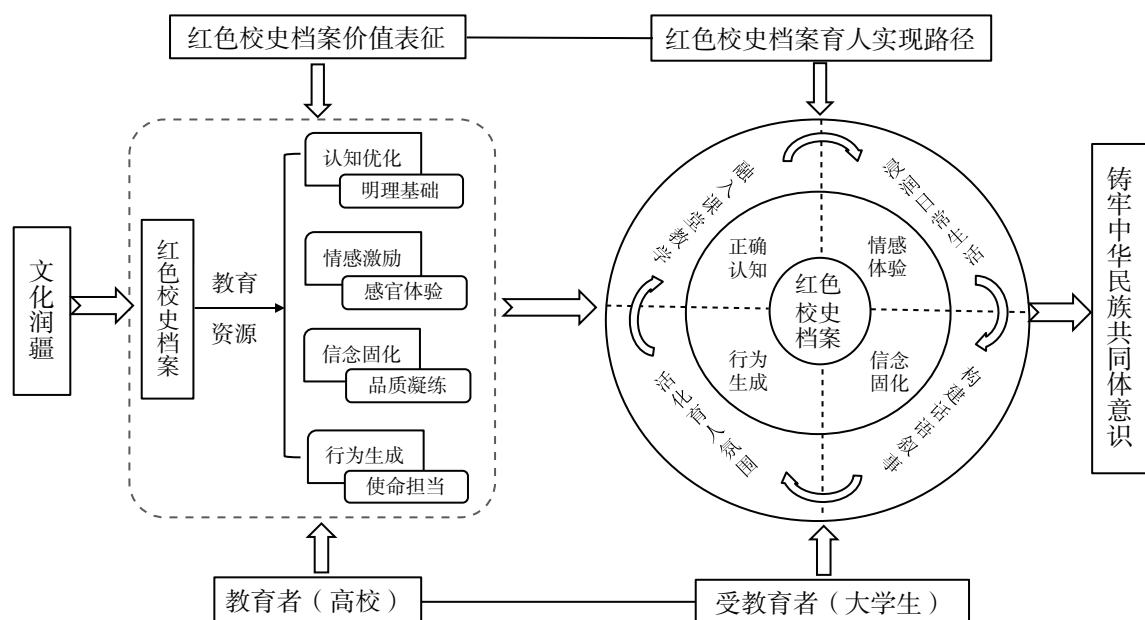


图1 以文化润疆为核心的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系统

四、以文化润疆为核心的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的实现路径

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育人是一项双边统一的活动，不仅是从教育者角度对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知情意行”的接受过程。系统论思想告诉我们，“凡系统必有结构，系统结构决定系统功能”。就此而言，作为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要从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系统的内部结构，找到影响育人的因果关系，进而用科学的教育方法融通认知、情感、信念、行为四维目标，从整体上观照红色校史档案的活化育人之目的，乃是新疆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的现实通途（如图1）。

（一）融入课堂教学：夯实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正确认知

认知是行为的前提，也是人对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动态过程。^①除了课程发挥育人关键作用外，高校以教学奠定了大学生的认知基础。遗憾的是，无论从档案资源供给上看，还是从教育教学需求上看，红色校史档案虽从未缺席，但始终与高校育人存在差距。红色校史档案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直观反映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以档案作为编写教科书的主要素材在国外已屡见不鲜，档案的教育作用也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一是要用高质量的课堂供给，弥合大学生对档案认知需求错位的局面。把红色校史档案内容纳入始业教育、思政课教育、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融入各类教学资源中，赋予课程、学分、课时的具体要求，通过显性教育与隐形影响相结合，达到育人之效度。譬如，新疆高校针对本科生、研究生普遍开设了“简明新疆地方史”必修课，通过教学活动有效融合思政教育，落实文化润疆工作，从校史中挖掘红色元素和典型案例，对新疆历史问题正本清源起到重要作用。二是要以学理阐释和教研引领，回应红色校史档案中语焉不详之处。新疆高校红色校史档案信息丰富，包含大量深入开展红色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应充分利用高校智库资源，对红色校史档案资源进行深入研究，构建一套基于真实、可靠、全面的红色校史档案的知识图谱。三是承载着红色基因的校史档案距今已有一定时空距离，应结合当下时代特征挖掘新的价值，把红色变成大学生

① 王艳景：《陕西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核及其开发利用》，《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7年第36期，第84—86页。

喜闻乐见的时代底色,形成教师的教本、学生的学本、教育的蓝本,丰富红色校史档案的教育手段。如新疆大学开展“俞秀松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加强俞秀松革命精神的内涵挖掘和时代价值研究并反哺教学,推动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断深化。

(二) 浸润日常生活:完善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情感体验

情感是个体对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引起的一种体验。培养大学生立德树人、爱国爱疆爱校的情感,须不断强化大学生对新疆高校红色档案的价值认同,使大学生对其核心价值充满深情、充分认同。开发利用红色校史档案资源,要遵循育人规律,让档案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具有新疆高校特色的档案育人体系。一是深度媒介化,将红色校史档案融入日常生活。红色校史档案只有在大学生日常生活实践中才能萃取出来,被大学生所“看见”。以接地气、易传播的方式,入驻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方能为红色校史记忆续航。通过编演红色文化戏剧,唱响红色歌谣,让兰台有声、有色、有形、有情,布满校园内外、网上网下各个角落。如在新疆高校热议的原创校史话剧《我们正青春年少》《红流》,就是还原了校史人物爱国情怀的优秀作品。二是价值符号化,提升红色校史档案文创产品开发效果。档案文创产品的开发既是文化润疆重要命题,也是满足大学生对档案文化需求的必备手段。新疆高校要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红色校史档案产品矩阵,有赖于各高校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LAM)协同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第二课堂”。如石河子大学档案馆藏有自1949年建校以来的36.7万卷(件)档案,该馆甄选档案藏品并近距离触及观众,开展“与信仰对话”“对话沙海老兵”等主题活动,感召青年大学生扎根边疆,建设边疆。2024年,石河子大学7622名毕业生中有3400余名毕业生选择在疆内工作,把“兵团精神”在新时代延续。^①

(三) 构建话语叙事:强化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信念固化

意志是个体在信念支持下奋发向上的心理过程,是精神和信念的动力之源。从发生学角度说,只有廓清新疆大学生自身不良的历史认知,不断注入红色校史档案蕴含意志品质的源头活水,才能使大学生持续输出向上向善的澎湃精神动力。档案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高空悬屋,尤其不能一味地重复“昨天的故事”^②。诚然,好的故事离不开叙事,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实践,为新疆高校红色校史档案叙事增添了时代注解和发展语境。一是从“他者”到“我者”叙事视角的转向。拥有丰富红色校史档案资源的高校实践场域,是话语传播最丰富的“案例地”。在塔里木大学档案馆,一张张模糊泛黄的照片,述说着塔里木大学的创建者们住地窝子,睡红柳床,手拿笔,肩扛锄,荒野当课堂,与恶劣环境作斗争,艰苦创办“沙漠学府”的史实。今天的塔大人,透过前辈的视角观照自身,生发出有关校园日常活动的无限想象,完成自我信念形塑的“主体性建构”。二是从“理性”到“感性”叙事策略的转向。以红色校史档案为切入点,打开尘封的校史,用实物实景实事充分展现、直抵人心。新疆农业大学校史馆以“一部看得见的历史”为牵引,让档案工作从后台走向前台,打造了一批高度与深度兼具、力度与温度共存的档案产品。鲜为人知的史料、娓娓道来的讲解、吸引大量师生前往“打卡”,该校校史馆每年接待量突破4万人次,搭建了档案与受众的互动平台。

(四) 活化育人氛围:促进高校红色校史档案的行为生成

行为方式是检验思想意识的客观标准,也是认知、情感、信念的外在表现。一方面,高校红色校史档案可以促进大学生的习惯养成。梅洛·庞蒂指出:“当身体被一种新的意义渗透,当身体

^① 蒋夫尔:《石河子大学:1200余名毕业生奔赴基层建功立业》,《中国教育报》2024年6月23日,第1版。

^②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编:《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五卷),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9页。

同化一个新意义的核心时，身体就能理解，习惯就能被获得。”^① 只有思想上的“破冰”，才会有行动上的“突围”。当代大学生生在春风里，长在新时代，普遍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但思想普遍波动大，心理承受相对较弱，其中有一部分对前途充满迷茫，且很多人未能深刻领会大学先贤们对国家富强、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挚爱之情。高校开展红色校史档案教育，是培养未来笃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的基础工作。这项工作尤其要注意从历史宏大叙事回归大学生身边细节的描述，实现在“设身处境”的历史连续性中强化国家民族认同，让初心使命看得见、摸得着。另一方面，高校红色校史档案促进大学生的认同生成。从心理学角度理解，国家认同就是公民个人从心理上认可与信任一个国家，并且与国家荣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② 新疆高校一部分大学生，受多重因素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对红色文化认识度偏低，国家情怀不足。就此来说，要深入挖掘和有效利用红色校史档案的历史事实、实物、遗存，将红色校史档案融入育人体系，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讲清楚，把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说明白，进一步内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意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面对不断提出亟待回答的历史之问、现实之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引导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在尊重“差异性”中不断凝聚“共同性”，着力把新疆高校打造为精神文化高地。

五、结语

最是文化润人心，治疆方略结硕果。文化润疆关乎天山南北子孙后代，也是一条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通途，其目标之一便是普遍提升新疆高校各族学生的文化认同。红色校史档案作为意义的附着物，一头连接着饱满的校园记忆，另一头连接着丰富的教育世界。如何让新疆高校红色校史档案在当下文化语境中被唤醒，在立德树人的框架内被呈现，实现红色校史档案育人本体的新发现和价值的新界定？只有锚定文化润疆的目标，立足国家认同的导向，采取润物无声的方式，摆脱单向度档案再生产，寻求一条观照档案育人主体生成的新路径。要而论之，用红色校史档案中红色记忆反思完成“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以信仰的超越达成“我们的未来向何处”的行动履践，引导新疆高校大学生知情意行而非止步于一时理解和感悟。由此，打通档案与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培养新时代文化润疆的践行者，民族团结的守护者，笃定求学初心的促进者的教育图景方能实现。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法]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22页。

② 张勇、李玲：《内地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20—124页。

数字时代产消合一形态探赜

徐 源，王海东

摘 要：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发生巨变，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的产消合一现象也由前资本主义时期的 1.0 形态、工业文明的 2.0 形态，发展到现今数字文明的 3.0 形态。技术叠加、平台经济和元宇宙的助力，使得产消合一活动不再受到时空限制，数字社会的产消合一 3.0 形态在数字身份、价值消费、产消活动的“合一”模态以及数字数据产出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点。产消合一 3.0 形态超越了以往的产消合一模式，尽管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能阻挡其成为数字社会的新范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数字社会；产消合一；数字数据产品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5) 01-0100-1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①。现今人类已然生活在数字社会之中，数字技术以多种方式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生活即数字”^②之势。随着 5G 技术、物联网和各类数字平台的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呈现出一种形影相随、相互交织的状态。随着产消合一现象在数字社会背景下呈现出新的形态与特征演化，通过重塑生产要素配置、创新价值创造模式等机制，逐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人们既通过数字平台和元宇宙等虚拟数字空间开展以主动交往为代表的产消合一活动，又在现实社会中，与各类数字设备构成的一个个集合（Assemblage）中进行着以被动交互为特点的产消合一行动。随着数字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以元宇宙为代表的虚拟数字空间逐渐成熟，产消合一活动在未来将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特点——风险与问题叠加，机遇与创新并行。对此，需要对数字社会中产消合一的最新形态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考察和批判阐释，使观念革新和实践创新成为可能。

一、产消合一的缘起与发展历程

产消合一是生产实践和消费活动同期进行的一种经济模式。与简单追求交换获取价值以及仅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第七届科研创新项目“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再辨析”（2023-YNUMY-17）。

作者简介：徐源，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王海东，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学。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 年 7 月 22 日，第 2 版。

② [澳大利亚] 狄波拉·勒普顿：《数字社会学》，王明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 页。

仅寻求使用的生产和消费有所不同,它将目的置于人们对产品的自我满足和自我使用之上。尽管产消合一的概念和理论出现得较晚,但产消合一的现象却古已有之,并体现出生产行为和消费活动具有内在统一性。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以及劳动和非生产实践的深度融合,产消合一活动的形态也不断更新迭代,展现出新的样貌和特点。

(一) 产消合一的概念界定

产消合一(Prosumption)这一命题最早由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提出,他认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只要我们既生产又消费我们自己的产品时,我们就是在进行‘产消合一’”^①。这说明,生产与消费同时存在于人们的活动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产消合一简单地与生产和消费相等同。他认为,生产与消费的区别在于,生产是为交换而生产,而消费是为使用而生产,而产消合一则存在于人们特定的活动之中。作为行动承担者的“产消合一者”(Prosumer,即产消者),则是集生产者 and 消费者为一体,其产消合一活动的目的是对产品的自我使用与满足,以及无偿创造产品和提供服务,而不是以交换和获取价值为目的。托夫勒对生产与消费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在他的视域中,产消合一的存在范围包括:(1)家庭成员为其自身和家庭进行的家务劳动与自给自足的无偿工作;(2)存在于社区或自治组织框架内的,个人之间主要以社交活动所呈现的,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无偿劳动,而人们只有在这两个范围中通过参与生产来满足自身消费的时候才被认为是产消者。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下的产消合一则会出现“以一半为交易而生产,一半为自用而生产的新生活形态”^②。

托夫勒把产消合一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认为其能促使企业和产消者个人在生产实践与消费活动过程中达到“双赢”的状态:对企业而言,通过把产消者引入到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使其承担简单的商品生产任务与维护活动,既减少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又降低了商品的价格;从产消者个人的视角来看,个人通过产消合一活动主动参与到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不仅使其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对商品价值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快速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产消者会因为更优惠的价格而购买自己生产和维护的产品与服务,因此更乐于参与产品的生产、组装和维护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个人从事产消合一活动,可以在拓展认知、缓解压力等方面促进产消者主体人格的生成,并在该活动中获取一定的情绪价值。托夫勒认为,为了达到这种“双赢”状态,企业必须最大限度地创造可供产消者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环境,进而使产消者自身强大的生产性力量得到发挥^③。随着产消合一活动的持续向好,产消者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愈发重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也逐渐模糊,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会逐渐趋向并服务于产消合一活动,进而使社会持续稳步发展。

(二) 产消合一的形态划分

尽管托夫勒视域下的产消合一活动仅局限于家庭和社区,但根据其“既生产又消费自己的产品”这一概念界定出发进行分析,并对产消合一在不同时期所展现的形态予以回顾,由产消者所处的时空范围,以及产消者自身的劳动与非生产性实践活动的融合程度为标准,可以将产消合一所演化的历史分为三种形态与阶段:其一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产消合一方式,即产消合一1.0形态;其二是托夫勒视域下的,处于工业化时期与后工业化时期的间隙或现代工业社会的,在家庭范围内成员的家务劳动和社区自治组织框架下进行的无偿劳动,即产消合一2.0形态;其三则是数字时代以用户为主体的新产消者在数字与实在空间的集合中,进行多重交互的生产与消

① [美] 阿尔文·托夫勒:《财富的革命》,吴文忠、刘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② [美]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86页。

③ [美]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359页。

费的活动,以生成数字数据客体为主要特征的产消合一形式,即产消合一3.0形态。

产消合一1.0形态处于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地位的前资本主义时代,那时的社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并以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对此,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①。因此,这一时期是以小农为主要角色的产消者,产消合一活动主要发生于家庭内部,他们的消费需求主要依靠自己的生产劳动来满足。尽管农户自身也进行社会交往,但他们的非生产实践并不是其消费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们的产消合一和社会交往范围也常囿于一个较为封闭的地区。随着资本主义与产业分工的发展,以及工业革命的加速发展,生产与消费深度分离,专门从事生产或专门进行消费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的生产活动与非生产活动之间的界限更为明显;从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的空间范围来看,“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其结果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③。与之相应,产消合一迎来新的形态。

20世纪后半叶,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产品的生产和维护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区自助自治运动的兴起,诞生了产消合一的2.0形态。从企业的成本来看,消费者以DIY和自助消费的形式进入到商品的流通领域,取代了大部分位于流通领域劳动者的工作,对商品价值的形成和实现具有促进作用;服务业的发展和个人休闲时间的相对增加,使消费者能在说明书和售后服务热线的指导下自主进行产品的安装与维护活动,以及从事其他的家务劳动。从社区的自治自助运动来看,社区的自治组织兼有社会交往和产品生产的功能,人们在参与自治自助活动的同时,也能从事一部分生产劳动,但其劳动产品却在自治组织范围内被消费。这两种动力使得工业化阶段的部分交易劳动转向了产消合一。此时的产消合一,其范围相比于1.0形态来说有所扩展,从家庭内劳动扩展到社区的自治组织和商品的部分流通领域,并且劳动与非生产实践开始融合,人们通过自治自助活动参与社会交往的同时,也产出了劳动成果并作为社会交往的副产品。

随着互联网Web2.0和Web3.0的传播与普及,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以劳动为切入点,在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这一大众传播媒介与其受众的互动关系,以及其中潜在的剥削关系基础之上,提出了互联网产消者商品(Internet prosumer commodity)概念^④,用以描述互联网时代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数字劳动现象。与之相匹配的产消合一现象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产消合一3.0形态。从空间范围来看,相较于前两个形态遍布于现实空间,3.0形态的产消合一活动不仅存于现实空间,还存于虚拟数字空间之中,这使其具有即时性、交互性、网状化等特点。数字空间中的产消合一活动相对弱化了传统产消合一的直接现实性和可感性等特质,从劳动与非生产活动的融合程度来看,人们在数字空间借助数字身份开展社会交往的同时,不仅生成了数据这一交往的副产品,而且获得以情绪价值为代表的诸多附加价值。前者被数字平台用以加工、整合,既能被打包出售换取新的价值收益,又可供企业用于考察分析;后者既有助于多巴胺的形成,使用户放松身心、愉悦自我,又对用户的主体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这一融合提高了用户在相关数字平台的使用黏性,从而提升平台的受关注度和收益。随着以物联网、5G技术与元宇宙为主要特征的技术叠加,此时产消合一3.0形态在两个方面呈现出更新的特点:一方面,人类在现实社会中与各种数字设备构成了多样化的集合,形成了新型数据关系,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④ Christian Fuchs, “Web2.0, Presumption and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vol. 8, no. 3 (2011), pp. 288-309.

消合一活动便随着这种数据关系的开展而遍布现实社会各领域；另一方面，元宇宙的出现，既让产消合一的存在域得到扩展，又使其生成、进行和结果复杂多元。

表1 产消合一形态划分及其特点

产消合一形态	空间	时间	劳动与交往活动融合状况	产品形式	特点
1.0 形态	现实空间之中封闭区域性小农经济	前工业文明时代	二者分离	实物	存在范围和产消活动单一，市场交往交流受限
2.0 形态	现实空间的家庭和社区组织，以及实物商品的部分流通领域	工业文明时代	开始融合	实物或商品	存在范围及产消活动的类型虽有所扩展，但受到商品稀缺性和排他性的限制
3.0 形态	现实空间与虚拟数字空间全领域	正在形成的数字文明时代	高度融合	实物、虚拟物及数据	存在范围广，产消活动复杂多样，活动对象不受限制

二、产消合一 3.0 模式探析

（一）3.0 模式的前提和条件

3.0 形态的产消合一可以用“虚实互联，数据主导”加以概括。与数字设备之间的结合，使得人们在现实社会的产消合一活动被彻底数字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分别在两个空间孤立地进行产消合一活动，因为数字设备的普遍联网使得现实社会与数字空间交互关联、多样沟通。作为产消合一主要产物的数据，是产消合一 3.0 形态的重要内容与特色之一。

平台经济是以数字平台为核心载体，通过跨时空地集成、处理和传输各种数据信息，为用户提供算力工具、数据存储与活动规则，并持续进行产消合一活动的经济形态。平台经济中的产消合一活动呈现自身的特点：第一是数字平台整合了用户的绝大部分产消合一活动。用户仅需利用身边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通过一个或多个数字平台便可完成数字内容的创作、发布与管理，对自身偏好的数字内容进行消费与评价，就某个议题或兴趣爱好加入相应的数字群落而参与交流，以及利用数字货币对数字内容和实物产品进行交易。与产消合一的前两个形态相比，平台经济的存在不仅使产消合一活动扩展到数字空间，而且让产消合一的运用场景更加多元，既使数字平台的便利性得到提高，又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利用数字平台参与进行产消合一活动。第二则是用户利用数字平台进行产消合一活动的同时，也实现了与生产厂商之间的信息交互。与利用规模经济进行实物生产的厂商，以及作为单一的购买行为而被动接受产品的消费者不同，数字平台本身具有的集成、处理和传播数据信息能力，能将用户产消合一活动所生成的消费数据通过即时平台传递至厂商端——凭借数据所呈现的用户偏好和兴趣，及时改良与更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这就省去了人工市场调查、数据抽样整理、分析与研判等环节以及相应的物资人力支出；而厂商利用数字平台对新产品的宣传、营销和发布活动，既能同步传递到用户端，又能通过点赞、打赏、留言等方式收到用户的实时反馈，为后续产品的改进提供重要的信息。可以说，平台经济的出现使用户和厂商之间的沟通变得直接、即时而深入，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元宇宙与 AI 的出现和迭代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迈上新的台阶。元宇宙中的产消合一活动也呈现新的特点：第一是几乎全覆盖虚拟与现实交互的空间。元宇宙把互联网、数字设备、数字技术及用户置于一个全覆盖、广交互的虚拟现实空间之中，相较于与互联网数字空间和现实空间中存在的集合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分离性，元宇宙阻碍少、低延迟的交往交互实现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交互关联。由于元宇宙本身就是一个人与数字用户以及与数字技术交往交互的大型集合，这使得人们的产消合一活动扩展到元宇宙的全范围。在现实社会受具体时空限制而无法普

及的产消合一活动,遍布于高开放性的元宇宙空间之中。第二是多样化、融合化的活动。由于元宇宙,摆脱了传统时空的限制,人们的交往交互行为既普遍存在又交替跨越于虚拟与现实空间之中,这使得多样化的产消合一活动成为可能。用户不仅能把存在于元宇宙的虚拟物品以3D打印等方式转换到现实空间,也可以通过图像识别与扫描的手段,在元宇宙中实现实物的再生、重组,并形成相应的数字物或图像。虚拟空间中的用户可以凭借自身的喜好与情感自由选择产消合一的方式、存在范围以及承担对象。至此,人们在元宇宙中真正实现了劳动与非生产实践的完全融合。第三是低延迟性带来的即时激励。元宇宙中的产消合一主要体现在用户通过游戏化的活动获取奖励。与现实社会中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的滞后反馈不同,用户在元宇宙中,一旦完成任务,即时就得到奖励——实物奖品,也可以是数据产品;既可能是“彼岸”中在场的尊严、荣誉,也可能是流通于数字空间和现实社会的货币,甚至是大脑分泌的激素或多巴胺而带来的愉悦感,这些即时激励不断催促着用户投入到新一轮的产消合一活动之中,生生不息,源源不竭。

(二) 3.0 模式的生成与展开

生产和消费仍是数字社会产消合一活动的核心环节、关键要素与主要内容,且产消合一过程中的生产和消费总是相互渗透、交织于一体、难以分割的。该活动本身就包含了生产和消费,在此过程中并没有纯粹的、单一的生产或消费^①。生产过程中就已内在地包含着消费,同时在消费过程中也内在地包含着生产,二者并无截然分别。用户在数字平台和元宇宙中随时随地进行数据生产,也在每时每刻地消费各种数据。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与人们在现实空间中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形式进行直接交互不同,用户利用其数字身份进入数字平台,与表现为文字、符号、图像的各种数据以及其他数字人进行双向的间接互动,不仅生产了各种数据,例如用户生成内容(Users Generated Content, UGC)之类的数据产品,且能根据自身趣好与需要消费相应的数据产品。此外,居于现实社会的用户与数字设备组成的集合交流互动,将自身的行为转化为数据并记录上传,平台既能将其生成数据产品获取经济收益,又可以利用数据对其现实行为进行回溯、量化,使个人的日常生活以数据流的方式得以呈现。用户在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以数据的形式进行商品化的同时,也消费了以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数据产品。在虚拟数字空间中,数据产品形式各异、种类繁多,“性、文化、历史、遗产的商品化;自然的商品化,将其作为奇观异景或休憩之所;从创造力、本真性、独特性攫取垄断性租金——上述这些均相当于明码标价那些事实上从未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事物”^②。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用户在数字平台中与其他数字人和各种符号数据展开交往行为,消费平台免费的数据产品,或通过平台对某些数字内容进行打赏付费的同时,其自身在数字空间中的交往行为与操作行为也在不断生成新的原始数据,通过平台的创意策划和辅之以算法技术的数字劳动对这些数据进行整合处理,既可以形成新的数据产品供用户再度消费,也为平台对数据的利用分析行为提供原材料。由于虚拟数字空间即时性和网状化的性质,产消合一活动中数据的分配和交换的进程被大幅缩短,既让用户的消费欲望得到及时满足,又使经由平台开展的经济循环加速运行。用户在利用集合生成的数据便利生活的同时,其自身的行为也会被数字技术记录上传,并供平台制作数字内容和产品。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③。

① George Ritzer, “Prosumer capitalism”,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56, no. 3 (2015), pp. 414.

② David Harve: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pp. 93 - 110.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数字数据的边际复制成本趋近于零的特性,使其价值实现呈现出一种“量子叠加态”——同一数据产品既可作为私人消费品满足个体需求,又可作为公共品支撑群体智能进化。这种双重属性打破了传统商品排他性与竞争性的边界,例如开源算法模型在被个体消费并加以调整优化。

(三) 3.0 模式的主体及其社会关系

执行 3.0 形态产消合一活动的主体,即以用户或数字人作为主要类型的产消者,利用一个或多个数字身份在虚拟数字空间以及现实社会的集合中与数字技术展开交往交互行为,在制作生产数据的同时,也在消费数据产品;既是数字数据产品的生产者,又是数字数据产品的产消者。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成熟,先进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也将利用数字身份在数字空间中从事产消合一活动,这意味着数字主体不断多元化,除了人类碳基生命之外,还有硅基生命也能拥有数字身份,成为数字人,参与数字空间的产消合一活动。

用户根据兴趣爱好、特长等通过数字身份在平台发布创意性的数字内容,或对其他数字作品或活动进行点赞、评论、分享、打赏等与其他数字人交往互动。这样,一个具有详细偏好、操作习惯与自身标识的数字身份便被建构起来,并与现实社会中的自我相对独立,通常数字人与其对应的生物人没有同一关系,或者说不应以同一性去规定二者的关系。此外,由于同一主体可以拥有多个数字身份,所以理论上可以建构具有多种偏好、行为习惯与标识的数字身份,并且现实社会之中的多个主体也可以利用一个数字身份进行产消合一活动,使得同一数字身份的偏好和行为习惯也可能会产生较大差异。与平台类似,人们在现实空间中与数字技术相融合,以虚拟身份在元宇宙进行交互体验是元宇宙产消合一活动的主要形态。用户既可以复现现实社会中的产消合一活动,也可以获得与现实中类似的知觉与情感体验。即使用户自身因离线而在元宇宙中“缺场”,其数字身份也会继续存在,并以委托、派遣、命令等形式继续产消合一活动,而用户再次返回元宇宙后,依旧能收获素材、游戏币,甚至是现实货币。人们在虚拟数字空间的交往交互,也形成了与他人之间的虚拟社交关系。由于数字空间抹除了现实社会中的主体差异和矛盾对立,使得他们在这种虚拟数字关系中仅需合作进行产消合一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数字内容的增加、虚拟共识的深化,以及对数据产品的消费。

现实社会的集合中,由于人们的微型数字设备可以在没有人工介入的状况下与互联网相连接,自行在数字空间中交流数据,人们“与物或者与地点的关系被接通网络与平台的临时接入(temporary access)取代了”^①。数字设备在同一集合内,即使没有相应的权限和密钥连接至互联网,二者也能自行生成数据,待到接入互联网时即可感受到对方的存在并进行交流。处于数字社会的人们,无论是从事生产还是进行社会交往,他们对集合的接入行为,都产生了人与数字设备直接的数据联系以及与他人间接的社会关系,是为数据关系(data relations)。这一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使得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失去其主导地位,与数据关系处于并行状态,这使得在现实社会中毫不相识的个人及群体会因为数据关系而相遇,并共同完成产消合一活动,在目标达成之后也可以立即解散,彼此之间不再发生任何联系,例如流行于社交媒体中的“搭子社交”。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②。数字技术会记录人们的日常行为,并在数字空间中以数据流的方式打造人的数据身份,这一身份也会参与到数字空间的数字交往以及现实社会借由数字技术辅助的日常交往之中。此时,人类已然演化成了一个横跨虚拟数字空间和现实社会的数据杂合体。

① [德] 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谢晓川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第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

算法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成熟,使它们在21世纪将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生产条件”(General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①。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平台也会利用算法和人工智能注册数字身份,使其加入产消合一活动之中。这样一来,与用户的数字身份在虚拟数字空间交往交互、共建共享的对象便不是其他人类用户的数字化身,而是一个个内核为代码的“数字人”,这使得用户借由数字身份而实现的虚拟关系更加深入。至此,社会交往也将在3.0形态的产消合一中发展为四种模式:其一是通常的,用户通过数字身份进行数字内容的生产,另一个用户消费数字产品,反之亦然;其二为用户通过数字身份进行数字内容的生产,数字人消费数字产品;其三是数字人进行数字内容的生产,用户通过其数字身份消费数字产品;其四为数字人进行数字内容的生产,而另一个数字人对数字产品进行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推动下,数字主体的交互模式正呈现分布式特征。AI智能体通过实时抓取数字空间中的碎片化数据(如用户评论、开源代码片段、图像元素等),经过深度神经网络的自组织重构,生成具有创新性的数据产品。这种模式下,最终产品的数据源既非单一数字人,也非明确的群体协作,而是形成类似“数字零部件装配”的模糊生产网络。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文章可能融合了数百万用户的语料特征,短视频AI工具通过重组不同创作者的视觉元素形成新作品。这种生产模式虽然提升了内容创新效率,但也导致数据权属的“去中心化迷雾”——区块链技术虽可通过数字指纹确权,但当数据要素经历多重拆解重组后,传统的确权机制面临新的挑战。

(四) 3.0 模式“合一”的样态分析

此时的产消合一过程中,尽管生产与消费相互渗透,但也囊括了不同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而“合一”本身也包含了不同的生产和消费形式,其数据产品也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因此并不能把3.0形态的产消合一简单地概括为对数据的生产和消费。

首先,从数据的制作行为来看,用户利用数字身份,在虚拟数字空间和现实社会的数字内容制作主要包括:音视频的录制、拍摄及剪辑,文案的撰写与编辑,对利用互联网开展活动项目的策划管理,以及利用集合中的数字设备主动记录自己的行为习惯等。甚至利用数字平台对其他数字内容进行复制、存储和传输也属于数字产生行为。随之生成大量的数据,既可供平台用于集成、处理和分析,又能供其他玩家消费,其结果都是增加了平台所持有的数据量,进而使平台资本得到了增殖。由于“这个部分不仅部分地保持预付的资本价值,部分地再生产预付的资本价值,而且同时增大预付的资本价值”^②,加之用户在内容创作过程中消耗了自己的智力、精神以及体力,因此可以把数字内容的创作行为概括为具有生产性的“非物质劳动”。

其次,从数字产品的类型及其消费来看,由于存在多样化的数据生产,使得数字产品(或者是用户生成内容)的类型及其消费所满足的价值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数字产品主要包括用户记录自己的生活和专门制作而形成的音视频,实时录制播送的直播内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文案,用户对相关音视频与文案的二次创作,以及对他人数字产品的点赞、分享、评论和简单的浏览痕迹。甚至用户对经由平台而消费的实物产品、数字物以及生活服务所作出的评价也是数字产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人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做人的食物”^③。因此,数字产品的价值实现

① Nick Dyer-Witford, Atle Mikkola Kjosén, James Steinhoff: *Inhuman Pow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19, p. 2.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页。

也因用户自身需要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数字产品在用户的消费中实现使用价值与价值，若还能赢得众多用户的点赞、好评和分享，使其“病毒性传播”（viralty）大量引流，吸引更多的数字消费者，便能体现其巨大的共享价值。此外，用户消费数字产品或内容时，还会获得情绪价值或是分泌多巴胺，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到轻松畅快，或是与数字内容共情，进而深化认识、丰富情感体验，使得数字产品的情感价值得到彰显。毋宁说一些用户出于消磨时间、打发无聊光阴而消费数字内容，沉浸其中（如刷短视频），乐而忘返，展现数字产品的娱乐价值。当然，如果拥有以区块链技术构成的数字产品，还能收藏或下载保存以备不时之需，从而实现其收藏价值。

然后，新形态产消合一的“合一”性质也蕴含多种形式。其一是产消者自产自消的形式。用户通过平台创作并上架数字内容之后，可以立刻消费自己创作的数字内容，同时，用户通过数字设备将自身日常生活的行为轨迹转化为数据并上传，而后对以数据形式呈现的日常行为进行追踪、分析，并调适自身的行为习惯，以达到理想的状态。用户在对自身生产的数据进行消费的同时，也促进了数字社会新治理模式的形成。其二因互联网即时传播所带来的生产和消费的“同一”形式。一方面，用户以直播的形式在数字平台中实时创作数字内容；另一方面，其他用户也在以收看直播的形式进行着数字消费，对直播内容作出评价的同时，也在利用数字货币对其打赏付费。这样一来，生产和消费在平台的直播活动中达到了统一，并且数据的生产、消费和交易也得以即时进行。其三则是因算法技术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产消合一自动化形式。一旦数字内容创作完成并在平台中上架，那么产消合一活动便可自动进行。用户在此过程中，免费使用了由算法技术构成的传播推介服务，在其数据消费过程中也为平台生产出相关的浏览数据。此时无法明确区分用户行为的生产和消费性质，因此更能体现出“产消者”“合一”的性质与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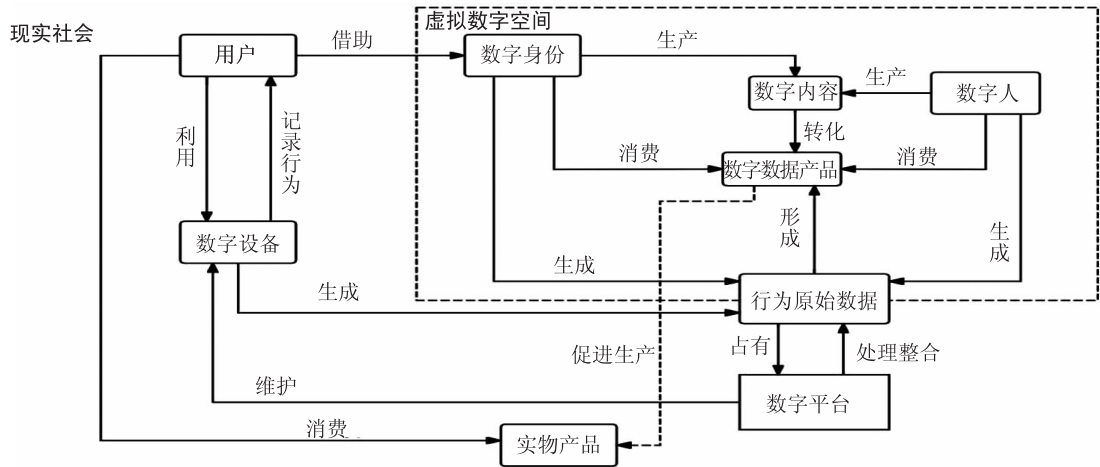


图1 3.0形态产消合一活动链条

最后，数据是3.0形态的产消合一活动的产物，为数字平台获取利益提供了新产品与路径。从用户的角度来看，数字数据既是产消合一的中介，又是产消合一的对象。平台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由数据构成的数字产品就具有使用价值，可供用户消费，满足用户的情感、共享、沉浸和收藏等需求。从平台的角度来看，用户本身在对数字内容的消费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关于消费与行为操作的原始数据，但是“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对象化劳动”^①，杂乱无章的数据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必须通过平台组织数字劳动，辅之以算法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数字数据进行集合、处理和重构，制成数据产品之后方可发挥其交换价值。此外，平台还能针对应用场景的不同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9页。

对数据进行多次的加工整合,减少无效数据,以提高对数字数据的利用率。生成的数据既能被平台用于打包出售以获取经济价值,又能被平台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分析归纳,其结果不仅能用于对用户精准推送可供消费的数字产品和实物商品,使产消合一活动循环重复进行,且能大致掌握社会普遍的消费需求,为数字资本提供获利的方向,最终有助于平台资本的价值增殖。

三、作为数字社会经济生活的新范式

《决定》指出,“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①。数字社会的产消合一背后蕴含着对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对传统经济模式的深刻变革。人们在这一过程中有着无尽可能,或是随波逐流、自身清醒,或是继续沉沦、无法自拔,抑或投入浪潮、再造传奇,而不适应变革的制度、文化、科技、习惯也将随之改变。产消合一3.0形态逐渐成为数字社会的一种新经济范式。

(一) 产消合一新范式驱动柔性实物生产

数字数据的实时生成和自由流动作为新范式的重要特征,其自身在被不断利用与消费的同时,也促进了实物生产的灵活与高效。以往的产消合一形式与实物商品的生产,都是生产者主体从自身的生活环境移动到生产的固定场所,从而进行生产活动。无论是进行商品生产的田园、工厂,还是以往产消合一活动所属的社会组织、室内房间,都与主体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存在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感对生产活动产生了无形的限制,即生产者必须进入固定的生产场所才能从事生产,并且这一固定场所只能生产出单一的实物产品。产消合一的新范式,其主导对象已经从一定时间段和固定场所中的“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②,转变为不受空间限制而实时生成的数字数据。数据作为数字社会的重要生产要素,在产消合一活动中可以不设限制地生成产出和自由流动,形成多元的数据类型以及多样的利用处理方式。这种数据生成和流动的不设限,消减了生活环境与生产空间的固定边界,并解除了不同生产领域和空间的交互限制,生产者与固定场所的绑定也消失了。在数据要素的推动下,人们可以通过产消合一活动介入到实物产品的生产过程之中。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制订生产计划、调节生产工序,从而达到组织和参与实物生产的目的。实物商品在持续产出,各种生产数据也在不断生成。不同工序的生产者可以对于这些数据进行消费,以调整生产节奏与速度;同一商品上下游环节的生产者也可以利用数据,掌握他者的生产状况,以适时对自身的生产过程进行决策,从而使产品的生产和创新过程更具柔性,达到加深生产过程异质性程度的效果^③。

(二) 数字数据消费主导产消合一新形态

新范式的形成,极大地削弱了数据产品的稀缺性和排他性,进而使数据消费不受限制。数字数据产品的可复制性及其自由流通,使其不再专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个群体。从消费主体的角度来看,同一数字产品既能被生产产品的用户消费,也能被其他用户所消费。从消费次数和范围来看,数字产品既能在某一数字平台中被无限次地消费,也能在其他数字平台中被无限次地消费,以及无限次地复制、粘贴、共享。无时无刻的数字消费促进了产消合一过程的循环。由于用户在消费数字产品的过程中也在生产着数字数据,使得多种类的数字产品在平台中呈现出爆炸性态势。诚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2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③ 王梦菲、张昕蔚:《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变革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经济学家》2020年第1期,第55页。

然, 由于区块链技术及数字平台中相关规则的存在, 使用户在生产数字产品的同时, 可以对产品的消费次数和消费方式加以设定。但是, 数字数据在产消合一过程中的自由流动和复制共享, 可以让这些设定被轻易突破, 数字产品与数字消费时刻盛行。此时的实物消费则完全可能从属于人们的数字消费, 并作为一个要素而参与到新形态的产消合一过程之中。

(三) 数字信息交换贯穿产消合一全过程

从交换方式上来看, 新形态的产消合一所促进的数据自由流动, 也体现在活动中兼具即时性和便利性的数据交换与信息传播中。商业信息的交换交流方式更新迭代, 并衍生出多种与之相关的新兴业态。从原始社会时代的原始生产和物物交换, 到产消合一 1.0 与 2.0 形态中现实的货币与实物商品相交换, 再发展到今天数字社会中无时无刻进行的产消合一活动, 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具有即时性的运用数字货币与数字产品相交换, 或是以数字货币与必要的实物商品相交换, 甚至是通过数字产品与数字产品之间相交换, 社会变革不断推进, 交换方式持续升级。即时性的数据交换促进了信息的双向交互与传播, 在产消合一新形态中, 用户与企业以及其他产消者的信息交流, 由传统形态中延时性的“事前了解”和“事后反馈”, 升级到新形态即时性的“事前熟知”“事中交流”和“事后共享”。个人的消费需求和体验感受能够被及时传递到企业和其他产消者手中, 使他们得以适时调整产品的研发方向和生产计划; 企业和产消者自身的营销信息和项目规划也能及时被用户所熟知, 从而提升了消费信心和产品期望。这种即时的数据交换, 在调节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同时, 也对各类资本的转移具有促进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生产过剩。产消合一过程中的数据交换, 也派生出一系列数字评价活动和利用数字技术所建立的数字信用体系, 以解决数字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数字评价对数据消费和实物消费具有推动作用, 优化生产和消费结构, 促进了产消合一活动的循环进行。数字信用使传统的社会信用体系起到了补充和加强的同时, 还推动了非现金结算业务的发展, 进而构建出一个健全完善的数字经济体系。

(四) 产消合一工具与主体不断升级和分化

随着数字社会的形成发展和产消合一形态的升级, 执行和服务于产消合一活动的工具形态及人员素质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升级和分化。1.0 形态的产消合一活动, 其工具主要以外部构造简单的农具为主, 尽管这些工具使“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 它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 不顾圣经的训诫, 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①, 但是运用这些工具的传统产消者往往要经过数年的训练和劳动, 才能使传统的产消合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在 2.0 形态的产消合一过程中, 执行产消合一活动的工具形态有所发展, 以商品流通领域和从事家务劳动的工具, 其外部形式和内部构造出现了分化。外部形式逐渐简易上手的同时, 其内部构造也开始精细化; 与之相匹配, 使用工具进行产消合一活动的人员, 在综合素质得到提升的同时, 在其专业素养的形成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普通的产消者在经过产品说明书、咨询电话等简单培训后, 便可运用工具进行活动, 而服务于产消合一活动的雇佣工人则要经过专业培训后才能对工具和产品进行专门维护。数字社会的产消合一活动, 其执行工具和人员素质的分化则更为明显, 数字设备的外表设计逐渐简约化、扁平化, 用户只需对数字设备进行触碰、按压、输入等简单操作便可进行产消合一活动; 而数字设备和数字空间的内部构造则日趋复杂精细, 通过数字劳动以服务产消合一活动的数字劳工则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和各类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关资质资格后方可上岗。工具和人员素质的分化, 也体现出新形态产消合一活动对数据流动与生成的促进作用: 从外部表现来看, 数字设备的简约化, 减少了对操作行为的阻碍, 进而促进了数据生成及其流动传播, 而用户则免去了繁杂高昂的学习成本, 并为产消合一活动扩大了潜在的数据来源和受众群体, 实现了基于数字数据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第 209 页。

的协同和参与；从内部构造来看，只有高素质的数字劳工才能应对数字设备与数字空间内部的精密结构，处理纷繁复杂的突发状况，最终达到保障数据自由流动的完好效果。

3.0模式的产消合一作为新的范式，其促进的数字实时生成与自由流动，为数字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域，为数字社会的思想观点传播和数据信息交互构建了新的存在域，也让数字化的人类社会产生了新的问题域。在新的机会领域中，数字平台整合数据以分析产消者的偏好，调整实物产品的生产结构和创新研发，进而促进产业资本持续发展；金融行业通过数据分析以调整投资结构、提供市场导向、降低准入门槛，从而为金融资本提供盈利机遇；实物生产者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精准调节生产过程，即时信息交互、及时作出决策、瞬时收到反馈，进而使传统经济焕发生机。在数据交互新的存在域中，产消者在虚拟数字空间和现实社会之中，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自我表达、自我提升和产品消费的方式逐渐多元化，信息数据传播和思想观点表达也逐渐以多维、多角度的视角得以呈现。尽管整个社会以新技术的大范围运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域，但对于这些问题的应对和解决，客观上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的普及，产消合一的活动的持续进行，不断推动新的数字生活方式形成、演进，频频促使新的数字交往方式生成嬗变，持续驱动数字经济和生产力走向成熟，加之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得到大规模设置和应用，使数字社会的产消合一新范式成为必然。至此，数字社会的产消合一活动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一种更是数字行为；产消者的相关活动也不再只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成为新的数字生活方式。

四、结语

数字社会的产消合一新形态，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传统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新形态的产消合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往往会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忽视人的整体利益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推动之下取得了发展，其逐利手段也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和隐蔽。产消合一这一新范式也会被数字资本所利用，在其增殖过程中使产消合一活动存在的价值被掩盖，使产消合一存在的问题被加剧和放大。因此，马克思强调，要正确区分机器，以及对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①。与之相匹配的则是要反对针对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而非反对机器本身。同理，要对数字社会及其产消合一，以及对二者的资本主义运用形成正确区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②。数字文明不仅要新质生产力的大范围运用为标志，还应该以一系列与新质生产力的运用与发展相匹配的新生产方式、新生活方式、新交往方式和新思维方式的确立为重要特征，而更具融合性的新形态的产消合一便是其突出代表。面对数字文明的美好前景，唯有大胆革新观念，突破思想桎梏，加强理论建构，推动实践创新，并且要熟知和掌握产消合一活动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对产消合一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做到预先谋划和防范，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产消合一新模式。同时，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建立新形态产消合一模式的主要推动力。在此过程中，在生产力维度深化数字技术集成创新，通过算法治理与算力革命重构价值共创网络；在生产关系层面，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以分布式认知与参与式设计重塑数字社会契约，并在此基础上从文明形态高度探索智能技术范式转换，开展人工智能与数字身份研究与革新，开拓“数字生命”新形式，不断抢占发展制高点和主动权，逐渐实现工业文明范式向数字文明范式的历史性跨越。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08页。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智化”赋能 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吴 韬, 钟启超

摘 要: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是红二方面军的摇篮, 曾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肩负推动振兴发展与促进共同富裕的双重任务。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数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数字经济创新引领未来发展方向。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正抢抓“数智化”发展新机遇, 加快推动经济社会“数智化”转型升级, 并探索了“数智化”赋能促进共同富裕的经验做法。然而,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智化”赋能促进共同富裕还存在数字基础设施不够健全、数字营商环境不够优化、数字人才队伍不够壮大等制约因素, 亟待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断增强老区发展新动能; 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 大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培养复合型数字人才, 推动老区“数智化”创新发展。

关键词: 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

中图分类号: F04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5) 01-0111-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明确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②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革命老区是新中国的摇篮, 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和付出巨大牺牲。全面推进革命老区迈向现代化、扎实推进老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是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数智技术加速迭

基金项目: 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革命老区‘数智化’赋能促进共同富裕研究”(22BKS151)。

作者简介: 吴韬,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数字政府; 钟启超,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培训部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 第 1 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年, 第 35 页。

代创新,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①,而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正处于数智化创新发展浪潮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②。新时代新征程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应抢抓“数智化”发展新机遇,深刻把握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对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加快“数智化”赋能,有效形成“数智生产力”,进而向新质生产力跃迁,不断在高质量发展中循序促进共同富裕。

一、文献综述

革命老区是我国特殊类型地区。湘鄂渝黔革命老区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根据地,以及曾经的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日益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学者们纷纷对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的建设发展进行研究。从既有文献来看,研究主要聚焦以下方面:一是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吕学芳(2000)提出要立足革命老区、省际边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的特点,制定湘鄂渝黔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政策。^③白晋湘(2003)对湘鄂渝黔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山寨经济进行了深入思考。^④张铁生(2009)分析了湘鄂渝黔边区生态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⑤二是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的文旅发展。龙祖坤(2004)从产业、经济、环保以及民族特殊性等方面对湘鄂渝黔边区旅游扶贫政策进行了探讨。^⑥鲁明勇、尹贻梅(2009)探讨了湘鄂渝黔区域旅游发展问题。^⑦许春晓、汪淑梅等学者(2024)通过构建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效应的时空演变以及存在短板。^⑧三是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的社会治理。李俊杰、李海鹏(2010)探讨了湘鄂渝黔边省际边界民族地区“边界效应”和治理模式。^⑨罗忠桓(2011)认为,湘鄂渝黔桂省际接边地区应建立以政府合作共治、社会参与的区域治理新范式。^⑩四是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郭媛丽、仪强(2021)对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了测度和时空演变分析。^⑪陆远权、张源(2023)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进行耦合衔接评价与测度,分析了影响因素。^⑫五是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的共

①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第4页。

②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4页。

③ 吕学芳:《湘鄂渝黔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政策研究的几个问题》,《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73页。

④ 白晋湘:《湘鄂渝黔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经济发展的思考》,《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年第2期,第143页。

⑤ 张铁生:《湘鄂渝黔边区生态经济发展研究》,《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9年第8期,第4页。

⑥ 龙祖坤:《湘鄂渝黔边区旅游扶贫的政策研究》,《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7页。

⑦ 鲁明勇、尹贻梅:《旅游研究与区域旅游发展的共同演化——基于湘鄂渝黔边区的案例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9年第3期,第16页。

⑧ 许春晓、汪淑梅、梁慧婷:《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效应时空演变及短板分析——以湘鄂渝黔革命老区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24年第5期,第86页。

⑨ 李俊杰、李海鹏:《省际边界民族地区“边界效应”分析与治理模式初探——以湘鄂渝黔边“土家苗瑶走廊”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3期,第168页。

⑩ 罗忠桓:《从行政区行政走向区域治理:省际接边地区治理的范式创新——以湘鄂渝黔桂接边地区(五溪源)历史沿革与治理创新为例》,《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64页。

⑪ 郭媛丽、仪强:《跨区连片民族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测度及时空演变——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79页。

⑫ 陆远权、张源:《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经济与管理评论》2023年第3期,第21页。

同富裕。杨丹（2022）以湖南为例，探讨了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政策过程的优化问题，认为欠发达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是扭转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格局和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①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县域电商、区域协调、非遗资源开发与保护等诸多内容，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学术界有关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研究文献成果较为丰硕，研究领域较为宽泛，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其中不乏许多真知灼见，特别是学者们关于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的理论贡献。然而，现有文献中有关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共同富裕的成果还相对较少，尤其是对“数智化”赋能促进革命老区共同富裕的研究更为稀少。因此，本文着重从数字经济、数字政府以及智慧社会三个方面入手，探讨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智化”赋能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做法以及制约因素，并给出优化路径。

二、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智化”发展的基本情况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地跨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四省市，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的首选目的地，是孕育红二方面军的摇篮以及红军长征的最后出发地，规划范围包括湖南省张家界市、常德市、湘西州全境以及怀化市、娄底市部分地区的28个县（市、区），湖北省荆州市、恩施州全境以及宜昌市部分地区的23个县（市、区），重庆市黔江区、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和彭水县5个县（市、区），贵州省遵义市、铜仁市全境的24个县（市、区）。

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涉及湖南省张家界、常德等五个地级市，湖北省荆州、恩施等三个地级市，重庆市五个县区，以及贵州省遵义、铜仁两个地级市。赛迪顾问发布的《2024中国数字城市竞争力研究报告》（发布版）显示，遵义、常德和宜昌三个地级市进入2024全国数字经济百强市，分别排名第66、77和79位，相较2023年，遵义市和常德市的排名分别上升16和20位，宜昌市则下降4位。近年来，遵义市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和数字经济“十百千”行动，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连续四年进入数字城市全国百强榜。2022年遵义市数字经济规模达1670.50亿元，占GDP比重达37.95%，数字经济规模增速14.36%，位居全省第二位；^②而2023年占GDP比重则超过40%，达到了40.7%，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达到47.1。^③“十四五”时期，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新进展，迈上了新台阶。

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积极开展规划部署和创新实践，加强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水平，加快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中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发展报告（2023）》，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地级市在全国地级行政区中数字化服务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宜昌、恩施、娄底、荆州、遵义以及铜仁等六个州市，进入全国地级市排名百强，分别排名第28、44、47、71、88和97位，常德、湘西、张家界和怀化四个州市进入全国地级市排名200位之内，分别排名第124、156、171和188位，而重庆市排名为直辖市中的第3位（见表1）。

① 杨丹：《政策过程视角下振兴发展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的路径优化——以湖南为例》，《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87页。

② 遵义市人民政府网：《〈遵义市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3年）〉发布》，2023年8月25日，https://www.zunyi.gov.cn/xwdt/bmdt/202308/t20230825_82038271.html，2024年12月28日。

③ 遵义市人民政府网：《遵义市加快拓展数字化场景应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2024年11月22日，https://www.zunyi.gov.cn/zwgk/xwfb/zbhg/202411/t20241122_86122336.html，2024年12月20日。

表 1 2023 年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地市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评价情况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 地级市	湖南省					湖北省			重庆市	贵州省	
	张家界	常德	湘西	怀化	娄底	荆州	恩施	宜昌	重庆涉 5 县区	遵义	铜仁
服务供给能力（分）	30.41	30.61	30.85	31.96	30.96	32.16	31.91	32.04	34.22	31.57	31.15
服务响应能力（分）	23.80	25.19	23.55	25.36	25.66	28.14	28.14	27.59	25.62	24.02	24.89
服务智慧能力（分）	14.46	14.46	9.90	9.35	14.27	15.31	12.67	14.47	15.52	12.36	11.28
数据驱动能力（分）	0.00	2.50	5.44	0.50	7.92	1.00	6.42	7.22	8.40	7.58	7.58
总分（分）	68.67	72.76	69.74	67.17	78.81	76.61	79.14	81.32	83.77	75.53	74.90
全国地级行政区 排名（位）	171	124	156	188	47	71	44	28	3（直辖市）	88	97

数据来源：汤志伟、徐霁等著《中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发展报告（2023）》。

在智慧社会建设方面，湘鄂渝黔革命老区不断夯实智慧社会发展基石，以数智化赋能高品质社会生活，积极拓展社会事业和民生领域“智向未来、慧享生活”的应用新场景。常德市持续推动“数字教育”“数字财政”“数字供销”建设，拓展“智慧交通”“智慧城管”应用场景。宜昌市加快以数智化赋能基层治理和社会救助服务。遵义市积极打造全域数字化转型“示范市”，建设社会组织数字服务平台，创建社会组织数字化治理标杆。铜仁市围绕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开展“智慧铜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以数智化激发乡村振兴发展新动能。

此外，湘鄂渝黔革命老区还积极探索文旅、文博、公益等领域数智化应用新模式。宜昌市加快传统文旅向数字文旅转型升级，促进数智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怀化市积极建设数字文博大平台，推进文博数智化工作；遵义市加强数字技术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建设遵义智慧旅游云系统，促进数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积极开展“数字公益”服务；等等。

三、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智化”赋能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做法

（一）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 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② “十四五”时期，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抢抓数字化变革新机遇，积极发展壮大数字经济，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张家界市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优势产业融合发展，聚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立足实际发展县域电商、网红经济以及视频产业，打造数字经济优势产业。怀化市积极成立数字化转型产业联盟，加快建设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宜昌市印发《宜昌市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宜昌市关于加快数字经济人才聚集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助推企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产业发展，2024 年 11 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四上”企业达到 709 家。^③ 遵义市强化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的实施意见》《遵义市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工作

① 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 年第 12 期，第 9 页。
②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 2 期，第 5 页。
③ 何冠英、牛德雄：《数字产业“四上”企业达 709 家》，《三峡日报》2024 年 12 月 18 日，第 2 版。

方案》《遵义市“万企融合”大赋能行动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制定《遵义市“十四五”大数据（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遵义市数字经济产业带核心区发展规划纲要》等规划文件，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十百千”行动，积极培育数字产业市场主体，依托遵义高新区“主战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①石柱县不断促进服务业数字化，发展壮大数字制造业和农村电商产业。彭水县加快建设智慧名城，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数字政府通过自身治理逻辑为重塑促进共同富裕的政府与市场以及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②，并且以精准化、智能化的方式汲取、整合和配置社会资源，有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③2022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积极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常德市围绕打造“全省领先、全国一流”营商环境目标，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牵引，协同推进“数字政府”和“智慧常德”建设，实施开展政务质效提升专项行动和“三送三解三优”行动，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荆州市围绕打造全省一流新型政务服务模式，不断提升数字政府基础支撑能力，深入推进智慧政务、人社服务、公共卫生、医疗保障、应急指挥、城市管理、社会治安以及民政救助等数智化平台建设，全面提高治理能力水平和公共服务效率。2024年12月，荆州市《政府门户网站AI搜问一体服务》入选地市政府网站“十佳”优秀创新案例。遵义市深入实施数字政府建设提升行动，着力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建成基于政务数据的城市综合服务平台“i遵义”，实现政务事项网上可办率100%。^④2024年5月，遵义市印发《遵义市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按照“2+6+2”数字政府总体架构，逐步形成政府数字化管理服务新格局。酉阳县围绕数字重庆“1361”整体框架，聚焦改革发展急需、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以及维护社会平安稳定的堵点难点卡点，提出要全面提升数字政府集约化建设水平，促进工作体系重构、业务流程再造和体制机制重塑，以数字化引领开创酉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⑤

（三）着力构建智慧社会，促进数字红利普惠化

自党的十九大作出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以来，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在国家政策和数智技术的加持下，纷纷行动起来，着力构建智慧社会，积极促进数字红利普惠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2020年12月，张家界市在永定区崇文办事处宝塔岗居委会挂牌成立全市首家智慧社区服务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智能、低碳、便捷、高效、安全和舒适的现代生活体验服务。2024年8月，“我的张家界”智慧城市APP平台顺利实现平台建设及运营权移交，该平台以市民为中心，打造一站式智慧城市服务平台，全面汇聚覆盖市民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便民服务资源，为全市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智慧畅享”惠民服务。^⑥2022年2月，

① 遵义市人民政府网：《遵义市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2024年2月29日，https://www.zunyi.gov.cn/zwgk/zdlygk/dsjjsgl/cyrhgl/202402/t20240229_83864947.html，2024年12月24日。

② 范瑞光、赵军锋：《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电子政务》2023年第1期，第102页。

③ 冉昊：《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河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第42页。

④ 遵义市人民政府网：《遵义推进数字政府建设》，2023年10月24日，https://www.zunyi.gov.cn/zwgk/zdlygk/dsjjsgl/yytggl/202310/t20231024_82834701.html，2024年12月24日。

⑤ 唐宇、金剑：《强化协同联动 突出实战实效 以数字化引领开创酉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酉阳报》2023年11月10日第1版。

⑥ 度海霞：《“我的张家界”智慧城市APP平台运营权正式移交》，2024年8月8日，<https://www.zjj.gov.cn/c32/20240808/i925444.html>，2024年12月25日。

荆州市以服务市民生活为宗旨、以用户体验为驱动,上线推出“荆州e家”超级APP,为全市市民提供让服务“更贴心”、让群众“更暖心”、让城市“更舒心”的城市“智享惠民”服务。^①2022年11月,铜仁市开始着手进行智慧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着力打造“数智铜仁”。近年来,遵义市积极探索智慧城市与全域城市化转型的新路子,着力聚焦数字治理和数字民生,全面开展数据汇聚共享应用,以“数智化”赋能和提高惠民服务质效,在提升城市智慧水平的过程中,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数字生活服务需求。^②2024年5月,秀山县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揭牌,通过构建高效、智能、协同的一体化智能化城市治理公共数据平台,为政府提供城市运行监测、指挥调度等数据分析与辅助决策支撑,为市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数字普惠服务。^③

四、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智化”赋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制约因素

(一) 数字基础设施不够健全

数字基础设施是全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迭代演进以及迈向未来更高文明新图景的重要“数字底座”。数字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和应用基础设施,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大动脉”。“十四五”时期,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张家界市不断加强云计算大数据中心、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面提升5G网络覆盖范围和质量,加快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常德市也持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新建5G基站接近2900个,新能源公共充电桩接近960个。荆州市、宜昌市深入推进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平台建设,不断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用水平。遵义市围绕国家“东数西算”重大战略工程,深入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铜仁市以5G基站、云计算大数据中心、智慧城市等为重要抓手,加快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受历史发展、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以及生产力水平等诸多因素制约,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加之,革命老区地方财力有限,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相对较少,数字基础设施不健全、不完善,5G、产业互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城乡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有效统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投入和建设仍存在不平衡现象,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依赖性较强,难以紧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步伐。此外,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各地级市之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参差不齐、差别迥异的状况。2024年2月,铜仁市、荆州市、黔江区成功入选2023年“千兆城市”,截至目前,遵义市、铜仁市、宜昌市、荆州市和黔江区进入“千兆城市”行列,“双千兆”网络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而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其他地级市和县区与之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尚未达到“千兆城市”所明确的平均城市家庭千兆光纤网络覆盖率、平均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等基本标准,还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二) 数字营商环境不够优化

通常,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设立、经营、退出整个生命周期内,以市场主体控制之外的一系列因素或条件,^④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是一个国家

① 贺田梓、田心怡、肖琦:《打造城市新名片“荆州e家”超级APP上线》,2022年2月15日, <http://news.jznews.com.cn/system/2022/02/15/030013918.shtml>,2024年12月25日。

② 李燕:《遵义:聚合力量加“数”奔跑》,《遵义日报》2024年8月28日,第1版。

③ 姚敏:《秀山县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正式揭牌 开启城市治理新篇章》,2024年5月31日, <http://www.zgcqxs.net/show/news/104610.html>,2024年12月25日。

④ 中国信息协会营商环境专业委员会:《中国数字赋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践报告(2022)》,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页。

和地区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而数字营商环境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化发展机遇与数字化竞争挑战并存背景下，在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数字治理生态框架内，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技术环境等外部环境条件的总和。^① 数字营商环境，作为传统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提升和数字赋能^②，既包含推动数字经济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也包含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提升政府数字化服务的营商环境。具体而言，数字营商环境是由数字设施技术环境、数字市场运营环境、数字政策政务环境以及数字司法治理环境等特征要素构成。^③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十分注重营商环境建设，各地级市纷纷采取有力措施优化营商环境。2023 年以来，张家界市持续强化“三个坚持”，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制定出台“稳增长 40 条”配套政策措施，不断健全营商环境体制机制保障。遵义市创新开展“转、学、分、督、服”的“五步”工作法，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并于 2023 年 10 月成功入选“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改革”试点城市。^④ 2024 年 10 月，荆州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十问十帮”温暖行动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提出 5 项切实举措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

然而，从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各地级市来看，其数字营商环境还存在不够优化的方面。根据《2022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2022 年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地级市（部分）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在全国地级市排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仅宜昌、遵义和荆州三市进入前 150 名（表 2）。从公共服务、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创新环境等分项指数来看，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地级市（部分）城市营商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整体营商环境水平还较低，数智化程度还不够高，亟待持续加强数字化升级与数智化赋能，不断优化数字设施技术、数字市场运营、数字政策政务以及数字司法治理等营商环境。

表 2 2022 年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地级市（部分）城市营商环境评价及分项指标评价

湘鄂渝黔革命 老区地级市 （部分）城市		营商环境评价			营商环境分项指数评价						
		营商环境 指数	省内排 名（位）	全国排 名（位）	公共服 务指数	政务环 境指数	法治环 境指数	市场环 境指数	人力资 源指数	金融服 务指数	创新环 境指数
湖南	张家界	7.8797	13	271	1.1462	14.7966	25.7035	2.9735	15.7443	0.4801	0.255
	常德	10.8337	10	174	5.8993	13.5034	28.0788	9.2083	18.8316	4.3713	1.6919
	怀化	9.7383	11	221	5.4773	5.7893	44.0841	2.8657	18.0329	1.6959	1.6718
	娄底	10.9931	8	168	5.6398	9.5567	51.0389	4.4852	16.4880	2.3609	0.7310
湖北	荆州	12.2125	3	121	5.1839	13.1657	54.4623	5.7462	17.7715	1.9745	1.2664
	宜昌	15.0243	2	63	7.3195	17.2674	56.6266	14.5138	18.6881	2.1805	2.4414
贵州	遵义	12.4772	2	114	9.8556	18.8403	30.0492	6.1479	22.0749	4.4421	1.7879
	铜仁	9.5187	5	229	3.5933	19.0016	27.7624	3.3852	16.3993	1.6463	0.9241

数据来源：《2022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李志军主编）。

（三）数字人才队伍不够壮大

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而数字人才是第一资源中的“稀缺资源”，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数智”技术基础。党的二十大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总体部署之后，湘鄂渝黔革命老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各省人才工作

① 胡税根、林静芬、操乐融：《数字营商环境优化的影响因素及驱动路径——基于 31 个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4 年第 5 期，第 6 页。

② 孙莉莉、李锋：《我国数字营商环境建设论略：突出问题与优化措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第 118 页。

③ 李志军：《2022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23 年，第 10 页。

④ 遵义市人民政府网：《遵义市“五步”工作法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2024 年 1 月 3 日，https://www.zunyi.gov.cn/zwgk/zdlygk/zsyj/zhxd/202401/t20240103_83446283.html，2024 年 12 月 26 日。

战略谋划,进一步健全党的人才工作制度,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工作新举措,不断开创新时代人才工作新局面。就数字人才工作而言,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立足自身实际,积极开展人才引进、培养等工作。荆州市围绕“数字荆州”建设和数字化转型,持续加大数字人才培育,通过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设立“人才服务驿站”,大力引进、培育和集聚了一批优质数字人才团队。2024年9月,宜昌市印发《关于加快数字经济人才聚集的若干措施》,着力强化数字经济领域招才引智工作。^①“十四五”时期,遵义市、铜仁市抢抓贵州省大力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的重大机遇,大力推进人才工作市场化改革,积极出台各种引才育才优惠政策,优化聚才用才兴产发展环境,2022年,贵州省数字经济人才规模达42.43万人,而遵义市、铜仁市数字经济人才数量分别占全省数字经济人才规模总量的11.97%、4.58%,取得了数字经济人才工作的积极进展。^②

然而,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字人才规模、总量还较小,数字人才队伍还不够壮大,数字经济领域“高精尖”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十分匮乏,并且缺口较大,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人才极度稀缺。一些地方政府人才激励机制、留用政策、薪酬体系以及管理使用等机制不够完善和灵活,致使数字人才“留才”较难,加之各地区数字人才争夺激烈,使得数字人才流失现象频发。一些地方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缓慢,数智化应用场景相对贫乏,数字人才大多从事基础性工作,未能充分发挥数字人才创新引领作用。此外,由于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字化发展起步较晚,新兴数智技术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地区之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数字人才大多流向了周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

五、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智化”赋能促进共同富裕的优化路径

(一)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老区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③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首要任务。当前,掣肘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而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创新驱动乏力、发展动能不强等突出问题,亟待有效激发创新活力、持续增强发展动能,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促进共同富裕的物质技术基础。新质生产力是指导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当代先进生产力,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④湘鄂渝黔革命老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老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要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条件,找准发力点和切入口,加快推动传统行业、领域和产业数智化与绿色化转型升级,选准培育方向,“抱团式”抢位发展,积极探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谋划布局,慎重稳妥发展未来产业。要着力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扎实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和数字经济产业带。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与高水平开放,统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打牢“数智”基础和增添创新动能。湘鄂渝黔革命老区要依托国家“东数西算”重大战略工程成渝、贵州两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以及重庆、天府、贵安等数

① 高秉喜、张凯:《我市出台招才引智“数才十条”》,《三峡日报》2024年9月27日,第1版。

②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网:《〈贵州省数字经济人才发展白皮书(2022)〉》,2024年1月2日, https://dsj.guizhou.gov.cn/zwgk/xxgkml/zdlyxx/dsjrc/202401/t20240102_83431945.html,2024年12月31日。

③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5页。

④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第6页。

据中心集群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能源丰富、气候适宜以及绿色生态等独特优势，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广泛应用和推广数智技术、绿色技术，不断丰富和拓宽“数智化”应用场景，通过“数智化”融合与赋能，激发数据生产要素和各类生产要素“融合效能”与创新活力，促进传统的、低效的生产力向数智生产力进行质态演进，加快跃升到“数实融合、数智赋能”的质态阶段，进而向新质生产力演进积蓄强劲的“跃迁动能”。^①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要充分发挥“数智化”融合与赋能的重要作用，以及数字经济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征及其叠加、倍增、溢出效应，不断增强老区发展的平衡性，推动老区重点城市和城市群以及城乡发展更平衡、更协调与更包容，让老区 and 老区人民在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朝着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

（二）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② 建设数字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一体化，提升数字治理水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工程，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工具引领与驱动作用，是以“数字包容”稳固全民共同富裕之基石、以“数字红利”增进全民共同富裕之效能的关键之举。^③ “十四五”时期，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地级市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加快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数字政府建设仍然面临跨区域数据共享利用程度较低、城乡数字治理水平不均衡以及弱势群体“数字鸿沟”新挑战等突出问题，亟待进一步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基础，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政策供给，不断推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全面从“能用”向“好用”彻底转变，切实打造形成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和均等化水平。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要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全面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加快推进“一次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和数字治理“升级版”。近年来，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四省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总体指数达到“非常高”的水平，^④ 这为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湘鄂渝黔革命老区要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深入开展政务服务跨区域通办，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在推进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深化拓展教育、医疗、养老、救助以及办事、出行、消费等服务新场景，大力推行基本公共服务“数字无障碍”应用模式，不断健全有效弥合城乡及弱势群体“数字鸿沟”的长效机制，^⑤ 加快促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切实保障老区人民更好地共享数字红利。

（三）培养复合型数字人才，推动老区“数智化”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⑥ 2024年4月，人社部、中组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数字人才培养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扎实开展数字人才育、引、留、用等专项行动，提升数字人才自主创新能力，激发数字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增加数字人才有效供给，形成数字人才集聚效应，着力打造一支规模壮大、素质

① 吴韬、钟启超：《边疆民族地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西藏发展论坛》2024年第4期，第32页。

②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7页。

③ 陈桂生、史珍妮：《数字赋权与数字平权：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治理》，《学习论坛》2022年第4期，第72页。

④ 王益民、丁艺：《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报告（202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53页。

⑤ 方兴东、钟祥铭：《中国数字治理发展报告（202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92页。

⑥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第8页。

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高水平数字人才队伍,更好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①从创新发展来看,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3)》相关数据分析,^②湖南、湖北、重庆三省市在全国处于前列,2023年湖南省创新能力排名全国第9位,湖北省排名第8位,重庆市排名第12位,而贵州省创新能力相对偏弱,排名第22位。但是,就具体指标而言,湖南省、重庆市在知识创造能力方面还相对落后,湖北省在移动互联网人均接入流量、移动电话普及率等创新环境方面还存在劣势,贵州省科技资源薄弱这一短板较为突出,创新能力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从科技创新来看,根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3)》相关数据分析,^③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社会生活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排名全国第28位;湖北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相对较低,万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位次比较靠后,排名全国第28位;重庆市研发人力投入不足,技术成果市场化不太理想,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位次排名全国第30位;贵州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为滞后,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排名较为靠后。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和“数智化”创新发展,实质上是由数字人才驱动的。因此,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创新发展水平以及科技创新能力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缺乏科技人才尤其是数字人才创新活力及其集聚效应的强力支撑。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要加强省际、区域数字人才交流合作,共同构建区域数字人才发展协同、人力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为打造老区高能级现代化重点城市及其城市群提供人才、智力支撑和劳动力要素保障。湘鄂渝黔革命老区重点城市要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数字人才战略培养合作,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强复合型数字人才培养与储备。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城市群及其县域,要营造良好数字人才“育、引、留、用”政策体系环境,加强与重点城市和周边地区数字人才供需合作,引导并促进数字人才在区域城市群内流动、集聚和共享,以数字人才集聚带动老区经济社会各领域“数聚”协同创新,进而提高区域全要素生产率,^④不断促进老区振兴发展与共同富裕取得新突破、新跨越。

六、结语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作为曾经的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既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并在过渡期后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又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并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振兴发展与循序促进共同富裕,其所肩负的任务何其艰巨。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必须要在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当今时代,数智技术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竞争性、先导性力量,这为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带来千载难逢的“数智化”发展新机遇,必须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分匀“蛋糕”,在循序促进老区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加快数字人才培养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2024年4月2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5920.htm,2025年1月3日。

②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3)》,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15页。

③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3)》,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58页。

④ 吴韬、钟启超:《左右江革命老区“数智化”赋能促进共同富裕研究》,《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第119页。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滇省夷人图说〉音乐符号的文化意蕴和图像表征》所录图片



图1 苗子



图2 僮卜



图3 普列



图4 黑甘夷



图5 妙裸罗



图6 麦岔



图7 普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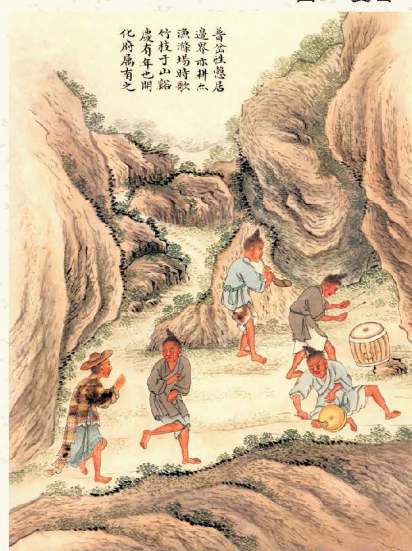


图8 普岔

注：图片来源《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輿地图说》，主编：揣振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YUNNAN SHEHUI ZHUYI XUEYUAN XUEBAO
(季刊,1999年创刊)
2025年3月 第1期(总第105期) 第27卷

主 管: 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 办: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 刷: 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 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 址: 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 编: 650031
联系电话: 0871-68091598
电子邮箱: ynsyxbjb@163.com
出版日期: 2025年3月20日

定 价: 9.00元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Started in 1999)
No.1 (Sum 105) Vol.27 Mar. 2025

Responsible Institution: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No.221 Wu Yi Road,Kunming City,PRC
Post code:650031
Tel: (0871)68091598
E-mail: ynsyxbjb@163.com
Published: Mar. 20, 2025